

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著
歐陽君譯

四強外交秘史

新闡地社印行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40

著者號 ~~7732~~

登錄號 4411

4411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四強外交秘密

著 斯納爾貝 前美國國務卿

譯 珊君陽歐

國史館藏書



0032773

新闡天地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

四強外交秘密

(PEAKING FRANKLY)

著者 貝爾納斯

譯者 歐陽君珊

出版者 新聞天地社

上海(18)蒲石路南華新村
二十號 電話七九七〇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滄初版三千冊

序

假使我們能先知道我們是在何處，往何處去，

我們當更能判斷應做何事與如何做。

亞伯拉罕 林肯

許多朋友都勸我把這個內幕故事寫出來。他們的理由是：趁着我記憶中的那些事件還清新，趁着我還能讀出我速記的札錄，我若坦白地說出來，將是對大眾的一種貢獻。

我會爲促進一個人民的和平而努力了一些時候，一向認爲：除非我們把商談的事實告知人民，對於和平，決不能有睿智的貢獻，明乎此，你當能明瞭我如何便會輕易地確信：假如我能幫助那些有意造成和平的人民瞭解目前處境，他們也許能更正確地判斷做什麼與怎樣做。

過去四月間，當我化費冗長的時間寫述此原稿之時，我寬恕了那些朋友，雖則我並未將他們忘却。同時我體驗到寫作是種職業，但却不是我的職業。我不想成爲一個職業作家，創立一種文藝風格，只想用隨便的語錄的方式，將我們爲和平而盡的努力說出來。

脫稿後一看，我驚訝並煩惱，其間的「我」字竟會如此之多。現在已太晚，無能爲力了。只是我希望你能記得，這是紀述作者親身參與的事件與商談的，「我」字的常用是難以避免的事——只能以此解嘲了。

本書不敘述戰後我國之外交關係，而僅限於為和平所盡之努力以及因該項努力而產生之事件。例如，本書並未述及對南美諸鄰邦的關係。這是因為在敘說和平的成就時，尚無論及對南美政府或對加拿大政府關係之必要。

在本書中，我曾提到許多在列次會議中與我接觸的人。還有許多，名字雖未被提起，而使命的達成，實有賴他們的協助。我深深地緬懷並欽敬他們的貢獻。

我並要感謝列次會議的秘書處人員。他們審慎整理出來的紀錄，供給了許多形成和談圖案的線條，價值無比。我有許多自己的摘記，但是僅祇在雅爾達會議上，能記下了一份完整的速記的筆錄，因那時我是顧問，無需參予辯論。

書中有許多談話實錄。有的採自我的摘記，有的採自秘書處的記載，或會談後的備忘錄。

記憶轉述之誤，當然還是難免的，尤其像蘇聯或法國代表的語錄或演說辭。在若干場合中，與其說是發言者的語句，還不如說是譯述者的言辭。達到稍有懷疑的地方，我便不引述原句，而只圖反映出演辭的含義，事件的實況及當時的空氣。

總括一句，我是想在會議桌旁給讀者一席之地。若干批評家也許會說這些史實洩露得過早。我的答覆是，假若列次商討和平的會議情形能老實告訴這世界上的人民，那麼目前緊扼着我們心靈的恐懼與憂慮，也許便會消逝了。

詹姆斯 F 貝爾納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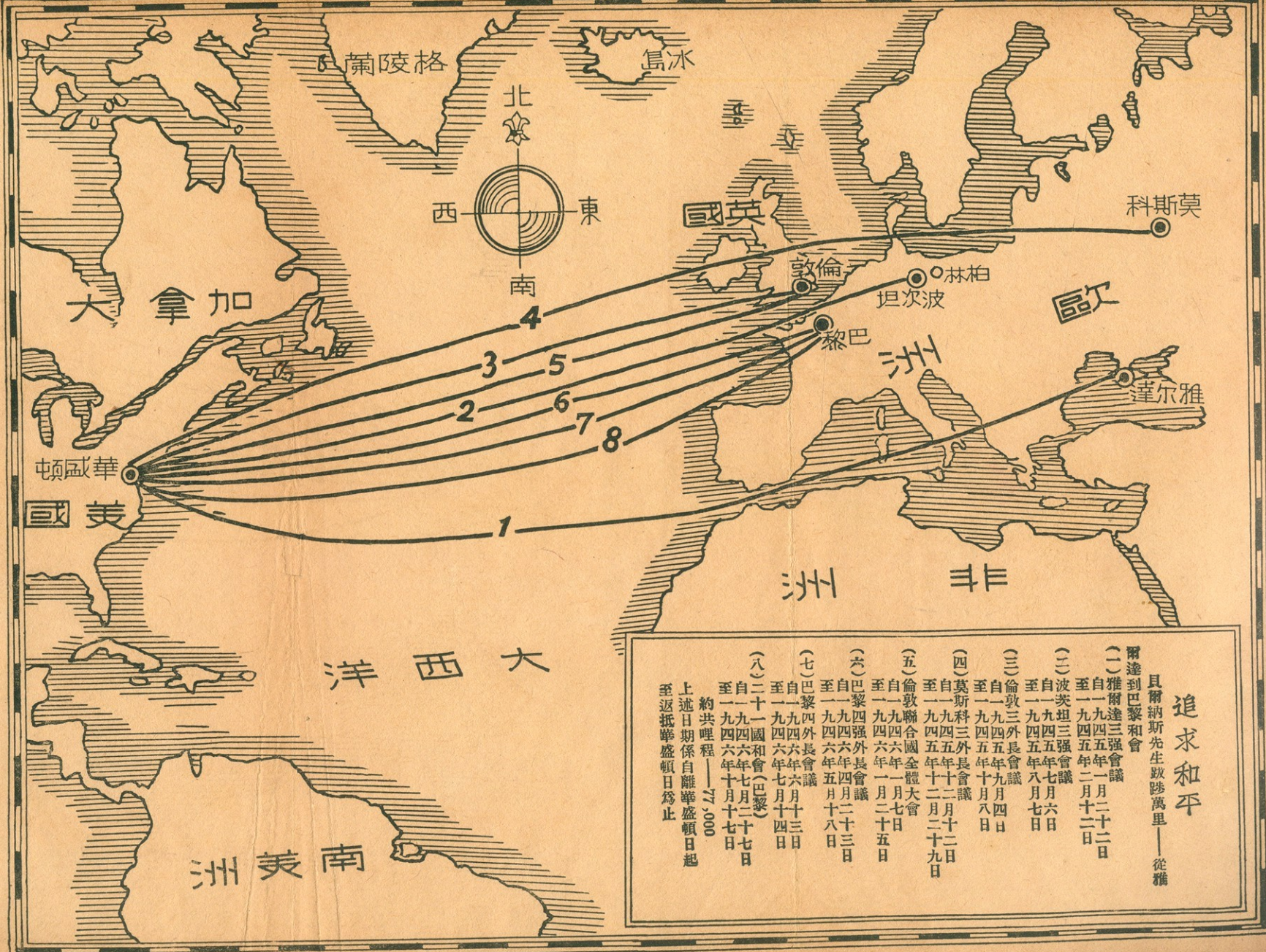
斯巴登堡，S·C·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

目次

714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	一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	一四
第三章	局勢開始轉變	三七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	五七
第五章	在倫敦遭遇的挫折	八一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打開了一個僵局	九八
第七章	再至倫敦·重遊巴黎	一一五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的紐約結局	一三〇
第九章	中歐——嚴厲的試煉	一五〇

第十章	一個行動的路線問題·····	一六九
第十一章	向亞洲和平邁進·····	一九五
第十二章	確立國民外交政策·····	二一八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	二三五
第十四章	俄國人以後如何·····	二五五
第十五章	我們往何處去·····	二八一



追求和平

貝爾納斯先生跋涉萬里——從雅爾達到巴黎和會

- (一) 雅爾達三強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 (二) 波茨坦三強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 (三) 倫敦三外長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 (四) 莫斯科三外長會議
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 (五) 倫敦聯合國全體大會
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六) 巴黎四強外長會議
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
 - (七) 巴黎四外長會議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 (八) 二十一國和會(巴黎)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 約共哩程——77,000
上述日期係自離華盛頓日起
至返抵華盛頓日為止

第一章 危機的警覺與責任

千萬個聲音使我警覺到危機的到來。我面前好幾畝地上站滿了德國人，列成整齊的隊伍，歌頌着武裝力量及其說教者希特勒。這不是噩夢。這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德國紐倫堡。跟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會近乎漠不相關地看着這個希特勒的崛起，但是這一幕情景畢竟是難予漠視的。

那年我偕夫人赴巴黎出席會議，順便想看看歐洲對失業問題的處置。我們原想不到紐倫堡去，但在慕尼黑，一個在船上相識的德國外交部官員勸我們，若要正確估計德國的經濟復興計劃，非一看納粹黨年會不可。

但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個武裝侵略計劃。一萬二千名兵士和幾十輛坦克摩托化車輛經過台前，天空中飛過四百五十架飛機。檢閱式到最高潮，希特勒站在一輛敞車上駛過，右手高舉，行着納粹禮。四面立即擁起一陣歡呼聲。我驚懼——深深爲這戰時景象驚懼。

我們在德國旅行，行經漢堡及勃萊門海文時，又見到從紐倫堡回來的軍隊所受的熱烈歡迎。人民對這支急速成長的新軍頗爲自傲，幾乎一致贊助武裝力量的恢復。無論在鄉間或都市中，到處都在談論着戰爭。

這些印象與我們在法國所見的，是個強烈的對比。勞資糾紛給法國帶來經濟危機。工廠商店每逢週六中午起至週二的早晨是停業的。工人却還在要求更短的工作時間。然而在德國，工作時間却在盡力增加。他們的口號是「從工作中尋樂趣」。德國忙着增加生產，法國在忙着減低。

我們到了倫敦。由於在德國所見的一切，我便問英國官員，在武力方面有何準備。他們也已驚覺到這一點，但只少數人有反應。那些少數份子已在數月前完成了一個軍備計劃。嗣後我訪問伯明罕時，的確看見有幾個工廠已在日夜趕製軍器。

即使是如此有限的一個軍備計劃，在英國也引起了和平主義者強烈的反對，週末回到倫敦，竟有一個盛大的和平遊行。他們都是些善良人民——跟國內任何一州的人民一樣——呼籲和平，憎恨戰爭。但當這些誠實善良的各式人等經過街上時，我又想起了紐倫堡所見，希特勒那幾萬馴服的鵝步而過的軍隊。這種和平遊行顯然是徒勞心力而已。

德國武力所給我的印象，與二年前我在太平洋上遊歷時所聽到的拚合起來，我所疑慮的變成了一論斷。副總統茄納那時率領國會代表團往馬尼刺參加奎松就任第一任總統典禮。在那裏我們聽說日本的侵略意向有增加的現象。所以我們到達日本之時，我對日本海軍預算以及它的造船情況作了一番調查。根據日本一九三六年決算，至少有半數是供給陸海軍的。我們的使館人員相信，公布的決算表僅祇包括了海軍經費的一部份。但是這個公開的數字也已足夠驚人了。回國後，我敦促總統設法獲得日本海軍力量的更正確估計。

同樣使人不安的是日本政治經濟的構造。我調查日本紡織工業是因爲它與南加羅林那州的主要工業有競爭關係。結果發現工業金融及造船事業，事實上日本整個經濟政治命脈，全被集中操縱在少數人手裏。整個國家可以隨着這少數人的意向採取任何路線。

明顯地，無論在德國或日本，廣大人民是毫無機會參加意見的。統治一切的是領導份子的命令而非人民的願望。

一九三七年十月從歐洲歸來，我立即向羅斯福總統報告這一切。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立刻對國防加以嚴重的考慮。

總統說，我證實了他所接獲的報告。他爲了歐洲的發展大大煩惱。尤其使他煩惱的，是不容易使人民警覺到當前真正局勢的危急。

國會所反映的人民情緒，使我們難以替陸海軍增加經費。但是他決定盡他所有的力量使人民明瞭增加預算的必要。我答應幫助他。

那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總統發表了有名的芝加哥奎倫丁演說。這是一次強有力的演說，因爲有種種原因必須如此。我們一貫希望不牽涉於歐洲的糾爭中。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參予歐洲政治所得到的幻滅猶未消失。站在人民立場，我們憎恨戰爭，珍視我們的孤立主義。

政府在平時本不敢過於支持陸海軍的。到了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輿論更催促着國家稅收應該用於救濟事業。此外，參議院軍火委員會也在鼓勵和平主義者，因此造成了那種單純的理論，說

戰爭是軍火商人渴求利潤的產物。

每次我在參院提出海軍預算書，總得受盡和平主義份子的指摘。他們呼籲民間廣大的支援。參院旁聽席上坐滿了婦女與學生佔極高比數的聽眾。

羅斯福就任總統以來，曾屢次爲了要求強化國防設施而遭遇到反對。但他還是設法撥付海軍建設計劃的經費，又曾獲准將陸軍現役人數從十一萬五千擴增到十六萬五千人。

總統在芝加哥演說後，因人民並無反響而大感失望。他等到次年年初便熱誠發動去喚醒國會與人民大眾。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九日，他告訴國會：「全世界人口至少有四分之一陷在殘酷的戰爭中」。

嗣後他要求將海軍建造經費增加百分之廿，造戰鬥艦兩艘，巡洋艦兩艘，試造小型艦隻，撥二千萬元供陸軍購備器材。那時我們的陸軍在世界上是第十八位。

但是人民的情緒使我們增加陸海軍預算運動遭遇無比的困難。

一九三八年三月奧國的吞併，慕尼黑協定，與九月間捷克的解體震驚美國人民。但是陸海軍預算還是難獲國會的通過。總統爲引起大眾注意，在一九三九年歲首又遞送了一紙關於國防的諮文給國會。這次他要求經費五萬萬元，主要是用來購買陸海空軍的武器。

五月廿七，國務卿赫爾向衆院要求廢棄禁運軍火法案。他解釋稱：如此，則萬一戰事在歐洲發生，也許美國還可以倖免。此後不久，在白宮談話時，羅斯福總統告訴我，他很担心希特勒會

在秋間發動戰爭。因此，當七月十一日，參院外交委員會以十二票對十一票議決延緩討論禁運法案時，對總統與國務卿實在是個痛心的失望。三天之後，總統送了件諮文向國會表示遺憾，並附了封赫爾的信，呼籲立即行動。他一再指明，禁運法案若不撤銷，我們保衛和平的力量將被削弱。但該項請求終於未被接受。

國會遷延不決，希特勒却並不這樣。他與他的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忙着跟蘇聯協商那個在八月廿八日成立的互不侵犯條約。兩天之後納粹大軍侵入波蘭，字彙中多了「閃電戰」這一個名詞。

總統按照當時法律，宣布了中立，並發表了禁運令。同時他於九月廿一日召開國會臨時會議，討論撤銷禁運問題。十一月四日，國會終於通過。

戰爭剛爆發，總統便理解到當前局勢的危急，有兩黨共同行動的必要。爲了要提出此項請求，他在國會前一日，召集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兩黨代表，其間有副總統茄納、國務卿赫爾、蘭登、諾克斯、發言人彭柯亨，參院領袖巴克萊與麥克納萊，參議員辟特曼，貝爾納斯，蘭登與奧斯汀，衆議員勃羅姆，雷朋，馬丁與梅潑斯。

這是一個嚴重的會議，對總統所提出的兩大政黨合作的請求，各出席人都有坦白的發言。蘭登認爲國會應照常繼續會議。他認爲國會的決定比總統個人所作的決定來得妥善。共和黨代表方面，諾克斯的說話給人印象最深。他說戰事必然擴大，吾人不欲置身其中，然亦無法置身事外，

並宣稱應忘却黨派之爭，一致保衛國家。總統事後對我表示，頗嘉許他的演說。因此當總統最後決定邀請兩共和黨黨員入閣，任命諾克斯爲海軍部長，史汀生爲陸軍部長；我並不覺得驚異了。諾克斯的任命很容易地獲得了各方同意，甚至民主黨領導人物芝加哥市長凱萊也無異言。這就可見政黨的關係已成爲次要的考慮了。

當其時，納粹軍隊在波蘭節節勝利。但是一大部份美國人民還是不能警覺到當前的危機。因爲那時德軍在西線尙無行動，人民便以爲情勢不致嚴重。此種思想流行極廣，並在國會上反映出來。從參議院同僚的談話中，我覺得若在此時將海軍預算案提出討論，勢必被大加修削，我就盡力設法延緩參院的討論。雖則海軍極需要該項經費，但我要保證該項預算毫無修正地通過。根據情報人員及軍事長官的報告，都相信納粹必於次年春季進攻西線。結果，果然如此。當此時機，我在參院提出了海軍預算案。在三小時內，它便獲得了預算委員會的通過。

我們的困難不僅限於物質方面。陸軍的許多高級官員雖多是優秀份子，但據馬歇爾將軍的意見，以爲太老了，恐不能勝任當前異常重大的任務。

一九四〇年八月，馬歇爾將軍於出席某次參院預算委員會後向我說，他的最大困難是無法擢升有特殊才幹的青年將校。他說，有了這種權力，他方能正式改組陸軍。他告訴我，在數月前，他曾請衆議院軍政委員會主席梅氏，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但未獲成功。

由於他需要之迫切，我請他命屬下的專家擬一足以達成此一目的之修正案。我答應幫助他。

根據參院規則，預算案是不附加修正案的，但當預算案提出時，我畢竟建議了一個修正案，「在總統認為發生戰爭或國家遭逢危機之時，現役軍人中任何官員，得受暫時性之更高級任命，並不喪失其永久職務」。毫無反對，便被採用了。

九月九日，條文變成法律，軍政部開始擢升後來率領軍隊獲致勝利的那些青年軍人。未到期終，被擢升者共達四千零八十八人。其中特出份子有艾森豪威爾、開耐、史巴資、克拉克與已故的巴頓將軍等。

最後，英軍在鄧扣克的慘敗終於驚醒了美國人民，但他們的反響異常分歧。一面是對戰爭的憎厭，一面逐漸認清戰火已日益迫近。心與腦掙扎的結果，產生了個執中的辦法，建設國防，但決不牽入漩渦。

人民分歧的意見在政黨年會上反映出來。

共和黨於六月廿四日在費拉達爾菲舉行大會時，當場通過了一個宣言：「共和黨堅決反對國家參予國外的戰爭」。

民主黨的政黨領導者們明瞭這樣一個宣言對有選舉權的母親們將有何等的誘力，極力想使民主黨大會能勝過他。

總統請我代表他出席年會。政策委員會商時，我知道將有一番戰鬥了。參議員韋勒要求發表「不參予戰事」的宣言。參議員華爾許及麥卡倫以及其餘諸人亦是如此。我請主席華格納參議員

展緩討論外交部份，等我與三參議員商洽一個滿意的宣言。

三參議員堅持下述文告：「吾人將不參加國外戰爭，亦不派遣陸軍海軍或空軍至美洲以外異國土地上作戰」。他們向我警告，若不能獲得諸如此類的保證，若干代表恐將有所行動。最後我告訴他們，假若能同意附加「除非被攻擊」數字，我當將此提呈總統與國務卿。他們同意了。我便與總統等討論。我指出，假使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被攻擊，我們便得派遣軍隊出去作戰。無論如何，不宣戰是不能派遣部隊去作戰的，而宣戰却是國會的任務。於是總統與赫爾國務卿也同意了。

此項宣言為政策委員會及大會一致通過。我並不喜歡這個施政綱領，怕它會使希特勒認作我們決不會作戰，以致使他更爲猖獗。但是默觀政策委員會各委員的意見，這已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佳結果了。否則勢必在年會上引起一場惡鬥，招致執政黨之嚴重分裂。

法國淪亡，英國遭受猛烈轟炸，總統積極行動。他將步槍及其他軍火售與英國，補充喪失在法國海灘上的軍械。同時協商以五十艘艦齡已滿的驅逐艦交換海軍根據地。一般人對此大爲反對，認爲總統並無處置此項驅逐艦的權力。總統自有法律根據。但據我觀察，他更注意的是民間輿論是否支持此一行動。他已決定冒一冒險，即使離大選已僅幾個月了。

大約即在此時，國會開始討論歷史上第一次平時征兵問題。共和黨衆議員沃資華斯與民主黨參議員盤克聯合主持此一法案。剛好在大選之前獲得通過。

人民之接受征兵可以看出對歐陸戰局的發展已有反響。從那時起，人民便常常趕在總統與國會的前面了。他們看到了遍及全世界的戰事，認清亟需援助我們的友人，以便獲得充分準備的時間。

一九四〇年聖誕節前一次新聞例會上，總統宣佈擬以金錢以外之其他方式援助對希特勒作戰的國家。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總統進一步向新國會提出。一方面，便命柯克斯起草擬草案，將計劃付之實現。一月十日，該項法案在參眾兩院同時提出。這便是以後的租借法案。

新國會改組時，我被選任為參院外交委員會委員。我那時的任務是通過此一法案。柯克斯則協助我向參眾議員及其他各委員會解釋。對反對者，我們不得不承認戰時所租借出去的，來日償還時為數必不多。但是這樣可使他人繼續對敵作戰，而我們趁此便可訓練並配備自己的軍隊了。該法案於二月十七日在參院提出討論，由外交委員會的傑出委員主持辯論。最後以六十票對卅一票獲得通過。

立法完成後，論爭移到了預算委員會。第一批租借物資批准七十億元。

六月廿二日，蘇聯被侵，世界上只剩了一個大國未被戰爭波及，而這最後一個國家亦將難免。三艘輪船相繼被擊沉。國會將中立法案重加修改，並通過更多的國防經費。總統與國務卿赫爾同時也極關切軸心的東端。日本進駐法屬越南所顯露的侵略野心，並未能被來檳大使的「和平使命」所矇蔽。總統最後於十二月六日，星期六，直接向日皇致送敦促和平的呼籲。次日他接到

了答覆，日本人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了。

珍珠港被襲後的第二天（星期二），最高法院審理一家造船公司與政府的訴訟。我是法官之一，但是我已無心於此。珍珠港戰報不斷傳來，我們俱已理解到事態的嚴重。

星期三清晨，我去見總統。他還在床上，上面堆滿了戰報等等紙張。地板上也是。他已醒了幾個鐘頭，在研究各方情報，計劃未來。我剛走進房，他便告訴我損失的詳情。到此時方始知道我方艦隻所受損害之慘重。總統頗為悲心，他不明白他如此引以自傲的海軍如何竟會如此不堪。

政府為適應突然爆發的戰爭，各方面都急激需要改組。幾乎每一部門都在請求緊急立法。若個別處理，則勢將耗費不少寶貴的時日。我們會商結果，一致認為這些事情最好能成立一個總括一切的法案一併處理。如此，每逢通過一個提案，其餘同類提案，便可毫不費爭執地一併獲得通過了。

這種意見，獲得了發言人雷明與政黨領袖巴克萊的贊助。他們與有關各委員會主席商討後，便由參眾兩院的司法委員會主席提出了二次大戰權力法案。在參院中，僅歷八天便獲得核准。到二月底，在眾院也通過了。

戰時生產機構是另一個緊急問題。勞資兩方固然都已允予合作，但我們生產機構的規模却還够不上同時供應盟軍與本國軍隊的需要。權力分散後所引起的爭執是延滯生產的主因。並且因為駢枝機構衆多，意見多於決定。

霍金斯是當時軍械委員會主席。一月二日，他在電話中徵詢我對於生產問題的意見。那天下午，我寫了一份備忘錄供他參考。我說，與其成立軍需部，徒然因為轉移陸海軍的管理機關而引起磨擦，不如請總統委派一個推動並監督的人。那個人可以有任何方式的機關，但當發生爭執時，他必須有決斷的力量。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華生來說，總統要見我。幾分鐘後，霍金斯打電話給我，請我在往見總統之前一談。他告訴我已將問題大致向總統談過，但未將備忘錄提示。我便要了那份備忘錄帶去見總統。

總統頗為同意。當我催促他付之行動時，他說：「我將選派納爾遜」。

次晨我又去見總統，他已在命人草擬命令，將以備忘錄的意見付之實現。霍金斯到來，即與我們一同準備新聞公報，預備宣佈成立戰時生產局，委派納爾遜為局長的事情。

當天午後六點鐘，總統在按例通知副總統華萊士之後，命令便公佈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國會通過經濟穩定法案。我應總統之請，辭去最高法院法官之職，受命為經濟平衡局局長，管制物價與工資。從十月十五日開始工作，至翌年四月，物價指數增加百分之四·三。於是總統又發佈了所謂限價令，賦予更大管制物價及工資的權力。

不久，我為總統籌劃成立戰事動員處。同時，總統接受我的建議，任命文森繼任我的職務。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起，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辭職，物價指數僅升百分之三·二。他辭職後二

十二個月中，由於限價令的撤銷，物價跳起百分之二十·二。

一天復一天，戰事動員處所臨到的問題，顯示出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世界的命運有着直接並且時常是休戚相關的關係。電量的多少影響着歐亞上空飛機的數量。石油生產與輸送的緩速影響到軍隊進展的速度。用來造船造廠的鋼鐵還得顧到萊茵河可能需要用來建造橋樑。每樣農產品的數字必須詳盡查核，因為這不祇決定我們所能供應的兵額，也決定了我們盟國萬千人民的生死數字。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總統從德黑蘭拍來的電報，便是個證明。他急迫地要知道我們最多能製造若干登陸船隻，最快能何時交出。我知道這必然與三國元首在德黑蘭所討論的開闢第二戰線有關，立即召集各有關機關商討。

十一月廿四日，我覆電總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即六個月後——我們能在本國海港交付各式大小登陸艦艇二萬三千二百四十九艘。不過，必須予以優先趕造，非但供給蘇聯戰線的軍火物資的生產將延緩，本國軍用卡車，海軍艦隻及高度汽油的產量也將一併減少。

此項緊要的資料，幫助德黑蘭的元首們完成了一九四四年夏季進攻歐洲本土的計劃。這是美國生產力使登陸戰畢竟得以如期成功。史達林在某次宴會上曾舉杯盛讚：「若無美國的生產，聯合國永難贏得此次戰爭的勝利。」

即使如此，我們的生產能力是在跟時間賽跑。一九四四年十月我訪問歐洲戰線，見到清勢的

危急。瑟堡附近，有個德國飛彈的發射陣地。那裏是個舊的石窟，偽裝掩護得甚爲週密。當德軍敗潰時，他們還未築好鋼骨水泥的頂。假若我們遲幾個月進攻，德軍便能從此類陣地猛烈轟擊英國，我們也許永遠無法集中進攻軍力了。

由於這種種印象，遂使我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七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午宴席上說：

「美國的這一代可以崇高地獲致或卑微地喪失這世界的希望。假使美國能在平時運用他的生產力，如它在戰事一樣，我們必能崇高地獲得那希望。若美國不善在平時運用它的生產力量，美國與整個世界俱將喪失……這不是留待爭執的理論而是留待應付的實際情勢」。

第二章 雅爾達——三強團結的高潮

在一九四四年聖誕節前後的一週中，有一天我到總統的書房中晉謁總統，和他會商運輸問題。他接過了我送給他的備忘錄，看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說：

「傑美，我要你伴我到克里米亞去」。

這真是完全出于我的意外。他曾經和我談起過好多次關於他將和史達林、邱吉爾會晤的事情，但是他從來沒有提起要我也參加這次商談。他因為我是動員部長，對於國內的情形比較熟悉，而這次商談中是一定會談到經濟問題的，所以要我參加，以便隨時提供資料。我就告訴他，國內正也頗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我還是留下處理這些事情，比較妥當。但是他堅持一定要我去，我也終於答應了，可是我心裏實在還是不大高興。

到決定要動身的那天下午，我先和動員部裏的同人們會商了一下我走後的各種安排。會商的結果，更使我相信，我實在有留在國內的需要。我在會後再去晉謁總統，總統正在叫那個在白宫工作了三十六年的黑人理髮師梅士理髮。梅士還是在塔虎脫總統任內到白宫的，頗得各位總統和白宫人士的信任，他不但謙恭有禮，而且也很識得大體。

梅士一面和總統理髮，我就一面再向總統請求留駐國內。我列舉了他走後亟應處理的許多問題。可是他還是專心致志于國際事務，把內政擱在一邊，還是要叫我去。

當夜，我們就動身到諾福克，在一月廿三日平旦，我們登上了美國重巡洋艦崑山號向瑪爾太進發。

我們離開華府的時候，總統正在重傷風，上船後他傷風更利害了，多半的時間都是消磨在船艙裏的。我們在海上度過了總統的生日（一月三十日），他的女兒鮑諦甘夫人特為總統祝壽，大家趕着在船上出賣零星東西的地方購辦禮物，總統的忠心的菲律賓廚子堅持說，他一定要送一尊蛋糕，可是文武隨員大家都要送蛋糕，結果一共送了五尊蛋糕。

總統雖然也很高興，但是我一看他的臉色，却覺得有些耽心。我覺得他的病似乎不止是普通的傷風，我就把這意思告訴了鮑諦甘夫人，但是以為實際上並不嚴重，我也就不再介紹了。

我們到瑪爾太的時候，他的健康已大有進步。當崑山號進港的時候，邱吉爾首相乘在英艦蘇立斯號上，身穿海軍戎服，在海峽的那一面揮手示意。過了一會，她帶了他的女兒薩拉，到崑山號上來應總統邀宴，與宴者十人，對即將舉行的會議是很籠統的談了一談，但是總統却曾告訴邱吉爾，回程中預備和伊本沙特王會晤，討論巴勒斯坦問題。他希望能使阿拉伯和猶太二族釋嫌修好，邱吉爾口頭上祝他能順利成功，可是似乎並不認為總統有成功之望。

果然，他失敗了。

那一夜，總統第一次乘坐了他的專機「聖牛」號。幾月以前，我就曾屢次勸他坐這只備有特製電梯設備的飛機，可以使他在上下機的時候方便一些。他却總是說他不愛飛行，說是不喜歡看天邊那些單調的雲彩。他還有一個反對的理由，却有些出人意外，他說，爲了他個人專門置備一只飛機，實在是太浪費了。他說，這次置備專機，事前並未得到他的同意，他覺得不妥當。誰知道這樣一個人，倒有人還要稱他爲美國大總統中最浪費的一個！

據我看來，總統對於雅爾達會議並沒有充份準備。在船上，總統，李海上將和我，曾舉行過四五次會議，商討在開會時的提案，尤其着重于關於聯合國機構的建議。後來我才知道，船上裝着一份很詳備的國務院提供的資料，可是當時實在並未仔細研究，我想一半也因爲是總統政躬不豫之故。但是，我也相信除了羅斯福總統以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不經準備就可以好整以暇的本領——實在他對於國際情勢太熟悉了。

國務卿史退丁紐斯已先我們飛抵瑪爾太。霍浦金也來迎候了，他剛訪問了倫敦、巴黎和羅馬回來。他有病，會期中大半的時間他都是在牀上休息，但是他的勇氣使他竟硬撐着出席了每一次會議。

蘇聯方面爲了表示地主之誼起見，對於這次雅爾達會議的種種設備，的確是費盡了心機。我們在沙基機場降落的時候，跑道上的雪花已經打掃得乾乾淨淨。從機場到雅爾達的八十英里一段路上，蘇軍一路守衛得沒有一絲空隙。蘇軍中有許多是持槍的少女。我們的宿處黎凡提亞宮更是

布置得無懈可擊，海軍上將金氏所住的房間，就是以前俄后的閨房。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雅爾達會議正式開幕的一天，正是盟軍在前線節節勝利時候。德軍的大反攻已在亞丹納森林中遭遇挫折，我軍正準備進撲萊茵區域。蘇軍也已發動東線總攻勢，三個月後就佔領了柏林。捷報傳來，大家情緒都極高，有一天總統就和史達林元帥開玩笑，想賭一個東道，賭一賭到底還是蘇軍先入柏林，還是美軍先克復馬尼刺。

這次會議主要的目的，本來是討論設立世界和平機構的問題，但是因為盟軍各線急進的結果，歐洲局勢有急轉直下之勢，會議中自然就談到了歐洲問題。於是，在開始會議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得到了各國代表的同意，就提出了討論「我們在德國怎樣辦」的建議。

史達林立刻聲明，他願意討論一下德國投降的條件，德國未來的政體，賠償和劃定法國佔區的問題，

羅斯福和邱吉爾向史達林建議法國也應參加佔領德國的時候，史達林是同意的。但他的居然同意，顯然是因為法國不過是從英、美佔區中分了一部出去而已。他堅決反對法國參加對德管制委員會。他認為法國參加後反而增添麻煩。他以為法國也許會得寸進尺，甚至要求戴高樂也參加三強會議。他說：「我不能忘記，這次大戰開始的時候，法國是打開了大門讓德國長驅直入的」。

邱吉爾竭力主張應讓法國加入管制委會，他說，德國問題和法國的關係如此之深切，如果不

許法國參加，英國的人民將覺得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而且准許法國參加之後，也不一定就會引起戴高樂參加三強會議的要求。

但是史達林終是不能釋然。他說戴高樂是一個非常「不現實」的人，而且「法國雖沒有打多少仗，戴高樂却也許要求和我們那些打了仗的國家（即蘇聯、英國和美國）享受同等的權利」。

羅斯福並沒有參加關於戴高樂的意見，他對於法國人民是欽佩的，可是並不欽佩戴高樂。他有幾次曾提起過他在卡薩白朗加和戴高樂的談話，戴高樂自比爲聖女貞德，稱自己爲法國精神上的領袖，又會自比爲克里孟梭，說是法國的政治領袖。最初，總統對法國是否必須參加管制會，是並不堅持的，可是討論到相當程度時，他說他希望多考慮一下再說，主張暫緩討論。第二天，霍浦金，美駐蘇大使哈里曼和我都勸總統，主張准許法國派遣代表參加管制會，因爲如果一定不准法國加入，那末也許他們連佔區都不願接受，未免太使法國下不去。總統後來也表示同意了，而且終于說服了史達林，達到了協議。

關於德國問題的另一癥結在德黑蘭會議中的一個非正式建議，主張把德國分割爲若干獨立小邦，會議中對此點討論得並不很久，可是三巨頭對原則上都同意了使德國分割爲若干小邦。史達林主張德國投降時就把這個計劃告訴德國人，邱吉爾却說這問題牽涉頗廣，要從長計議。總統終于建議將此點交外長會議討論，並限在三十天內提供報告。

外長會議中對此點終于未獲協議。霍浦金于五月間訪問史達林的時候，史達林的態度有些不

同了，他說這是英美故意反對德國分割的原則。他主張這件事到波茨坦三強會議時再談，可是到波茨坦會議時，三強的注意力已經集中在別的地方，這件事情還是沒有討論。

在雅爾達會議中，蘇聯代表團對於德國問題中最關切是賠償。開會時，史達林坐在莫洛托夫和曾任駐英大使十一年的蘇外次邁斯基之間。邁斯基在這次會中不但担任史達林的顧問，也還兼充翻譯。蘇聯方面對賠償問題的建議，就是邁斯基提出的。他們提出兩點主張：一是德國除保留百分之二十的工業設備，以供維持國內消費之外，其餘的百分之八十都應該拆卸供盟國賠償，二是德國在十年內應向盟國繳納「歲幣」。他主張德國的賠償總額應以二百億美元為準，其中蘇聯至少須得一百億。

邱吉爾是第一個發表意見的人，第一，他認為蘇聯的要求太奢，因為英國和其他國家在戰時的損失也很慘重。第二，他說，德國人民繳納不起那麼重的賠償，勢將發生饑饉。他說：「若要馬兒跑，你就得餵他一些珍珠米，至少也得讓他吃點草」。

邁斯基反對。他說：「你餵飽了那匹馬，那匹馬却要踢你」。

邱吉爾換了一種說法：「如果你買了一部汽車，你就得給它加上汽油。我建議成立一個賠償顧問委員會，擬具一個中肯可行的計劃」。

羅斯福總統說明了美國的立場，他強調說在第一次大戰後，美國會成千成萬的貸款給德國，「我們決不讓這種事情再度發生了」。

他說：「我們並不需要德國的人力，我們也不要德國的機器、工具、工廠。德國在美國有一點財產，也許可以抵償一點德國該償還美國的款項，不過這些財產的數目是極小的」。會後，我告訴總統，德國在美的資產，大概祇有一億五千萬美元，至多也決不會超過二億。後來，總統就把這數字向會議中提了出來。他聲明，美國並不要使德國人餓死，不過決不能讓德國倒享受一種高度的生活水準。他強調此次戰後，美國經濟狀況未必會好，也許沒有錢可以送給德國，使德國人得以買食物，衣服和重建房屋。結論時，他說無論如何，美國是一定願意盡力幫忙的，最後，他附和設置賠償委員會的建議。

史達林在這時參加了討論。他說：「上一次引起種種麻煩的根由，是因為大家要求以錢為賠償，於是引起了馬克折合外幣的問題。結果是賠償終于因這一問題而完全失敗」。他堅持這次實際作戰的國家應有取得賠償的優先權。他強調法國與三強相比，這次戰事中的犧牲實在是微乎其微。

史達林在結論中建議，三強就這次賠償的標準究因基于各國在作戰中的功績或所蒙受的損失，或者應二者兼顧的一點，應當有所決定。

羅斯福總統在這一階段的討論中，發表了一個至今成為美、蘇聚訟紛紜的聲明。他說：「賠償委員會在初步會商中，應以蘇聯的建議作為討論的基礎，即賠償的總額應為二百億，而其中之半數應歸蘇聯」。

這些話當時確曾列入會議紀錄，紀錄中還有一點，即賠償委員會得考慮以「人力之運用」作為賠償之一種。其實這一句話在會議中並未經過討論，祇是總統曾說過：美國「不能像蘇聯一樣的取去人力」。後來我知道這句話是邁斯基加添進去而經過各國代表團同意的。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我一定要勸總統反對這種准許以大量的人民作為奴役的紀錄，賠償委員會以後草擬的計劃中，終於並未列入「人力賠償」的一條，但是，至今竟還有德國人和日本人留在盟國服役，我實在覺得遺憾。

雅爾達會議中也討論了波蘭的國境問題。羅斯福和邱吉爾都大體上支持所謂「寇松界線」，而准許蘇聯取得產油區路城。史達林說：「寇松線是寇松和克里孟梭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訂立的，蘇聯人既未參加，甚至亦未嘗被邀參加討論。列甯是不贊成寇松線的，你們簡直是要我坍台。試想：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人民將會怎麼說？他們會說，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還不如寇松和克里孟梭倒會保障蘇聯人民的利益！我不能這樣老羞臉回莫斯科」。

說到這裏，史達林激動地立起身來。他說：「我甯可這次戰事延長幾天，以我們的鮮血來作為波蘭擴展西陲的代價。我堅持這一點，我請求所有的朋友們支持我這一點……我贊成把波蘭的西疆延長至尼塞河」。

邱吉爾表示懷疑。他贊成波蘭擴展西陲，可是：「如果那只波蘭鵝吃了那麼多的德國食料，萬一漲死了怎麼辦」？

討論得很長久，史達林終於接受了寇松線，協議的紀錄中說：「三強以爲波蘭的東部前線應以寇松線爲準，在若干地區，得由波蘭多得五公里至八公里。波蘭在西部及北部領土，自亦應有所獲得，留交和會中再議」。

波蘭本身的問題，嚴重性也不在它的疆界問題之下。會議中關於這一點的討論，較對任何別的問題爲長久。辯論極爲緊張，羅斯福總統雖然和邱吉爾一樣，主張在華沙設立一個新波蘭政府，可是在討論中的地位却有些像是一個仲裁人。蘇聯是支持盧布林政府的，史達林同意可以增添幾個人，可是不能影響蘇聯對這個流亡政府的控制權。

總統的意思，是要成立一個包括各黨各派的全國統一的波蘭政府，這個政府可能是過渡性質的，其主要的任務在建立一個永久的政權。他說，波蘭政府應與蘇聯樹立友好關係。又說，這次會議中如果能就這一點獲得解決辦法，那末世界和平之前途，大可樂觀。

邱吉爾說：「英國對德宣戰，目的就在使波蘭成爲自由獨立的國家，我們冒了絕大的危險，帝國的地位，甚至民族的生存，都岌岌可危。我們對波蘭的關切，是因爲有關英國的榮譽。爲了阻止希特勒對波蘭殘酷地攻擊，英國才拔刀相助，今天任何解決波蘭問題的辦法，如果不能使波蘭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英國不願接受」。

史達林答覆的時候，流露出極誠懇的態度。他說：「就蘇聯人民而言，波蘭問題不止是一個有關榮譽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安全的問題。從古以來，波蘭一向是敵國侵入蘇聯的一條走廊。最

近三十年中，德國的軍隊就曾兩度經過了波蘭，進入蘇境。蘇聯祇希望波蘭成爲堅強有力的國家，能用她自己的力量，關閉這條走廊的門戶。當然，波蘭必須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但是爲了獲得自由和獨立，她必須要有實力。所以，對蘇聯而論，波蘭問題不但是是一個涉及榮譽的問題，它還是一個有關蘇聯生死存亡的問題」。

以後每逢討論的時候，蘇聯政府總是用這一套理論來解釋他們在波蘭的一切的作爲。他們之所謂友好的國家，意思就是一個完全被他們控制的國家。盧布林政府正吻合這個條件，於是蘇聯就不敢試一試別的政黨的代表了。

在第一次討論之後，羅斯福總統曾寫了一封信給史達林，建議由華沙和倫敦兩個波蘭政府派遣代表，加入未參加這兩個政府的各政黨的代表，舉行會議，協商建立一個新的波蘭政府。這封信就成爲以後討論的基礎。

參加會議的各代表經過幾天辯論之後，發表了一個文告，內稱：「現在波蘭境內的臨時政府應擴大基礎，容納國內外的波蘭民主人士，改組爲波蘭全國統一臨時政府」。並設立委員會，由莫洛托夫，哈里曼，寇爾爵士等任委員，與各有關波蘭民主領袖進行協商。

在討論將獲協議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問：「要多少時候才能舉行自由選舉呢？」

「一個月以內」，莫洛托夫回答。

可是這選舉一直要到廿三個月之後，才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舉行，而且若照我們的標準

來衡量，是一點也不自由的。

我們到達雅爾達的那天，我聽說國務院草擬了一個對各解放區的文告。最初，總統對文告的措辭不甚贊同，但是我對此事倒頗為關切，于是就根據了總統的意思，和國務卿史退了紐斯及其他國務院人員會商後，重新草擬了一份，得到了總統的同意。以後，艾登外相和莫洛托夫外長也添加了不少修改，于是這宣言就送呈三巨頭。

這宣言提起了大西洋憲草的原則，「任何一國的人民，均有自由選擇其政體之權，凡被侵略之國家，應恢復其人民之主權」。接着說：「三強願意聯合協助各被解放及前軸心附庸國家處理下列各項亟待解決之問題：（一）促成國內和平，（二）施行緊急救濟，（三）建立包括各民主份子之過渡政府，由該政府協商組織永久政府，（四）必要時促成舉行普選」。

三巨頭迅即一致表示同意。我們想，至少在這一點上，總算大家是一致了，誰知道以後蘇聯和我們對於這個宣言的正確解釋，却又意見紛歧，直至于今呢？

對於這個宣言的討論是很簡短的。史達林開始就表示：「大體說來，我贊成這個宣言」。羅斯福請他注意關於促成普選的條文，史達林立即回答：「我接受這一條」。

羅斯福說：「波蘭就應當是第一個適用這一條文的例子……我希望波蘭的選舉要毫無問題，像凱撒的妻子一樣。我不曉得凱撒的妻子究竟如何，可是大家總說她是完全純潔的」。

史達林微笑着說：「的確，人家是這樣的批評凱撒的妻子，但是，事實上，她恐怕也有些毛

病」。

我們的確以為這宣言是向前走了一步，但這一步走得太軟弱了。

美國的羣衆們對這個宣言加以熱烈歡迎。各報社論一致稱頌。自從雅爾達會議閉幕迄今，這宣言一向是蘇聯和我們爭執的根由。但是根據了這一個宣言，我們可以昭告世人，蘇聯在東歐的一切行動，是違反了他們自己的誓言的。就這一點而論，這宣言還是有些用處。

一九四三年十月，美國國務卿赫爾首次帶了一個聯合國機構的計劃到莫斯科。一九四四年秋天鄧巴頓橡樹會議結束時，這計劃大體已獲決定，留待商討的主要之點祇有安全理事會表決的方式問題。蘇聯代表團堅持安理會的一切決議都應經各大國的一致同意，我們也贊成有關需要美軍行動的議案，必須先經我國贊同，可是始終沒有想到否決權竟可以在隨便什麼事情上都能應用的。

羅斯福擬訂了一個折衷方案，這方案一方面由他私人函告史達林，一方面由國務院備就詳細說明，送交英、蘇二國外交部。方案的內容是：安理會在調處二國間爭端，而其中一造係安理會常任理事之一者，則此常任理事國應無投票權。

雅爾達會議的第二天，史退下紐斯國務卿正式提出了這個建議，羅斯福總統隨即要求即予討論。到一九四七年春天，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到原子能管制時，英、蘇代表對否決權之使用頗有爭執。否決權既已成為聯合國機構中的爭執最烈的一點，我想也許可以把當年雅爾達會議討論這問

題時的速記紀錄的要點，在此地記述一下。

當時，美方在提出建議時已說明了立場，故關於本案的討論主要是英、蘇雙方發表的意見。邱吉爾和史達林的話大致如下：

邱吉爾：「世界和平繫于三強之永久合作。但是我們以為，三強也應當在某種限度之內，接受全世界的意見。譬如說，假定中國提出了香港問題，我們英國當然應當有權陳述我們自己的立場。假使我們以為把香港交還中國是一件不對的事情，當然我們就不該把香港還給中國。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不給中國以充份陳述他們那一方面的理由的機會，我覺得那是不對的。我們贊成美國的建議。三強不自居于世界統治者的地位，而肯讓世界其他各國的人民也有發言的機會，我們覺得很好」。

史達林：「我還想把這個建議仔細研究一下，剛才祇是聽見讀一遍，一時不易下結論。我以為根據鄧巴頓橡樹會議的決議，不但決定每一個國家都有發言之權，而且也規定了凡是一有國家提出了某一重要問題之後，即應就該問題成立某種決定。我相信，在座各代表，一定沒有一個還會懷疑到聯合國大會的每一代表是否都有發言權。邱吉爾先生以為中國如果提起香港問題，中國祇要能發表意見，便已滿足。邱吉爾先生也許錯了。中國是會要求就這一問題獲致某種決議的。埃及亦然。埃及不會空是表示意見，要求歸還蘇彝士運河，她也會要求成立決議。所以，這問題是很嚴重的，不止陳述意見而已。我也想問問邱吉爾先生，誰想

做世界統治者，我要他提出名字來。我確信英國是不願做世界統治者的。三國之中有一國已經洗刷了嫌疑。我知道美國也是不願統治世界的，所以在蓄意統治世界的國家中又除去了一國」。

邱吉爾：「我可以答覆嗎？」

史達林：「等一等。強國應在何時接受關於可以洗刷他們蓄意統治世界罪嫌的條文？我要研究一下這個文件。在目前，我還覺得不大明瞭。我覺得這一點比讓各國發表意見之類要嚴重得多」。

邱吉爾：「我知道三強國在今天出席代表它們的領袖之下，我們是可以認為安全的。但是這些領袖未必都能永久長生。十年過後，我們也許已經不在了，接着來的是新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可怕的戰事，他們也許會忘了我們這一代所遭受到的一切。我們要至少確保和平五十年。我們已經建立了這樣一個格局，擬具了這樣一個計劃，我相信後一代的爭執，可以由我們自己來儘量代為解決了」。

史達林：「目前的任務就是要確保我們將來能永久團結一致，爲了這個目的，我們現在必須獲致就這一點的協議。未來的危險就在于我們自己之中會不會發生衝突。如果我們能團結一致，德國將來的威脅是不足齒數的。現在我們該開創一個局面，包括我們此地代表的三強，還有中國——」。

邱吉爾：「——還有法國」。

史達林：「對，我們該結成一條聯合陣線，我應該對與會諸君道歉。我近來因為別的事情極為忙碌，所以沒有功夫對這一個問題仔細研究，我對美國這個建議的看法，它的意思是要求把一切國際爭執分成二類——一種是需要軍事制裁的爭執，一種是可以不經軍事制裁而用和平方法解決的爭執。據我所了解，在考慮到第一種即需要軍事制裁的爭執時，爭執兩造之一方如為永久會員國，仍應有投票權。而處理第二種即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爭執時，爭執兩造之一是無權投票的。我們把投票的程序看得太重了。誠然，一切問題都是靠投票決定的。我們所關心的是決議而非討論，如果中國是永久會員國，要求歸還香港。我可以確切告訴邱吉爾先生，中國是不會孤獨的。在大會之中他們會發現許多朋友，埃及的情形亦復如此」。

邱吉爾：「到那個時候，我可以說『不成』。我應當有權宣布：在未經我們同意前，世界安全機構不得有不利我們的行動」。

史達林：「這又是一個危險之點，在莫斯科，我的同事們總不會忘記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的時候，英法利用了國際聯盟來反抗我們，最後是把它們排除了出來，使我們孤立」。

羅斯福：「史達林元帥如果需要充分的時間研究這個建議，當然是可以的」。

史達林對於安理會表決程序的建議，竟然連讀都不肯讀一遍，實在使我深感困惑。這個建議

還是十二月五日航空寄給他的，而討論的時候已經是二月六日了。我不禁想：如果在這六十三天中他還沒有把這個問題弄清楚，那麼他對聯合國機構之不感興趣也就可想而知。

到下一天，莫洛托夫宣布蘇聯已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是我的疑慮迄未消釋。

接着討論的是那些國家可以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史達林說：「我有一張對德宣戰國家的名單。他們應當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其中有十國是和蘇聯沒有外交關係的〔作者按：此十國大多為南美國家〕。我們將來聚首一堂，原是想建立國際安全，如果他們和我們根本上連外交關係都沒有，試問又怎樣談得到國際安全呢？今天的會議中，這一件倒可以討論一下」。

總統說：「我想這些國家之中，多數是願意和蘇聯訂立國交的，他們祇是一時還來不及先這樣做而已。而且，我們這一點也要認清，從勃里頓森林會議起許多次會議中，很多至今還沒有承認蘇聯的國家，也曾和蘇聯的代表坐在一起商討」。

史達林說：「誠然，但是要談到國際安全的時候，這就有些困難了」。

羅斯福說：「要建立完好的外交關係，我看最好的辦法就是邀請他們一同來，我會函告拉丁美洲六個國家的總統，如果要加入聯合國，便應當對德宣戰。厄瓜多就這樣做了，巴拉圭在一星期或十天之內宣戰，祕魯和烏拉圭不久也要這樣做，如果他們宣戰後還不許他們加入，我看不大妥當。而且，在作戰時他們也給我們不少幫助，我們製造軍火的許多原料，都是他們供給的。所以，我很覺得為難。除此之外，還有少數曾和我們合作的國家，他們曾對德斷絕邦交，但是沒有

宣戰」。

史達林問：「阿根廷如何？」

羅斯福說：「阿根廷是不在其列的」。

史達林說：「但阿根廷也會和德國絕交呀」。

羅斯福說：「但是我們並不認爲是和我們聯合在一起的」。

史達林說：「我並不是幫阿根廷說話。我不喜歡他們。我不過是怕自相矛盾而已。如果我們既邀請宣戰的國家，同時也邀請沒有宣戰的國家，那末阿根廷一類國家的地位，就發生了問題。土耳其等國也會來罷」。

羅斯福說：「那末我們就祇邀請那些準備宣戰的國家」。

史達林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宣戰呢？」

羅斯福說：「馬上宣戰。你定一個時限罷」。

史達林說：「那麼，三月一日如何？」

羅斯福說：「好。就是三月一日」。

邱吉爾也贊成這個決定，他提起了土耳其，他說土耳其之至今中立，是我們鼓勵他們這樣的。史達林雖然有些不願，終於也表示同意了。

一等到蘇聯正式宣布接受羅斯福總統關於安理會表決程序的建議之後，莫洛托夫立刻宣布：

希望白俄羅斯，烏克蘭，萊多尼亞能加入聯合國。他說無論如何至少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總要加入的。史達林也爲此發出了有力的呼籲。

邱吉爾支持蘇聯這個請求，他說：「我嚮往白俄羅斯，他們浴血打倒了暴君」。

羅斯福總統不願同意，但是不便反對史達林和邱吉爾的意思，他於是建議這問題交外長會議或大會中繼續討論，大家並無異議。可是在下一天下午，總統在會議中宣讀了外長會議的一份報告。其中有一條是有關聯合國的會籍問題的，報告中說，「英美代表願支持准許兩個蘇維埃國家入會的建議」。

這個報告也通過了。

我後來知道，艾登外相爲了想把所有不列顛帝國各自治領都列入會籍，包括尙未成爲自治領的印度在內，所以支持蘇聯的建議。史退丁紐斯國務卿因之也表示同意了。

我覺得這辦法很不好。會後就極力向總統進諫。我提醒他，在我們離開華府之前，他曾告訴許多國會議員，如果蘇聯要叫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加入聯合國，他就一定要堅持美國的四十八個州每一州都成爲聯合國的會員，因爲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我們的州比較起來，不見得有更大的自主權。

我回想到當年國際聯盟的情形。當時，英國和他的各自治領得一票，一總有五票之多，美國如果加入國聯就祇有一票。這是反對美國加入國聯的最堅強的理由之一。現在，蘇聯一舉手已獲

得三票。所以我力勸總統要求，至少美國應擁有和蘇聯相等的票數。總統說恐怕已經太遲了，但他願意加以考慮。

霍浦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也勸總統堅持美國應得三票，否則就撤回對這兩個蘇維埃國家入會的同意。總統終於告訴我們，他將這件事通知史達林。二月十日，我在雅爾達的最後一天，總統寫了一封信給他，要求票數均等。第二天，史達林告訴總統說，「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加入聯合國後，蘇聯的票數已有三票，所以美國要求增加票數，是非常合理的。美國也可以有三票。必要時，我可以在討論時正式支持美國這個建議」，他完全表示同意。

羅斯福總統也徵求邱吉爾的意見，邱吉爾說，關於美國要求和別的国家平等的任何建議，他無不竭力擁護。

我回到華盛頓時，桌子上有一封霍浦金給我的電報：

「票數問題，總統獲英相及史達林元帥極滿意之答覆，此事擬不予公開發表，總統亟願足下嚴守機密，即對親信亦盼勿透露」。

我想這件事的守秘密一定有原因，就遵從這個要求。

到舊金山會時，總統和他的顧問們決定，票數問題不向大會提出。這件事他沒有和我討論過，所以我不知道他何以忽然又改變初衷。不過雖然蘇聯有三票而我們祇有一票，輿論的反對倒的確並沒有我當初想像中之劇烈。可是這件事造成了先例。蘇聯集團的代表們得寸進尺，在二十

一國會議中堅持一切提案均需以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他們祇要八票就可以推翻任何提案，而他們本身就先已有了三票。

後來，我又突然碰到了雅爾達會議的另一協議，這就是所謂雅爾達密約。爲了要蘇聯加入對日本作戰，要把千島羣島「移交」給蘇聯。還有，「俄國因一九〇四年遭日本卑鄙之襲擊而損失的權利，應當予以恢復」，還列舉了這些權利，如庫頁島南部歸還蘇聯，大連港之國際化，旅順應借租給蘇聯作爲海軍基地，中蘇共管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等等。有關中國領土的部份，美國應運用其對中國的勢力，使中國政府同意。

我以前不曉得有這一個密約，我不知道這密約的原因是大家可以了解的。那時的國務卿是史退丁紐斯先生，不是我。

那時，因爲華府的公務待理，總統叫我和金氏上將於二月十日先回去。我們以爲會議在那天晚上就可以結束，總統自己大概遲一天也就可以回華府。可是那天下午，史達林留總統多耽擱一天，他說還有要事亟待商量，總統答應了，關於千島羣島的事，是由三巨頭私人會商決定的，並沒有正式開會討論。在二月十一日，他們簽訂了包括這一協議的全部密約，如果那一天我還在雅爾達，我也許會知道這件事。

總統回來後也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那份密約也就鎖在白宮中他的保險箱裏面，到那一年的初夏，我知道羅斯福總統曾勸導中國對旅順，大連及鐵路等項作種種讓步。一直到我做了國務

卿，才從一條莫斯科發出的新聞中略知風聲，我立即從事調查，於是才知道了全部密約的內容。我把這件事告訴杜魯門總統，總統就通知李海上將，把白宮中一切有關外交的文件全部移交國務院。我想查一查我們到底對別的國家簽出了多少借據。

在衡量羅斯福總統當年簽訂這些有關太平洋局勢的文件時，我們必需明瞭當時的局勢，才能知道羅斯福總統的做法是否明智。那時正是德軍在西線發動大反攻之後的六個星期，雖然我們在東西兩線都有進展，但德軍究竟還能堅守多少時候，我們在德軍投降前還需要多少傷亡，那時是誰也不能預知的。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的時候，盟軍聯合參謀本部的首長都在總統左右，他們是瞭解當時的局勢的。

很清楚的，這個協議大體是一種軍事上的決定，各軍事領袖對日本登陸戰的計劃已在進行之中，總統無疑的一定從這計劃中獲悉蘇聯之是否參戰，對我們軍力的損失能發生何種影響，他們當然希望蘇聯參戰，在北戰場牽制日本的兵力。但是，史達林一聽說日本登陸戰的計劃已在進行草擬，他立刻就知我們一定要借重他的軍隊，可以提條件了，史達林討起價來是從來不會害羞的。

羅斯福總統把這個協定嚴守秘密，也並無可議之處，那時蘇聯還是和日本有條約關係的，我們自然不好宣布蘇聯準備對日作戰。而且，那時蘇軍的主力集中在德國戰場，如果這個協議略有走漏，日本軍隊立刻就會侵入蘇聯邊境，所以爲了大家的利益，我們同意讓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九

十天內，把德國戰場上的軍隊調至遠東。所以，史達林和羅斯福一定要把這協議嚴守秘密，是應當的。

會議結束的時候，史達林大宴賓客，據當時報紙記載，有一個細心的美國客人會數了一下，從始至終，一總乾杯了四十五次！我有些相信這個話，不過我覺得需要說明，否則大家一定以為我們都醉得人事不省了。事實是，「乾杯」的時候，大家祇把嘴唇碰一碰杯子，有時也稍為喝一小口。這一頓飯吃了四個鐘頭。四小時內喝四十四小口酒，同時還有以維持二十四小時不致飢餓的茶，大概誰也不大會醉。我就一點酒也沒有喝。

當我們喝湯的時候，我看見維辛斯基先生把開水倒在伏特加酒杯裏。伏特加的顏色是和水的顏色一樣的，我就想，他既能以水充酒，我為什麼就不可以。等到大家立起來乾杯的時候，我就乘機倒開水到酒杯裏去。報上說很有幾個蘇聯官員喝得大醉，但是我倒要說一句，我所碰到的幾位都非常清醒。在任何宴會中，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蘇聯的代表喝醉了酒。

大家紛致祝辭時，史達林有一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戰時是大家容易團結在一起的，因為我們有同一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真正困難的工作是在戰後，各人的利害關係，可能使盟國間發生裂痕。我們之間的關係，在戰後要與戰時同樣的親密。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可證明他預言的準確性，關於我們責任的那一點，我是贊同他的見解的。

雅爾達會議的經過，是在二月十二日下午，在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同時公布的。所有盟國一致稱頌，美國的輿論尤其熱烈。費城「紀錄報」說，這是「聯合國最大的勝利」。紐約「先驅論壇報」說，這一件事是「盟國團結一致的又一個證據，它表示了盟國的堅強的力量」。「時代」雜誌稱：「三強能否在和平的時候像戰時一樣的合作無間，至今已令人深信不疑了」。

我當時的感想也是如此，毫無疑問的；英、蘇、美三國的交誼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但是，當羅斯福總統剛剛回到了美國的土地的時候，這個高潮已經在開始慢慢地低落了。

第三章 局勢開始轉變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回到了美國以後，有許多繁重的工作要幹。當時人力至感缺乏，所提出的「全國服役法案」，是有關各方面爭辯的主題。鑒於歐洲戰事快要結束，我們全部的生產計劃，都得重加審查。歐洲勝利後的租借計劃，剩餘物資的處置，及緊急救濟計劃，都在製訂中，全國工業從戰時轉變到平時的政策也在計劃中。

在我出國時期，由於局內同人的努力，這些計劃已大有進展。由克萊將軍(Lucius D. Clay)主其事，紐約的一位工業家希爾斯(Fred Sears)予以襄助。

在前一年六月，國會議論將「戰時動員局」擴充為「戰時動員及復員局」法案時，我就聲明我將不參加戰後的工作。當時我們認為，在歐洲戰事結束以前，關於復員工作沒有甚麼可做的。但是，當我們從雅爾達回來以後，我們立即決定工作的重心，應該從動員轉移到復員。

所以，我必須考慮到辭職的問題。因為將來執行復員工作的人，應該參加草擬復員的計劃。至於提出辭呈的時間，頗傷腦筋。我們知道歐洲的勝利，為時不遠；不過華盛頓方面所清楚的事情，歐洲的士兵也許還不怎樣瞭解，他們還須打過萊茵河呢。我不願意爲了國內的便利，而

給前方將士一種誤解，而認爲負責國內工作的人，缺乏努力和熱情。

到了三月中，我們已經在萊茵河東岸獲得據點，而德軍當局建議在瑞士晤談，商量義大利境內德軍投降的問題。到了三月二十三日，美軍開始渡萊茵河，我覺得再不能拖延辭職的日期了，於是我向總統提出辭呈，要求自四月二日起辭職。

羅斯福總統勸我繼續幹下去，我提醒他說，去年秋天他曾經答應我，歐洲戰爭結束以後，我可以歇手。我告訴他說，我離開最高法院，僅是擔任戰時的工作，我不願意擔任平時的局處首長。將來負責指揮復員工作的人，應該參加草擬該項計劃。所以現在必須換一個人來幹。

我們討論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德國佔領工作計劃。羅斯福總統知道陸軍部計劃派陸軍次長麥克勞埃（John J. McCloy）到德國去主持佔領工作。我告訴他麥克勞埃決定和史汀生部長同留國內，陸軍部已另選我的副局長克萊將軍。出乎我的意外，他並不知道克萊將軍。我告訴他，克萊將軍是陸軍官員中，對於一般人民觀點最瞭解，最明白的一位。羅斯福總統叫我陪他來談話。當日總統要去海德公園，不過下星期去溫泉時，將在華盛頓耽擱一天，我們就決定在那一天三個人會面。總統到達海德公園不久，就打電話給我，請我重行再考慮辭職的事。但我仍舊決定不幹，他叫我推薦一個繼任的人，我介紹文森法官（Fred M. Vinson），他曾接替我，繼任經濟平衡局局長。總統表示同意，並且說，等他回華盛頓以後，我們再討論。

總統回來的那天，非常煩躁不安。我們談話的時候總統說，他很贊成派克萊到德國去，因爲

克萊是位工程師，總統問他，對於在中歐建立一個 T. V. A.，發展電力，解除煤荒，有甚麼意見？總統告訴我他將任命文森繼任我的工作，因為他在離華盛頓赴溫泉以前，還有一些事，叫我先告訴文森，他等一些時，再打電話給文森。

在等候文森法官的正式任命期間，我和總統通了幾次電話？（我有一條直接通到溫泉的電話線），他說身體好些了。

四月八日，我回到斯巴坦堡。四天以後，無線電中傳出了消息，羅斯福總統逝世了。

海軍部長福萊斯特打電話給我，他派他的飛機到斯巴坦堡來接我回華盛頓，因為他想，在那幾天中，也許我可以盡一點力，並且他知道，我要參加總統的葬儀。

次日清晨，我去見杜魯門總統，他因突然落到肩頭的重任而感到困惑，但很快的就能熟悉他的處境。當天下午，我又回到白宮，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和他同車去接故羅斯福總統的遺體，運往海德公園。

在回華盛頓的火車上，杜魯門總統和我談論了很多事情。因為我辭職不過數天，所以我還能够告訴他許多國內國外重大的問題。在這次談話中，他希望我能代表他出席將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

我告訴他，我雖然非常高興担任他的代表，不過這樣做是不合式的。因為當時代表團已任命了，其中有若干非常能幹的人物。根據以往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再加派一個總統個人的代

表，往往要引起代表團極大的不滿。杜魯門總統同意了我的意見。

次日，他告訴我，他想任命我爲國務卿。我不願意在和平時期，擔任從事復員工作的首長，不過，我却願意參加促成和平的工作。我說願意接受這種任命，我們同意等舊金山會議結束以後再宣佈。

也許沒有任何一位新的總統，像杜魯門那樣，在最初上任的幾星期，遭遇到那些大事變。德國的崩潰與投降，舊金山會議的召開，都是世界矚目，全世界都爲勝利所震動，對於未來充滿了無窮的希望。

不過，參加雅爾達會議以後，我們這些熟悉蘇聯活動內幕的人，在希望中混雜着重大的心事。

在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前，事實上，在他從雅爾達回來之後，和蘇聯方面就發生了一些困難，兩大主要難題是波蘭和羅馬尼亞。

在「被解放的歐洲宣言」中，美英蘇三國同意「在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中，三國政府採取一致政策，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舊軸心附庸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並更進一步，說明三國政府「將聯合協助」該區人民「成立臨時政府，容納民衆中一切的民主份子，並確保儘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建立充份代表民意的政府」。最後並稱：「當三國政府認爲歐洲任何被解放國家或前軸心附庸國

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當即履行本宣言中所列舉的共同責任。」

不過，在二月二十四日，離雅達爾會議不過兩星期，羅馬尼亞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美英代表，要求召開一次會議，被蘇聯主席拒絕。同一天，哈里曼大使受命通知蘇聯政府，美國希望羅馬尼亞的局勢，能够在盟國管制委員會或由三國更高當局咨商，獲得有秩序的進展。

三天以後，蘇聯的答覆到了。莫洛托夫的副手維辛斯基到達羅馬尼亞京城，要求取消當時的拉第斯古 (Radeau) 政府，成立新羅馬尼亞政府。同時，莫洛托夫通知美國大使稱，拉第斯古政府不能維持治安及履行停戰協定，盟國管制委員會應採取適當措置，並通知各盟國。

哈里曼大使奉命立即通知蘇聯政府，美國不能同意由一黨代表組成的羅馬尼亞臨時政府。訓令中並稱：應該採取措施支持現政府維持治安，並應根據停戰協議，予以新聞自由；所有政黨全應解除武裝，對於主要政治問題，應由盟國管制委員會三國協商。

莫洛托夫回答哈里曼稱：維辛斯基現在羅馬尼亞京城，三強可以協商。

三月五日，美國大使以照會一份交莫洛托夫，說明拉第斯古政府是三國政府直接協商所議定。他通知莫洛托夫稱，盟國管制委員會的蘇聯代表沒有以情報供給美國代表，同時蘇聯的軍事當局削減了拉第斯古政府維持治安的力量。

當美國大使和蘇聯外長在莫斯科交換意見的時候，維辛斯基於二月廿七日到達羅京，要求當晚會見羅王。羅馬尼亞國王和外相接見了他。維辛斯基稱，拉第斯古將軍不能維持治安，蘇聯政

府並不願意干涉羅馬尼亞內政，但是有責任使後方安寧，所以要求立即撤消拉第斯古政府，而以真正代表該國民主勢力的政府代之。羅王表示對於他的要求將予以考慮。

美國在羅京的政治代表拜里 (Burton Y. Berry) 會見不到維辛斯基。於是他以書面把美國的意見通知維辛斯基：在三國協商之前，不能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根據拜里的報告，維辛斯基次日要求謁見羅王，詢問羅王對於前晚建議的決定。羅王答稱：已將此事通知拉第斯古將軍，並徵詢各政黨領袖意見，以便另選內閣總理。維辛斯基認為這種答覆不滿意。他看了看他的手錶，向羅王說，他只有二小時另五分鐘就得公佈拉第斯古將軍免職。到了八點鐘，維辛斯基加重地說，羅王必須公佈繼任組閣的人選。

羅馬尼亞外長告訴維辛斯基說，羅王是立憲君主，必須根據憲法行事；他必須和各政黨領袖商談，根據他們的建議，挑選組閣的人物。維辛斯基說，拉第斯古包庇法西斯份子，利用勅令使十名將官退休，對蘇聯政府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爲。該項勅令必須撤消，羅王在這一點上表示讓步。維辛斯基臨走時，他狠命的把門關上，門框上的灰泥都震裂了。這裂痕一直沒有補好，可以作為維辛斯基情緒和手勁表現的例證。

羅王宣佈，他請斯特貝王子 (Prince Sereby) 組織新政府。斯特貝王子想接受，但他無法使共產黨參加。不久，維辛斯基告訴羅王稱：蘇聯政府認為共產黨領袖葛羅柴 (Peter Gura) 是適當的組閣人選。不過，羅王仍在繼續和政黨領袖會商。到了三月一日晚，維辛斯基又往見羅王，

重申蘇聯政府希望任命葛羅柴組閣。於是羅王決定命葛羅柴組織新政府。

因爲葛羅柴第一次所提出的內閣人選不能代表人民，羅王加以拒絕。維辛斯基又警告羅王，說是取消葛羅柴所挑的人選，是對蘇聯的一種敵對行爲。維辛斯基說：假使在第二天下午，羅王仍不接受葛羅柴政府人選，蘇聯對羅馬尼亞的獨立將不負責。

同時，葛羅柴宣佈：蘇聯答應大大改進蘇羅兩國關係，交還羅馬尼亞交通控制權，自匈牙利割讓外錫爾凡尼亞，減輕停戰條款等。結果，羅王於星期一召集各政黨領袖，請他們不必做政治上的考慮。支持他接受葛羅柴政府。

各政黨領袖表示不能同意，有人勸羅王禪位。羅王表示他將爲人民服務，不擬離去。到了星期二晚（三月六日），葛羅柴政府宣誓就職，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也隨即到達羅京，他和維辛斯基同時謁見羅王，表示如果後方不安定，他們無法集中力量在前線作戰。羅馬尼亞政府過去沒有能够維持治安，以後，不能再如此了。

在三月七日，葛羅柴政府成立以後，莫洛托夫通知莫斯科的美國大使，說是他三月五日照會中的問題，已不成立，羅馬尼亞的危機，已因新政府的成立而消除了。

到了九月裏，我在倫敦的時候，莫洛托夫敦促美國承認羅馬尼亞政府。我告訴他說，美國不承認葛羅柴政府，因爲它是由維辛斯基向羅王提出，限二小時半答覆的哀的美敦書而成立的。莫洛托夫那時承認維辛斯基「幫助新政府的組成」，但稱蘇聯政府必須這樣做，「因爲有發生嚴重

混亂和內戰的危險」。

這些發展情形，當然全都有報告給羅斯福總統。結果，總統訓令哈里曼大使，向莫洛托夫建議，在羅京成立聯合委員會，保障「被解放歐洲宣言」中各原則的實施。莫洛托夫斷然拒絕這種建議。在三月十七日的照會中，他說沒有採取行動的必要，美國的建議將削弱盟國管制委員會。並稱：委員會中美國代表從未徵詢意見一點，並非事實。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盟軍將迫近柏林的時候，羅斯福總統不願以公然分裂的姿態，給敵軍一種幫助和快慰。總統告訴我說，對於未來，他抱着極大的隱憂。他決定仍由哈里曼大使向蘇方提出抗議，等到一切方法都無效以後，再由他直接和史達林交涉。

一九四四年秋，邱吉爾首相曾偕外相艾登訪問莫斯科，當時並沒有正式的協議，不過雙方有一種非正式的諒解，如果英國認為必須採取軍事行動壓平希臘的內亂，蘇聯將不予干涉。另一方面，英國承認蘇聯在維持羅馬尼亞治安方面，有領導權。

英國極不贊成蘇聯在羅馬尼亞的行動，但他們不願意首先向史達林提出抗議。羅斯福總統認為羅馬尼亞的情形，並不是美蘇關係最好的試驗。英國和美國，在羅馬尼亞並沒有武裝部隊，它完全是在紅軍控制之下。蘇聯必須保持一條交通線，從它本國，經過羅馬尼亞，直達德國境內的紅軍，總統知道，蘇聯將指這種行動是保護紅軍所必需的。而且蘇聯也知道美國無法獲得其他情報，來駁斥蘇聯的說法，因為羅馬尼亞完全在紅軍控制之下。羅斯福總統覺得蘇聯在波蘭的行

動，更明顯的違反雅爾達協定。

雅爾達協定中，關於波蘭的決議是這樣的：

「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卡爾，受命以一個委員會的資格，首先在莫斯科和現在的臨時政府委員，與波蘭國內外其他波蘭民主領袖進行會商，以便根據上述方針，改組現政府。」

三月二日，羅斯福總統在國會聯合會議發表了樂觀的報告以後，接到了哈里曼大使的來電。他報告說：莫洛托夫堅持只有波蘭臨時政府（盧布林政府）推荐的波蘭人，才有資格和委員會協商。莫洛托夫的名單中，從倫敦波蘭流亡政府邀請到莫斯科會談的，只有一個人是和美國所開的名單相同。他斷然拒絕邀請波蘭農民黨領袖米柯拉葉齊克（Mikolajczyk）。米氏參加倫敦波蘭流亡政府，曾由羅斯福總統推薦給史達林。

莫洛托夫堅持盧布林政府應該是全國統一臨時政府的「核心」。委員會中的美英代表，否認這種解說是符合雅爾達協定的。他們指出雅爾達協定中所規模的，是一個「新」政府，並不是擴充盧布林政府。這種僵局的後果，是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不得不和史達林元帥直接商談。

三月下旬，邱吉爾向羅斯福表示，雅爾達協定已被破壞，如不改變這種局勢，難免有嚴重的後果。三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覆稱：自雅爾達會議以來，他也以「焦慮和關切的心情，注意蘇聯態度的發展」。他並說他「非常明白目前情勢的危險，不僅是當前的爭執，還有舊金山會議以及未來世界合作等問題」。在這份覆文中，還附有一份羅斯福預備給史達林元帥的電文草稿。

羅斯福總統於四月一日致電給史達林元帥，邱吉爾首相也致電史達林，支持羅斯福。

羅斯福總統的電文開頭，說明自雅爾達會議以來，對局勢發展的關切；對於未能實施雅爾達協定，表示遺憾。特別是關於波蘭問題。並且說：他「不了解蘇聯的「毫不關心的態度」。他覺得事情的根源，起於蘇聯對雅爾達協定的解釋，認為新的臨時政府，無論如何總是現在華沙政府的繼續發展。但不論根據協定條文，或是簽訂協定以前的討論，這種解釋都是不符事實的。總統並說，他必須向史達林元帥解說明白：「任何一種解決辦法，倘結果僅是一種現政府的繼續，根本不能接受，且將使美國人民認為雅爾達協定失敗」。如果委員會挑選波蘭人到莫斯科的權力受到限制，則雅爾達協定的基礎已被破壞。羅斯福總統說，他決不否決莫洛托夫提名參加協商的波蘭人，因此美國大使所提名的人，也不應受到反對。他告訴史達林：波蘭應該有最大的政治均勢，各派停止鬥爭。他並且主張：由於責任的重大，委員會中的美英兩國代表，可以到波蘭去訪問。羅斯福總統指出，解決波蘭問題，對於國際合作的成敗，關係重大。否則在雅爾達所考慮到的，那些妨礙盟國統一的困難和危機，將更趨嚴重。

關於羅馬尼亞，羅斯福總統說，他不懂為甚麼那一方面情勢的發展，未能和雅爾達協定中「被解放歐洲宣言」所規定的條款相符。他請史達林親自查閱兩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往來照會。

到了四月七日，史達林的覆文到了，承認波蘭問題已成僵局。但稱，這是因為美英兩國大使

背棄了雅爾達協定。他說，他們認爲目前已存在的臨時政府，應該根本解散，另外組織一個全新的政府。哈里曼大使並在委員會中說，在波蘭全國統一政府中，可能連一個波蘭臨時政府份子也不包括在內——哈里曼否認他說過這種話。

史達林認爲三強在雅達爾同意自波蘭邀請五人，倫敦邀請三人參加協商，但英美兩國大使則主張，可以無限制地自倫敦和波蘭邀請參加的人。史達林說，被邀請的波蘭領袖，必須承認雅爾達協定，包括寇松界線，並「真正努力建立波蘭和蘇聯的友好關係」。只要懂得史達林所謂「友好關係」的解釋，就可以知道這是指一個領袖，肯建立一個聽命於蘇聯的政府。

史達林給邱吉爾的覆文中說，他可以撤消反對邀請米柯拉葉齊克，不過米柯拉葉齊克必須公開聲明承認雅爾達決議，並擁護建立蘇波友好關係。對於美蘇觀察家訪問波蘭，史達林則加以拒絕，說這足以損波蘭國家的尊嚴。

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決定聯合致覆史達林，但在國務院和英外交部準備聯合覆文時，羅斯福總統逝世了。

在一月十一日，義大利方面的盟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元帥，自戰略局方面獲悉，凱塞林將軍和若干其他德國將領願意在瑞士商談，義大利境內德軍投降問題。聯合參謀總部核准亞歷山大的計劃，派遣他的副參謀長到白恩去，但必須在通知了蘇聯以後。哈里曼大使把這事告訴了莫洛托夫後，莫氏稱：蘇聯政府願意參加這種討論，將派三名紅軍軍官參加。於是，蘇聯參謀總部通知蘇

聯政府，說明在白恩並沒有甚麼特別任務，不過是安排在義大利卡賽他（Cassino）盟軍總部舉行的會議，歡迎蘇聯代表到卡賽他來。並說明亞歷山大為該方面的最高指揮官，如果德國要求投降，亞帥將負責談判，並作必要的決定。

蘇聯政府答覆稱：因為他們的將領不能參加討論，所以不派代表到卡賽他了。覆文中並堅持談判必須停止。

數天之後，史達林致文羅斯福總統，聲稱：如果在蘇聯戰線上發生同樣情形，他決不致反對英美派代表參加討論。他說，他了解這種談判的重要性，因為它會影響到東線的軍事情況。

羅斯福總統答稱：並沒有進行任何談判，並保證隨時將消息通知史達林。史達林的下一封覆文，大大地觸怒了羅斯福總統。

史達林在文中指稱：所謂商談並沒有進行，顯然是因為總統沒有得到自己將領的報告。史達林並說，根據紅軍顧問給他的情報，商談已經完成，凱塞林將開放德軍陣地，讓美軍前進。爲了報答這種軍事協助，英美雙方同意給予德國較優的和平條件。史達林並指責稱：由於這種協議，德軍已自義大利前線抽出三師的兵力，調到蘇聯方面。而美軍得以在德國境內順利推進。

羅斯福總統不顧他個人的反感，發出一封嚴正的答覆。總統指出，德軍從義大利前線抽出三師兵力到蘇聯方面，是在亞歷山大元帥接到德國意欲商談投降一事的好幾星期以前就開始了的。所以此項商談與德軍的調動，根本沒有關係。總統稱：史達林應該信任他的忠誠。艾森豪威爾將

軍決不會在沒有報告他以前，進行和平商談，事實上，並沒有如史達林所說的那種商談。在最初接得德軍要求商談和平時，就已下令，必須隨時把全部消息通知蘇聯。

總統在覆文的最後一段，流露出個人的觀感。他說，對於蘇聯情報員的「可惡的謊言」，他深表憤慨。並稱：蘇聯情報員意圖破壞美蘇兩國的友誼。在盟國勝利即將來臨時，這種破壞統一的誤會之存在，無疑的，將造成一幕悲劇。

史達林覆文稱：對於總統的忠誠，他決無懷疑。但仍稱：他相信自紅軍顧問方面所得的情報正確可靠。他說，他有理由相信這種情報正確，因為不久以前，馬歇爾將軍和英軍司令曾好意地通知蘇聯指揮官，說是德軍在某一點集中，準備向蘇聯進攻。但蘇聯將領知道這個情報是錯誤的，德軍的攻擊，將在另外一點上發動。紅軍把兵力集中在他們認為正確的據點上，阻擋了德軍的攻勢。他說美英將領受德軍之騙，但這也正證明蘇聯將領情報的正確。不過，他們感謝美國人的協助。就全文而論，史達林的這次覆文，誇氣已大為和緩。四月十一日，羅斯福總統致電史達林稱：這次不幸事件平安過去，他頗快慰。

這時，因為其他的原因，對德商談延期了。同時盟軍聯合參謀總部建議，三強對於各戰線上的投降商談，都應參加，但任何戰線的投降商談，不能因有一強代表缺席而延展。蘇聯軍事領袖對於這種建議表示同意。

史達林的指責，和他顯然相信我們正在祕密和德國商談和平，以及文件中所使用的令人難堪

的文句，深深地激怒了羅斯福。杜魯門總統繼任後，讀到這些文件時，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觀點和所取的態度完全贊同。

就在羅斯福總統接到史達林最後一封函件的那天，他也接到一封邱吉爾的來信。內稱：在最近幾天內，他將在上院中發表關於波蘭問題的文告，而其中不免要討論到對蘇關係。他深盼在此緊急關頭，所發表的言論，不要影響到軍事方面。他徵求羅斯福總統的意見。

雖然當時總統對於蘇聯的態度已大失所望，但他仍保持一種冷靜的態度。他得到一種結論：和蘇聯相處，並沒有一簡單的公式可以遵循。

在四月十二日，他逝世前一小時，羅斯福總統致覆邱吉爾首相稱：「我對於一般的蘇聯問題，總是極可能的予以縮小，因為這些問題差不多每天都在發生，結果多數祇是自生自滅。我們的態度必須堅定，我們所採的方針，是正確的。」

從這一個文件中，我們可以明白，所謂「美蘇關係是自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後而趨惡化」的說法，並非事實。

在雅爾達會議中，羅斯福總統以最大的才智，促進三強會議的和諧。但蘇聯領袖過份估計了總統謙讓的限度，而且無視總統是根據條約而取得和諧，以致擴張的野心，日益顯露。

使美蘇關係惡化的還有兩個原因：在戰時，三強所處理的問題，多是軍事上的。到了戰爭的末期，政治上的問題，日見重要，而政治上的爭執是勝利國間的爭執。羅斯福總統已感覺到這一

點。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他就警告說：「我們消滅敵人的日期越近，勝利國之間的分歧越多」。這就是羅斯福主張在戰事還沒結束時就建立聯合國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和上面這個原因聯帶關係的。由於戰事結束，新聞檢查取消，使得大家都知道強國間意見的爭執。

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後不久，有一個短暫的時期，大家對美蘇關係又抱樂觀。那是由於哈里曼大使謁見史達林元帥時，要求蘇聯派莫洛托夫出席舊金山會議，獲得史氏的允准。

同時，國務院正在準備關於波蘭的聯合文件，答覆史達林四月七日的來函。這個文件是羅斯福總統逝世前，命國務院準備的，在四月十八日，由杜魯門總統和邱吉爾聯合具名發出。文中否認史達林所稱美英兩國大使要求無限制地邀請波蘭人士到莫斯科參加協商。他們重述羅斯福總統四月一日所發的函件，內稱：「爲遵守協議，委員會應先挑選少數足以代表波蘭人民的領袖，由他們提名，交委員會考慮」。杜魯門和邱吉爾稱：「我們之間爭執的焦點，是華沙政府到底有沒有權利否決參加協商的人選」。在雅爾達協定中，並沒有規定這一點。

當莫洛托夫到達華盛頓的時候，杜魯門總統已研究過雅爾達協定，並閱讀了很多羅斯福和史達林往來的信函，特別是那些關於羅馬尼亞，波蘭和白恩事件的信函。他深感到許多所謂協議都被破壞。因此，他召集國務卿，陸軍部部長，海軍部部長，參謀總長和李海軍大將，討論美蘇關係問題。在莫洛托夫訪問白宮時，杜魯門總統對於某一些問題，特別是波蘭的情形，非常坦白的

發表意見。結果，這次會談頗不和諧，而且草草結束。

舊金山會議，從第一天開會的主席問題開始，差不多每一個問題，都得不到協議。十六名波蘭領袖被捕的消息公佈以後，杜魯門總統覺得必須採取行動，制止美蘇關係的繼續惡化。他於是向史達林元帥建議，派霍浦金到莫斯科商談。當時，哈里曼大使正返國向杜魯門總統請示波蘭問題，於是陪同霍浦金回蘇聯，共同參加談判。

他們和史達林元帥的談話報告，是坦白交換意見，同時也充份表現出蘇聯的思想。

史達林稱，他感覺到當德國的戰敗已趨明顯，不再需要蘇聯的助力時，美國對蘇的友誼漸漸冷淡。他舉了一些例子，證明他的這種意見。

他說，美國同意阿根廷參加聯合國，違背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所發的聲明。並稱，他不得不懷疑主要強國間協議的價值，如果這種決定可以受到像洪都拉斯這類國家投票的影響。

他又說，美國支持法國參加賠償委員會是一種侮辱，並企圖輕視蘇聯，因為法國會單獨和德國簽訂和約，准許德軍開入法國。

他堅持：根據雅爾達協定，盧布林政府應該是新波蘭政府的基礎，其他辦法都不合理。並說：「雖然蘇聯人都是單純的，但人們往往誤認為蘇聯人都是傻子」。

對於歐洲戰事結束以後，停運租借物資，他尤感不快。他說，這是極大的錯誤，美國應該了解，只有在友誼的基礎上，美國才能得到蘇聯的合作。

對於德國的海軍和商船，他曾致電給杜魯門和邱吉爾，要求以三分之一分給蘇聯。他說，這一要求非僅沒有得到答覆，而且聽說這建議已被否決。

這些抱怨，是頗使美國當局驚異的。它們表現出極度的敏感，和一種幾乎是直覺的懷疑。

霍浦金對於美國的處境，加以解說。關於德國的船艦，美國認為應該由三強平均分配，所以美國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在將來的三強會議中獲得解決。至於取消租借物資是根據法律，因為租借法案僅適用於戰時。對德戰爭結束，而蘇聯又沒有參加對日作戰，當然必需停運租借物資。

史達林當即同意霍浦金的解釋。他說，如果能够先通知蘇聯，就不會有誤會了。因為蘇聯是採取計劃經濟的，事前通知非常重要。

霍浦金告訴斯達林說：最使他奇異的是，蘇聯認為美國政府把租借物資當作一種施用壓力的武器。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決不需要採用這種方法。對於這點，史達林稱他對於美國的解釋非常滿意。

哈里曼大使對於阿根廷問題，也加以解釋。他說：斯退丁紐斯國務卿，對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得到南美各國家的同意，而莫洛托夫又提議邀請現波蘭政府參加聯合國，在雅爾達協定中當然沒有規定邀請波蘭政府，莫洛托夫這種行動，使南美各國堅持准許阿根廷參加。美國不僅履行諾言，支持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參加聯合國，並拉到南美各國的支持。所以斯退丁紐斯覺得，既然南美各國幫助美國支持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美國也應該在道義上幫助他們支持

阿根廷入會。

史達林僅稱：已做過的事無法改變，這一切都屬於過去。

這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就言歸正傳——波蘭問題，這是霍浦金訪蘇的主要原因。

在全部談話中，霍浦金一再強調，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波蘭問題是美國有沒有能力和蘇聯解決共同問題的象徵；如果波蘭問題不能解決，將影響到美國和蘇聯盟國的關係。霍浦金說，美國人民深為驚奇，因為蘇聯對於應該共同處理的問題，獨行其事。他強調稱：美國在波蘭並沒有甚麼利益，僅希望能夠成立一個真正獨立的波蘭政府，保障基本自由，對蘇友善。

史達林元帥重申他在雅爾達的聲明，蘇聯政府在波蘭擁有重大的利益。他認為在二次大戰以前，歐洲各國的政策，是使波蘭敵視蘇聯，現在不能再容忍這種態度；波蘭必須對蘇友善，必須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他請霍浦金考慮，蘇軍駐在波蘭，必須能夠保護交通線，必須能夠行使權力。

在這一項討論中，史達林稱：不論美國願意與否，因為美國是一個世界強國，必須擔負全世界的責任。

關於國內外的波蘭人士，那一些應該邀請到莫斯科來參加協商的事，討論很多。並考慮建立一個能執行雅爾達諾言，實施自由選舉的臨時政府。

在歷次的會談中，史達林表示，他認為美國祕密支持敵視蘇聯的波蘭人，或與該派有關係的

人物。霍浦金堅決保證，美國並沒有這種意思，如果名單中有這兩類波蘭人，將即予剔出，不加考慮。

史達林同意邀請米柯拉葉齊克，於是，波蘭委員會的人選乃得協議。結果，組成了一個新政府，保證採取自由選舉。根據新政府的諾言，通過波蘭加入聯合國。

當哈里曼和霍浦金與史達林會談的時候，舊金山會議中，正在爭論議事秩序問題。蘇聯代表堅持：倘沒有五個永久會員國的一致投票，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議的問題，不得加以討論。這就是說，連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也受否決權的拘束。會議中大多數國家，認爲已陷僵局。

有一次，美國前駐蘇大使台維斯和我與杜魯門總統會談。台維斯報告與他赴英倫有關的一切事情。總統稱：他對舊金山會議中的僵局，頗感焦慮。我說，不妨利用霍浦金在莫斯科的便利，直接告訴史達林元帥，美國認爲否決權不應該用到議事程序上。

結果，史達林通知莫洛托夫，說這件事無關宏旨，應該接受美國的意見。

霍浦金談話所得的協議，解決了以前九天會議中的僵局。

美國所焦慮的，不僅是波蘭和羅馬尼亞問題，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四月十八日，蘇聯邀請其他盟國遣派代表到維也納。但又稱，在歐洲諮詢委員會對於維也納佔領區劃分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他們不能啓程。英國支持美國的意見，說是在各國代表沒有到達維也納之前，劃區問題無法解決。最後；在五月十九日，史達林同意美英代表可以赴維也納，觀察當地情況，不過關於劃區

問題，由歐洲諮詢委員會解決。等到我們的代表到了維也納以後，蘇方不准他們出市區一步，而且沒有多久，就下令他們在六月十日或十一日離開維也納。

我們仍擔心舊金山會議中的爭執，莫斯科賠償委員會所遭到的難題，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的意見分歧，狄托元帥在特里斯特區囂張行爲，以及伊朗、希臘、土耳其等國的緊張局勢。

舊金山會議的圓滿閉幕，是召開未來三強會議的一大樂觀因素。在霍浦金訪問莫斯科期間，蘇聯同意於七月十五日在柏林召開三強會議。

星期二（七月三日），在我終身好友惠利審判長監誓下，我就任國務卿。

三天以後，我乘總統專車往新港紐斯，奧格斯特號戰鬥艦停泊在那裏，預備載我們到歐洲，到波茨坦——走向和平大道的第一步。

第四章 波茨坦——失敗了的成功

在奧格斯特艦上，我們工作很緊張。一切會議中可能會討論到的問題，國務院已預備好一個節略。航程中，每天早上，彭柯亨，弗里門（道克）·瑪西斯，與查理（契普）·鮑倫都到我艙中，和我會同研究這些節略。對於一個新的國務卿，他們真是再好沒有的三個顧問了。

生性寧靜而靦覷的彭柯亨，在羅斯福當政的初期起，便會參與各種重要問題。當我在白宮的一段時間中，他一直與我共事。我對他除深有友誼外，還覺得他有着一個十分了不起的頭腦。道克，是國務院歐洲司司長，一位老資格外交官，不但對國際問題有廣大深切的認識，且有敏銳的政治感覺和健全的判斷。他是職業外交家中最好的榜樣之一，我很倚仗他的協助。說到契普，他也是這一種人。他在蘇聯住過幾年，為國務院中蘇聯問題的專家。他曾隨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參與歷次的三巨頭會議，担任翻譯兼顧問。

我們四個人，對國務院中所預備的節略詳盡討論研究。在許多問題上，杜魯門的參謀長李海上將也來參加。在這些會議中，我們準備好了建議，呈送給杜魯門總統。航程中，每日至少一次，總統和我共同研究這些建議，俟總統批准某一項後，我們就把它準備起來，以便提交大會。

這樣地，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們抵達安特衛普時，我們對於各種問題已經成竹在胸，各項依據的文件也都充分準備好了。

我們希望會議中能解決下列四事：一、議定機構及步驟，以便及早起草並完成和約；二、佔領德國工作中的政治及經濟原則；三、實現雅爾達宣言的計劃，以終止克里米亞會議以來蘇聯在東歐國家所實施的那種敵對政策；四、重行討論賠償問題，因為賠償委員會對此並未討論出結果。

此外，還有幾件事情。一是我們希望儘速設法讓義大利加入聯合國，因為義大利人民在對德戰爭末期中頗有貢獻，而且它會對日宣戰。還有，我們擬有計劃，開放一切歐洲國家的內陸河流，供自由航行。

我們到達柏林郊外巴貝斯堡的「小白宮」以後，知道史達林元帥將遲一天才能到。因此，我們得有時間，可以在柏林城內觀光一下。總統，李海上將，和我同車前往柏林市區。街上人來人往，摩肩接踵，大部分都是老頭子和小孩。他們個個都把行李雜物背在肩上。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要到那裏去，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離開。我們雖在美國時已聽說柏林破壞甚烈。但一見到市區殘破到如此程度，也不禁大為震驚。全面戰爭不單是使軍人死傷，而是也使後方的老頭子，老婦人和小孩子同罹浩劫。

七月十七日，史達林元帥抵達柏林，不久即來拜訪總統。（我們得記住稱他為史達林元帥

了，因爲紅軍的巨大成功，他們政府已頒給了他這個頭銜。頗爲愉快地談了一會以後，總統非正式地邀史達林，莫洛托夫和那位能幹的蘇聯翻譯員巴夫洛夫跟他同進午餐。他們接受了。席上談話皆屬普通酬應，空氣甚爲和洽。在談到我們的柏林之行時，我問史達林，他覺得希特勒是怎麼死的。他的回答使我頗吃一驚，他說，他相信希特勒並沒有死，現在可能躲在西班牙或是阿根廷。十天以後，我又問他對此事有未改變看法，他說：沒有。

午餐席上，史達林談笑風生。他在這種場合中一向都是如此的。他向總統盛讚席上的酒好。總統謝謝他的讚許時，史達林叫那個菲列賓侍者把酒瓶上的牌子讓他看看。我很高興，因爲這是加里福尼亞州造的酒。

午餐後不久，我們就駕車到三哩外的波茨坦賽西林霍夫宮開會。俄國人把會場佈置得很好。賽西林霍夫宮本是前威廉太子的別墅，地方甚寬大。這是一座棕色三層樓的石建築，矗立於格里尼茲湖畔，風光絕麗。庭院中，紅軍用葵菊植成了一個二十四呎寬的大紅星。每一國家的領袖都有一套房間備用，其代表團則另有房間，備會商之用。

會議廳本身寬敞明亮。一頭是落地長窗，光線充足，並且憑窗而望，即可見下面一片萬紫千紅的花園。

七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十分，大家在那張大橡木長桌前坐了下來，出席者，美國代表團爲杜魯門總統，我，前駐蘇大使台維斯，李海上將，鮑倫。英國代表團爲邱吉爾首相，艾登外相，艾德

禮，賈德幹爵士，及譯員一人。蘇聯代表團則爲史達林元帥，莫洛托夫外長，維辛斯基，當時的蘇駐美大使葛羅米柯，哥賽夫，和譯員巴夫洛夫。

每一代表團背後都坐有一大羣專家顧問，幸而房間甚大，可無問題。這批專家顧問，視當日所討論的議程不同而時時變換。我記得第一次會中我們後面坐着的顧問們爲：哈里曼大使，副國務卿克萊頓，賠償委員會專員鮑萊，參事柯亨，助理國務卿鄧恩，和道克，瑪西斯。

由史達林提議，杜魯門總統担任了會議主席。他立刻提出了幾件我們在奧格斯特艦上所準備好了的提案。

第一件是建議設立外長會議。在雅爾達會議中，原已商定各國外長應規定時間集會，以討論戰後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我們當時並沒有準備把和約也放到外長會議中去討論。在雅爾達時，和平似乎還很遙遠，據我所知，這些問題是並未會討論過的。所以，設立締造和平的機構這一問題，乃是波茨坦會議中首要的問題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我爲國會議員，曾參與和約進行諸事。這次，我覺得我們必須另換一種方式進行。如果我們等到和約結束，再合併起來開一個和平會議，所有參戰的國家全來參加，而並無一個草案可爲和約討論的依據，則結果一定弄得七嘴八舌，一無結果。有的在吹捧，有的你攻我訐，加以各國利害不相同，鉤心鬥角，我相信一定會開了一年也還是毫無結果可言。即使凡爾賽會議時，最後也只好指定了幾個大國負責起草和約。不參與起草的那些小國，對

於和約內容，幾乎莫明其妙，結果，大國互相同意了以後，小國就和戰敗的德國一樣，毫無機會可以提議修改了。

我們現在希望能想一種方法，可使各主要國家於各問題上取得協議，而同時，各小國亦可有充分機會參加意見。

很幸運的，赫爾國務卿所計劃，斯退丁紐斯國務卿所實現的聯合國組織，其中的議事步驟規程，可作和會範本。而敦巴頓橡樹會議及雅爾達會議決議案之提付舊金山會議討論，亦可作為大國協商後提付全體討論之前例。

彭柯亨與我準備好了設立外長會議的計劃。但不出我等所料，蘇聯對於德國和約，不欲立時進行。但我們覺得此時應先行開始商討。而將來我們於對義和約及對巴爾幹國家和約進程中的經驗，當可有助於對德問題的取得協議。

我向杜魯門總統敘述的外長會議的工作大要是如此的：外長會議先討論對義大利和對巴爾幹國家的和約，因為這些和約中爭執點最少。各國外長先商定若干原則，再交外次根據各原則起草和約。然後，各外長再商討德國問題，就各重要問題如疆界，地方政府等獲得協議，再交外次起草對德和約。這些和約，最後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並修改正，如敦巴頓橡樹會議決議案之提交舊金山會議一樣的。對日和約的進行，步驟也是如此。

總統考慮了一下以後，接受了這個計劃。這是在我接任國務卿不久前的事。總統把這個計劃

提交國務院研究。國務院也同意了。

在這理論上當然是很好的。但在有一個假設上我們想錯了。我們原先以爲，戰事終了以後，參戰的國家一定都渴望和平，所以各國間意見的不同當可設法解決，並無多大困難的。

但是不然。的確的，雅爾達會議以後，我們頗有點失望。蘇聯的違反對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協定，給了我們一個警告：在將來我們還有困難重重，而且將碰到根深蒂固的猜忌之心。不過我們總還記得羅斯福總統最後跟邱吉爾首相說過的話，他說，憑他和俄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一切困難到最後自會解決的。

現在，大家來批評羅斯福總統的話和我們的假設認爲太無先見之明，當然是很容易的。俗語說得好：「向後看易，向前看難」。但是，假使大家想一想在德國投降以後美國人民對蘇聯的態度是如何的好，同時，由於大家都是並肩作戰，同甘共苦過來的，蘇聯在美國一般人民心中，留存着一種極大的好感。但不料，蘇聯在最後的兩年半中，却如此的負義蠻幹，把美國人民心中的一點好感全都抽回去了。

設立外長會議的計劃，在會議桌上很快地通過了，使我們對前途頗爲樂觀。邱吉爾和史達林都對我們的把中國包括在外長會議內一點，表示疑問。蘇聯代表一直反對把法國列爲強國。當邱吉爾建議考慮外長會議應包括四國還是五國時，史達林立刻接上去說「還是三國」。

三國外長第二天會晤時，決定了，中國應只參與與遠東或與整個世界有關的各問題。莫洛托

夫主張法國應只限於對義及對德和約之起草。最後我們大家同意了：每一和約應由於敵國降書上簽字的國家共同起草，以義大利的情形而論，法國應屬於義大利降書簽字國之一。

那天下午，我們把這個議案送達三國領袖。立刻，他們通過了這個議案，設置外長會議，負責準備和約。這是波茨坦會議中第一個通過的案子。

七月二十四日午餐席上，我和莫洛托夫作了一次談話，使我對會議成功的希望大為加增。我們討論到將於九月間在倫敦召開的第一次外長會議的計劃。我說，我們應該組織起這個機構，並決定幾點大原則，並令我們的外次及助理人員們據此準備和約草案。我並說，外長們應於十天內完成此一工作。莫洛托夫似乎很贊同這個意見。我們也討論到如何選擇起草人員，討論到外長會議與聯合國的關係，以及我們回國以後的即應準備對義和約。在這種種問題上，莫洛托夫意見似乎和我十分一致。

我們再去參加三國領袖的會議。會議席上的激辯也許會削減了我的希望，但是我並不會。這回討論的是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另一個提案，——如何實現雅爾達會議宣言中對歐洲被解放國家處置的條款。

我們的提案中坦白述說，雅爾達宣言中的責任迄今並未履行。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將使世人認為我們強國無合作一致之誠意，而大大削弱對我們所揭櫫的目標的信心。我們提議，由三國共同一致，改組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政府，使一切民主份子皆得參加在內。同時，我們也建

議，由三國政府協助目前的過渡政府辦理「自由而不受束縛的大選」。

這個提案引起會議席上的冗長激辯，值得一記。

史達林對這議案的第一個答覆就是：蘇聯對此問題已另有提案。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果然在外長會議席上提出來了。其中主要的是對希臘大肆攻擊。艾登憤然發言，說這個提案簡直是「有意開玩笑」。他說，希臘大選時，外國觀察家，包括蘇聯的在內，都會被邀前往參加。很不幸，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却就辦不到。他最後說，對於蘇聯提案中的攻擊，英國認爲自己「最屬例外」，此事只能報告首相。

莫洛托夫回答說，他們攻擊的只是希臘政府，不涉他人。他舉出事實，說英國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代表們，比蘇聯的還要多，同時並引英美報紙的記載以爲例證，說，希臘情形比羅馬尼亞更糟。

對於這場辯論，我所說的就是我常常說過的一段話。對於這段話，我恐怕莫洛托夫是從來沒有了解或相信過的。我對他說：「美國政府真誠樂見蘇聯具有對它友善的鄰邦，不過，我們覺得，他們應獲取全體人民的友誼，而勿僅獲取一個政府的友誼。所以，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政府能真正代表人民。假如這種大選舉行之時，非但報紙和無線電受統制束縛，甚至我們政府派去的代表亦受束縛，那末，這樣的大選所產生的政府，我們美國人民是決不能信任的。我們並不欲干涉任何國家的選舉，但，鑒於戰後世界的情勢，我們願意和其他國家共同，觀察義大利，希臘，

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大選。」

這個討論中的辯難之點，在以後的好幾個月中都時時聽到。俄國人只要一聽到一個使自己不快的議案，或是自己居於劣勢的議案，他們就總是老法子，提出一大堆英美報紙上所載的希臘通訊，作爲反攻的依據。莫洛托夫似乎隨時都在利用我們的新聞報導自由，而獲得便宜。

幾天以後，我們的提案又提出討論。結果，蘇聯表現了一次很有趣的討價還價手段。

莫洛托夫發言道：「蘇聯不能同意監督選舉一事。但我可以瞭解，其他盟國希望他們的代表們在這些國家中能有更多的便利。現在戰爭業已終了，我們本已有理由，可以給代表和記者們以更多的自由。所以關於選舉各事，當可隨時儘量告訴他們。」

提出了他的反對和諾言以後，繼之就抱怨說，蘇聯代表在義大利的盟國管制委員會中未受適當注意。他攻擊和威嚇了一陣子，然後再提出條件，說，如果我們承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政府，蘇蘇能願意考慮我們關於兩國大選的提案。

艾登說，照英國憲法，和約訂定前，正式承認是辦不到的。我對莫洛托夫說：我們承認一個政府，當根據我們自己對它的估價與判斷，而不能作爲一種討價還價的工具。不過莫洛托夫是個很難說服的人，這件討價還價的「生意」，他一直在提出着。

蘇聯的討價還價，大部分是集中在義大利問題上。我們曾提出修改義大利的停戰協定條款，以酬答其協助對德作戰及對日宣戰之功。我們也建議，對義和約之草擬應列爲外長會議的第一重

任務。

但史達和莫洛托夫都堅持：匈、羅、保三國所未得的恩惠，義大利也皆不應有。但我們指出了一相根本的不同：一切外國代表在義大利皆可自由行動，自由報導所見。在辯論中，邱吉爾說，英國在羅馬尼亞的代表團「遭受束縛，幾同監禁」。史達林立刻反問說，他有什麼證據？

邱吉爾臉微微紅了一下；他說，史達林元帥如果聽見了英國代表團在那邊所遭逢的種種困難，亦定必將大為震驚。「他們四周已有鐵幕圍着了」。

「全是胡說，」史達林喊說。他接下去說，在羅馬尼亞的英國代表們所受到的待遇，可和蘇聯代表們在義大利所受到的完全一樣。

一直到波茨坦會議將告結束，我們把這問題與賠償問題合併討論後，才獲得了蘇聯的協議，而成爲宣言中的第十節。該節聲明：第一，訂定和約並與此五國恢復正常關係之需要。第二，三強將對義和約之準備列爲新成立之外長會議的首要工作。第三，至於其他四國的和約，如果方便，將同時進行準備。至於承認的問題，則聲明「三國一致同意在最近將來根據當時之環境，在可能限度以內，可以分別考慮與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等國建立外交關係。」

關於新聞報導問題，宣言中有這樣一段：「三國政府由於歐戰結束後環境已有改變，無疑認爲盟國之新聞記者，可以享受充分之自由，向世界報導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等國事實之發展。」

對此事我們的確仍頗懷疑，不過這是他們討論數小時後，所可能使他們同意的最大的限度了。

同時，蘇聯曾提出許多攻擊希臘的議案，其意思顯然是報復英國對南斯拉夫的攻擊的。宣言中上面這一節商定以後，貝文指出：議程中攻擊希臘者二件，攻擊南斯拉夫者一件。他提議把這三件全部取消不議。史達林立刻回答說：「好，歡迎。」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們所提出的攻擊其嚴重性不過是如此的。

會議中還有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就是英美在羅馬尼亞的工業設備，現在已被蘇聯攫佔的。蘇聯把這些都認爲是自己的應得之物，這，使我們感覺，將來討論到賠償問題時，一定將大有麻煩。在戰前，英美的公司在羅馬尼亞的石油工業中頗占相當財產，其中包括非常值錢的機器設備。德國人一佔羅馬尼亞，當然就把這些財產凍結了。我們都以爲，羅馬尼亞既經解放，這些財產當然都必物歸舊主。但不料，紅軍都已把其中許多機器搬走，作爲戰利品，並把留着的一些也認爲大部分他們應有權處置。我們不能承認蘇聯可以把盟國人民的財產視作戰利品。史達林，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都堅決認爲這些不是英美人的財產，而是德國的財產，所以他們有權搬走。這些機器，其中有一部分是英美人的公司在戰前向德國廠家訂製的。於是蘇聯堅持說，這些機器從前既是德國做的，那就不是我們的。

維辛斯基說了一大篇理由。他是個能幹而強橫的律師。當他坐在桌子對面，用他那變冷灰深

銳的眼睛定着你，以強力的精密滔滔辯難時，你就可以了解，爲什麼上次蘇聯大清洗審問時，是由他來担任首席檢察官的了。

機器設備所有權問題的研究，有許多是純屬技術方面的。經過了長長時的反覆辯論之後，才算決定指定專家組織一個美蘇小組委員會和英蘇小組委員會來研究各項設備的所有權問題。

在會議開始之日，史達林曾提出希望討論託治問題，說：「蘇聯希望自戰敗國獲得若干土地。」後來蘇聯代表團就送進提案，主張義國殖民地之一交由蘇聯託治。大西洋憲章全部被拋在腦後了。他現在要求領土了——這就是他所謂的託治。

提案列入議程時，邱吉爾表示不願討論。杜魯門總統立即聲明：這是應屬於和會或聯合國大會中解決的問題，但此時交換意見，並無不可。至此，邱吉爾發表了一篇很動人的聲明。

「我們英國，」他說，「並不希望從戰爭中獲得任何好處。我們所受的損失，慘重之至。在人的傷亡上，我們固然不如英勇的蘇聯盟邦所喪失的那樣多，但戰爭結果，我們負債最巨。我們現在和美國保持海軍均勢，已絕無可能。我們在戰時只造了一艘主力艦，但損失的有十一二艘。雖然損失如此慘重，但我們毫無領土野心，——不要柯尼斯堡，不要巴爾幹，什麼都不要。所以對於殖民地問題，我們態度可以完全正直無私。」

「當然，」他接下去說，「英國與地中海利害相關，任何現狀的改變必須經過長期審慎之考慮。」至此，他問史達林元帥，蘇聯所要的究竟是那一塊地方。

「我們先要知道本會議是否預備考慮義大利應否放棄其殖民地，」史達林回答說。「如果是的，我們才能決定何者應交付託洽。」

「我沒有考慮到蘇聯對非洲海岸的要求，」邱吉爾聲明說。「假如蘇聯有些要求，應與其他問題一併討論。」他解釋說，這問題應屬於和會的範圍，殖民地行政問題的最後決定應屬諸聯合國大會。

杜魯門總統乃發表意見，建議把本問題交付外長們繼續討論。這個建議被接受以後，席上的緊張空氣就立刻鬆弛了不少。

外長們集會討論此事時，莫洛托夫立刻提出：此時應明白決定這些殖民地將來的處置辦法。我提醒他杜魯門總統在會議席上的聲明，這個問題只能在和約中解決。當我指出和約的準備在一個月內就要開始時，他才答允等待。

蘇聯的圖謀染指地中海，在討論到韃尼爾海峽的控制問題時，亦顯露了出來，不過態度較為平和些罷了。這問題是邱吉爾首先提出的。他已和史達林討論過此事，現在，他再表示願意共同商討修改協定，使蘇聯商用或軍用船艦於平時及戰時能自由通航穿過海峽。但他認為此事必須預先通知土耳其。同時他聲稱，對蘇聯的要求卡斯省及亞達罕省，與要求在海峽還取得基地兩事表示關心。

他說：「此事將使土耳其恐懼國家主權受損，且將無法防衛君士坦丁堡。」

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解釋說：割省的要求，是由土耳其提出與蘇聯訂結同盟一事而來的。他們說，這兩省在沙皇時代本屬俄國領土，而且，如果同盟訂立，則爲防衛這些土地起見，邊境自當確定。史達林認爲，蒙德婁公約對蘇聯「極不友善」，因爲它給予俄國的權利，是和給日本的一樣的。他認爲，土耳其國力太弱，不足確保海峽的自由航行，所以，自然應由蘇聯來保衛海峽。

杜魯門總統回答說：「美國政府不同意修改蒙德婁公約。但我們認爲，韃靼尼爾海峽應供全世界各國自由航行，並由我們全體來共同防衛。」

事情就是如此。蘇聯要求自由航行，但由蘇聯防衛，或蘇土共同防衛。這意思就是說，他們的武裝軍隊可以駐紮在土耳其的領土上。我們則要求由聯合國來確保自由航行。

蘇聯領袖們對於韃靼尼爾的想法，實在是很不實際的。百餘年來，俄國都曾指望着他們隣國的這塊土地。在一百年前，他們所要的那些要塞堡壘或者還大有軍事價值。但是今日，如果沒有完全的制空權，則他們在海峽的這些堡壘其實是並沒有多大用處的。

對於這問題，杜魯門總統聲明，他相信如果對物資及船舶自由航行的壁壘能够去除，則對於歐洲將來戰爭的避免，將大有用處。所以他提出了我們預先準備好了的提案，主張一切內陸河流皆得自由航行。

史達林說，對於這個提案他不預備討論，因爲這是議程表上所未列入的。總統和我雖費盡唇

舌，最後也不過使他同意，把此問題交由外長們繼續商討。後來，當我們起草會議的公報時，史達林堅持此事不應提及，並無其他理由，只說：這並不需要，而且公報已經長太了。

七月廿五日，會議暫時休會，因為數星期前英國所舉行的大選投票次日就要揭曉。邱吉爾是同了反對黨（工黨）領袖艾德禮同來參加會議的，所以不論大選結果如何，對於會議的進行，都並無影響。

他們兩人啓程返國聽取大選結果的前一天，我問邱吉爾，他自己覺得繼續在位的可能性如何？他說他不知道，不過許多明瞭大選情形的人們都賭東道說保守黨必可於下院獲得大部席次。他相信保守黨必可勝利。而艾德禮，我問到他時，覺得他是認爲工黨可能有相當好的表現，但失敗還是失敗的。

這是很有趣味的，當我們在會議中討論着被解放國家的大選當如何進行時，英國的這兩位領袖，却一點也不知道在自己國內，情勢已把工黨擁上了台，這結果，使我們都大吃一驚。

新首相艾德禮回到波茨坦時，他帶了貝文來，代替艾登。就人物而論，艾德禮與貝文和邱吉爾與艾登真是天南地北，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在外表和舉止上，艾德禮給人的印象極似乎一個大學教授。說話時，他毫不外交辭令，而只是把自己的意思清楚而審慎地說出。他非常謙和，絕不做作。這樣一位熱切而嚴肅的人物，如何能對廣大羣衆有如此吸引力，真是使人難於想像的。

他們到後不久，艾德禮和貝文聯袂來訪杜魯門總統，我們四個人就討論起會議的進程來。總

統舉起，蘇聯要求割讓東普魯士，並在地圖上指出了德國和波蘭邊境線上因此將發生的變動。貝文立刻強力地聲明反對。他的態度極爲強韌，使總統和我都暗忖跟這位新外相將來如何弄法。後來，我會告訴貝文他在首次會面中所給我的印象，並說，不久我們即欽佩了他的爽快和直截。他似乎很得意。真的，我不久即十分景仰他那細密的頭腦，他的爽快，他的坦白，和他的守信。我不單欽佩他的才能，而且極喜愛他的爲人。

艾德禮代替了邱吉爾，貝文代替了艾登以後，英國在會議席上的立場，可謂毫無改變。英國這種外交的一貫性使我很發生印象。

他們兩個到了以後，會議又恢復了，我們開始來商討最棘手的一個問題：——德國。

就德波邊境而論，我們到波茨坦來所碰到的是個事實的問題。雅爾達會議時，三強會同意把德國分成四個佔領區，並在雅爾達宣言第六節中明白聲明，波蘭西陲的疆界應俟和會中作最後確定。雖然宣言中是說得明明白白，似乎毫無誤會之可能，但我們從美國出發來德國之前，已知道了蘇聯未和英美兩國商議，即已把納賽河以東的土地劃給波蘭管轄了。

那時杜魯門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曾立刻要求蘇聯解釋，這種不合法的另立一區的行動，其理由何在。總統說，此事不但違反協定，而且將使甚多重要事項如賠償問題之類無法解決。

蘇聯方面提出的理由是說：蘇軍開入該區時，德國人已經逃走了，因爲那裏總得有相當政府維持秩序，所以他們允許波蘭來管轄了。史達林承認無一國家可以有權力從德國領土中新劃出一

區來，但說，蘇聯政府當然應採取措施，使紅軍後方得能確保安全。他也承認，波蘭已自該區移走大量的煤。這，我們認為當然是應屬於賠償的一部分的。

總統問他，如果賠償問題尚未協議，而德國的領土已有一部分去掉，則此事如何還能談下去。

史達林回答說，總統所說都是和此問題並不相關的，因為「克里米亞會議中未有任何領土讓與的討論，但會協定，波蘭可以得到領土。」

「所以，此事蘇聯不能負責，」史達林說。

總統追問一句：「不能負責？」

「不能，」史達林回答說。

我們也很關心由於該區的被併入波蘭而將引起的人口的遷移問題。雖然史達林說，「劃歸波蘭的該區內已無一德人留着」，但該區戰前有近九百萬德國人，我們的情報是，現在還至少有一百萬德人留在那裏。後來，波蘭政府的代表也承認說，大約還有一百五十萬人留着，但說，如果該區劃歸波蘭，其中大部德國人都可自動離去。

波蘭的俾魯脫總統，列席七月廿四日的外長會議，為波蘭對德國東部的領土要求作辯護，說：即使這一區劃歸了波蘭，波蘭的領土也還是比戰前要小，因為依照克里米亞會議中的決定，他們東部十八萬平方哩的地要劃歸蘇聯。但他說，如果德國東部地區劃給他們，則波蘭經濟上較

可好轉，人種亦較齊一。

邱吉爾當時曾指出：這個蘇聯支持的計劃，將使德國四分之一的可耕地皆告喪失。如此，非但德國的糧食生產要被割斷，而且，百萬以上的德國人將被迫逃往西區，「帶了他們吃飯的嘴巴來。」

對於波蘭的要求及承認該區波蘭行政權的問題討論又討論。總統屢次聲明：關於領土的改變問題，只能付諸和會討論。而且：我們也小心絕不預諾他們在對德和會中支持他們任何關於波蘭西方邊境的建議。所以，宣言中曾有一節說：「三國領袖重新聲明，波蘭西部邊境線之解決，應俟和會中決定。」

雖然如此，就實情說，我們必須接受蘇聯佔領區內的這個波蘭行政組織。因為這是一個既成的事實，我們無法能強迫俄國人重行負擔起那他們已自動放棄了的責任。但在賠償問題提出之前，我們對這個暫時的行政組織未作任何協議。

自雅爾達會議以來，在賠償問題上，蘇聯和我們的意見都是大相逕庭。我們會同意賠償應用「物資」，不應用「通貨」。但自雅爾達會議以後直至波茨坦會議間，賠償委員會的歷次商討，都絲毫未有什麼結果。

第一，就是所謂賠款二百億，半數歸蘇聯的問題。邁斯基曾於雅爾達會議中提出這個數字，羅斯福總統曾接受以此作為賠償委員會中「討論的基礎」。當後來賠償委員會在莫斯科開會時，

我們的代表鮑萊屢次要求邁斯基提出關於這個數目的根據材料，但邁斯基始終提不出。在波茨坦會議席上，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逼着我們要決定一個確實數目。最後，我們才使他們接受了，不再規定錢或物資噸位的確實數目。

莫斯科賠償委員會中的主要爭執點是：我們堅持德國不能以現行的生產品作賠償，除非到它已有足夠的出口物資能換取重要進口原料的時候。這也是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來的經驗，那時我們美國借錢給德國購買原料，而原料製成的物資，却被別國拿了去做賠償。這次，我們決心不再來代替德國還債了。

我們要把賠償問題作為整個經濟計劃的一環，是有實際理由的。我們希望，除戰利品外，任何德國的財產，佔領軍均不得隨便移走，除非先嚴密計算好其數量價值，以便將來賠償總數分配停當後，可將此數扣除。但在會議以前，我們早接到報告，說蘇聯把許多絕不能算是戰利品的物資亦皆自動搬走。其中有許多報告，其情形簡直使我們不敢置信。但我們到達柏林後，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因為我們不但接到目擊者的報告，而且自己也親身碰到了。

總統和美國代表團所住的房子，從前是個德國電影製片廠的老闆住的，這個人據說已被帶往蘇聯，他的太太則留在這屋子裏為代表團做幫傭。這個「小白宮」已空餘四壁，陳設全無，我們來住時，傢具都是從別的房子裏去搬來的。

副國務卿克萊頓和鮑萊曾到美蘇佔領區邊境去看過一個地方，那裏，在界線未劃定前，蘇聯

就把美方佔領區內工廠的機器都搬走了。柏林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機器全部被搬走，幾成空屋。其他製冰廠、眼鏡廠等情形也都是如此。

鮑萊會和邁斯基討論此事。邁斯基也承認，除戰利品外，佔領軍不應把其他的物資搬走。但他却下了一個「戰利品」的定義，竟至可把傢俱，浴盆，銀器，煤等等也皆可列為戰利品。鮑萊覺得這就簡直無話可說了。

後來，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外長會議席上，我問莫洛托夫，蘇聯當局是否已把大量機器及物資搬走，甚至傢俱用品等也在內。

「是的，是有這事。」莫洛托夫回答說。他然後說，如果我們計較及此，則他可以同意把他們所要求的賠償數字中減去三億，以作補償。當我反對時，他就連忙說，那末他們可以把賠償要求從二百億減為一百億或九十億，如此，他說，「我們就算這問題解決了。」

但一九四七年春天，在巴黎，在紐約，在莫斯科討論時，莫洛托夫又再要求一百億了。

這個問題討論了很久，不得要領。我們知道，如果賠償問題要以德國為整體來作全盤解決，那我們就必須要蘇聯提出一張所搬走的物資的清單來。但這個一定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知道，他們連自己也估計不出究竟已搬走了多少東西。如果我們一定要他他們估計出數量來，則結果不過是無窮盡的磨擦攻訐而已。

克萊頓、鮑萊和我三人商量過後，覺得惟一的解決辦法是各國從各自的佔領區中去取得賠

償。我們把這個意思報告給總統，總統核准了。七月二十三日，我和莫洛托夫單獨會面，討論此事。

我說，美國對於賠償問題十分「關心」。我們一直會希望三強能採取一種政策，把德國視作一個整體來作為賠償問題的對象。但鑒於目前蘇聯對戰利品定義的如此與整體賠償計劃不能相符，所以，如果勉強要如此做，必將弄成無窮盡的爭執與磨擦。因此，在這種情勢下，我們相信不如考慮各國從各自的佔領區中去取得賠償。

德國「平時經濟中不需要」的工業設備中，約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在蘇區。我們建議，西部區域中的這種工業設備，再給百分之十給蘇聯。假如蘇聯還要從英美區中獲取機器，那末，我們可以以西部德國人民所急需的糧食和煤來作為交換。

莫洛托夫答允把此事轉呈史達林元帥考慮。

艾德禮和貝文到達的前一日，莫洛托夫來說了，他責備我們不應違反雅爾達的決議，不接受二百億賠款這個數目字。我用各種方法試着使他了解，羅斯福總統所謂的「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不就是說敲定了。

我對他說：「如果你要向我借一百萬塊錢，我說我來考慮一下，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就要開支票了。」我然後說，我們不但是答允了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而且鮑萊在莫斯科就和你們討論了三十五天，你們到柏林後，我們又討論下去，但鑒於上述的種種理由，我們決定，這個數字是不

合實際的。

艾德禮和貝文回來以後，我去看他們，商談數小時後，他們在原則上也同意了這個辦法。第二天，總統和我約史達林及莫洛托夫會晤。但史達林身體有點不舒服，莫洛托夫一個人來了。

我們先說出：我們已同意他們的要求，把德國的艦隊和商船由三強平均分配，這點是會議開始以來，他們所催逼得很緊的。然後，我們促他接受我們的賠償計劃。他說，在「原則上」蘇聯準備接受，不過尚有若干「細節」希望解決。主要的「細節」就是將由魯爾區移往蘇聯機器價值的數目問題，而他主張，應定為二十億元！

我們解釋說，用錢來作為機器設備的估計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同意以機器設備總數的百分之幾來作為賠償。但莫洛托夫在這點上十分堅持，定要定出一個錢的數目來，因為否則，他說，「這個百分比數是沒有意義的。」

七月三十一日，我對莫洛托夫說，現在有三件事情須待解決：一、賠償問題；二、蘇佔領區的波蘭行政機構問題；三、我們所提出的關於義大利及巴爾幹諸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我給他一個文件，叙明我們在此三問題上所可能作的最大限度的讓步，請莫洛托夫把這個轉呈史達林元帥，以便於下午的會議中討論。我並聲明：我們需要三個全同意，否則就全不同意。並告訴他，總統和我準標於次日即離德返國。

下午開會時，總統立刻建議討論這三個問題，並叫我提出來。我提了出來，並強調說，這是

一個總提案。

史達林表示，他反對「貝爾納斯先生這種詭計」，逼他們一定要三個問題同時考慮。我解釋說，我們一併考慮此數問題已達三星期之久；現在，我們特一併讓步，意思就是希望會議能順利結束。所以，我們堅持必須三事共同考慮。史達林繼續抗議，然後就開始討價還價了。首先，他提出把賠償數目大大增加。這個不成，他就提出，西部區域運往蘇區交換糧食、煤、木料等的機器數量，自百分之十二增至百分之十五。我說，如果他肯放棄別的要求，並同意其餘的兩個問題，則我們可以同意百分之十五。他答允了，於是會議就順利結束。

莫洛托夫暫時地放棄了共管魯爾區的要求，這是蘇聯對西部區域的主要目標之一。別的事務，如佔領德國的經濟原則，修正盟國管制委員會對羅、保、匈等問題的處置方案等等，也都很快地獲得了通過。這都是我們以前所提出的。

因為史達林於會議中討論賠償問題時曾表示，他「反對貝爾納斯先生這種詭計」，我想他對我一定很不高興。但在波茨坦會議即將結束宣告散會前，使我很出意外的，史達林却請總統讓他說幾句話，關於「貝爾納斯先生，他比我們中任何一個皆更努力。」

他並說：「他使我們於許多事情上獲得了協議。」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俄國人是欽佩態度強硬的對方的。

總統表示，希望下次的三巨頭會議能在華盛頓舉行。

「讓上帝安排，」史達林回答說。

會議在愉快情緒中閉幕。但美國代表團却並未過分樂觀，因為事實表現，會議中同意了的事實，實行起來還有着困難重重。但我們感覺，我們已建立了一個基礎，來維持戰時所結成的聯合一致。我們於東歐問題的努力上沒有理想的那麼成功。我們未能使義大利豁免賠償。但在奧地利問題上，我們覺得頗為成功。在對德問題的協議上，情形也頗有進步，但是我們深知，要蘇聯開始實行協定，這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當然，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到，最初的幾個和約竟要連續商討了六個月之久才能訂立。我們認為這個會議是成功的。我們堅決相信，會議中所得的協議，將為歐洲的早日恢復安定立下一個基礎。

協議是使會議成功的。但這些協議的被破壞，却使成功變成了失敗。

第五章 在倫敦遭遇的挫折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我出席參院外交委員會，參與對義，對保，對羅和對匈和約的討論，當時該委會正遭遇着相當大的壓力，因為有一部份人，主要的是義大利系美國人的團體，主張暫緩批准。這種主張的真正目的，乃欲推翻這些和約。我在說明美國在過去十六個月的困難談判中，一直掌握着主動權之後，力促該委會考慮遲不批准和約的後果。令人感到歡喜的是：該委會終於一致批准了上述諸和約，而參院則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以七十九票對十票的多數核准了對義和約，並以口頭表決批准了其他的幾種。

良好的政治是在尋求最大限度的相互同意，在地方的法院中是如此，在國際間的會議中亦然。這裏，我要把草擬歐洲四國和約的經過，加以敘述，因為此事不僅本身具有極大的興趣和重要性，並且可以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一種借鑑。

當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乘坐「伊麗沙白皇后」號前往倫敦參加第一屆外長會議時，適在我受任國務卿後兩個月。我們在船上開始專心研究國務院各專家所擬就的各種建議及其變通辦法。共和黨方面重要外交發言人杜勒斯也被邀參加代表團。我們每天和國務院的顧問人員會晤兩

次，計劃美國在會議中對各項問題應該採取的立場。

當時談話中，引起我們特殊關切的各點之一，就是蘇聯擴張的企圖已有非常肯定的證據。在白宮地圖室中，我獲悉雅爾達協定中有關千島列島，庫頁島，大連和旅順各款。在波茨坦，我們遭遇了蘇聯的種種要求：她要求以德國東部的大塊土地給予波蘭，藉以補償寇松線以東被蘇聯取去的波蘭土地；她要求柯尼斯堡，參與管理魯爾區以及控制韃靼尼爾海峽。她企圖控制巴爾幹的決心已經成爲很明顯，而在波茨坦她還提出了控制義屬北非殖民地之一的要求——最好的黎波里泰尼亞。最後一樁要求特別令人感覺不安，因爲種種事實已經使我們相信蘇聯對這塊土地的興趣，主要是屬於軍事方面的。

我們最後決定我們的政策應該是促進這些殖民地的獨立。但爲準備獨立起見，應該在聯合國憲章範圍之內成立託管制度，先行加以管理。問題乃是那一國應該負責託管的工作？由於種種困難，我就叫我的助手之一草擬一個在聯合國之下實行集體託管的建議。

我們到倫敦來起草和平條約，此點使我感到欣慰。會議於九月十一日召開，但是對於會議的組織和程序，我們立刻遭遇了嚴重的異見。使我感到驚奇的，就是莫洛托夫甚至提出過討論管制日本的要求。直到兩天之後，我們才能開始討論對義條約。

當時各國同意用英國的草案作爲我們討論的基礎。以後時常碰到的許多難題，如義南疆界，多得喀尼斯羣島和義大利殖民地的處置問題，立即隨之出現。莫洛托夫不願討論疆界問題，除非

南斯拉夫參與其事；他不願討論多得喀尼斯問題，除非我們把義國殖民地問題談妥。所以我就提議邀請南斯拉夫和義大利出席陳述意見，並將我們處置義國殖民地的建議提出。

我們的建議主張由聯合國安理會任命一個行政長官（蘇聯爲安理會永久會員國之一）。這個行政長官是一個國際公務人員，由任何會員國中的一國人士担任。他應該有一個顧問委員會，由英、法、蘇、美以及義大利各派代表一名和當地人民代表一名組織之。假如行政長官執行職務時，委員會中各國有一國表示不能滿意，那麼任何一國可以向託管理事會提出，促請注意。我們的計劃並主張在十年之後結束託管。

皮杜爾主張由義大利担任託管，其主要原因乃是爲了託管理事會尙未成立，而集體託管也恐難行得通。王世杰立即表示中國代表團完全支持我們的建議。貝文說這是一種新的建議，他必須加以研究。他希望知道其他建議能否考慮，因爲他要讓各自治領有表示意見的機會。至此，就輪到莫洛托夫說話了。

他說蘇聯代表團所建議託管原則，應適用於若干義國殖民地，由個別國家担任每一個殖民地的託管。他對於共同選出一個行政長官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他還說他並不隱瞞蘇聯希望獲得個別託管一個殖民地的願望，提出這種要求的根據就是義大利黑衫軍十師三旅侵略蘇聯時所造成的損害。他還指出蘇聯政府和各種不同的民族「建立友好關係」具有「廣泛的經驗」，並建議把這種經驗應用到的黎波里泰尼亞方面去，此外還保證十年的時間足夠替這塊土地作獨立的準備了。

在一次私人談話中，莫洛托夫向我建議一點，就是美國，聯合王國和蘇聯三國應該大家管理一個殖民地。我告訴他我們不能同意這個辦法。

我告訴他我們的代表團認為指定個別政府管理遠較指定一個行政長官爲難，因爲行政長官是不能利用殖民地來爭取商業上和軍事上的便宜的。這些地方必須當做一種委託的東西，一定不能當做戰利品或者戰時損失的賠償看待。把這三個殖民地分給三國，而在軍事開發上不加限制，結果對和平不能有所助益，反將播下糾紛的種子。

那天下午，貝文陳述英國的立場。他直截爽快地說英國不能同意蘇聯對的黎波里泰尼亞個別託管的要求。由於蘇聯的要求是以義國軍隊所造成的損害做根據的，他於是被迫指出英國及其自治領和義國作戰，遠在義蘇開戰之前。他繼續說英國承認蘇聯在東歐的利益，所以曾經支持蘇聯的要求，他奇怪蘇聯爲什麼不承認英國在地中海區類似的利益。貝文繼即聲明支持我們的建議，但附有若干修正。

皮杜爾的意見依然保留。他說在詳細辦法更形確定之前，「就是在原則上」也不能接受我們的建議。他指出里比亞和法國聯邦的一部份接壤，顯然他在恐懼對的黎波里泰尼亞獨立的諾言，將對這塊法國領土發生影響。

莫洛托夫極肯定，他要求討論的黎波里泰尼亞問題。他說蘇聯在北方有一個海口，鑒於她領土之廣大，在南方也應該有一個，「尤其爲了我們在遠東方面已經有權使用大連和旅順的原故」。

他說「蘇聯應該得到她應得的地位，所以在地中海方面應該有商船隊的根據地。我們並不主張把蘇維埃制度介紹到那裏去，除了當地人民所需要的民主秩序」。

以上是辯論開頭。在以後十六個月中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一再提及，直到認明這個問題目前無法解決為止。

我們對於多得喀尼斯羣島也不能獲致任何建議。外長會中四個會員國相信它們應該歸併給希臘，但是莫洛托夫堅持這些島嶼究應屬誰的問題必須和義國殖民地的處置問題，連帶決定。

至於義南疆界問題，參加外長會議各國在初步聲明中大致同意特里斯特應該成爲一個自由港。主要的難題是莫洛托夫單獨堅持該城應該置於南斯拉夫主權範圍之內，雖然當地地的民衆以義大利人居絕大多數。九月十八日，南斯拉夫，義大利，南非，澳洲和紐西蘭各國代表陳述意見，但是外長會議各會員國的立場並未因此而顯著的變更。在聽取各該國的意見之後，我當即提出建議，主張選派專家前往實地調查，以便以人種問題爲主要根據，決定一界線，而對經濟諸因素亦予以考慮。莫洛托夫接受此項建議，其後復表示反悔，因爲他手下的專家所建議的界線，並不和指令相符合。

莫洛托夫遭遇其他四國一致反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賠償問題。蘇聯建議義國應該付出賠償共達六億美元，其中一億美元應歸蘇聯。其他幾國則認爲義國在償付預支的救濟費用之後，付出賠償的能力已極有限了。

雖然在我來出席會議的時候認為各國外長可能就一般原則獲致協議，以便各國外長的代表在以後的十天或兩星期之內可以根據此等原則詳細檢討各項和約。但在開會一星期之後，這種希望竟告落空的感覺已頗明顯。我們曾經費了許多時間討論程序問題。法國希望討論管制德國問題。莫洛托夫希望討論德國賠償問題。他還提出了對日管制委員會的問題。我們對於對義和約未獲進展，而蘇聯代表團還堅持英美兩國應該在外交上承認東歐的傀儡政府。

在我看來，最後這個為求乃是會議的主要障礙。星期日早晨，我決定必須使莫洛托夫明瞭為何我們拒絕承認由蘇聯所扶植和維持的政府。這天蘇聯官員日間到鄉間去遊玩，於是約定下午五時半在蘇聯大使館會晤。

我在開始談話時開頭就說，「爲了世界的將來，我們幾個國家應該繼續合作，並且應該努力調整異見，藉以保持目的的一致」。我於是力言「美國對於旁的事情都不發生興趣，但願鄰近蘇聯各國的政府是對蘇友好的」。

莫洛托夫回答說，「我必須告訴你我對於這點表示懷疑，而把這種懷疑掩飾起來是不足爲訓的」。他繼續說此種懷疑，係由美國對羅馬尼亞的態度所引起。他說，以前的拉第斯古政府「是對蘇聯仇視的，但是獲得英美的支持，但是當對蘇友好的葛羅柴政府成立之後，英美兩國都不予支持了」。

我告訴他說，「雅爾達協定中有關解放國家的部份會受美國民衆熱烈歡迎。我相信你記得葛

羅柴政府是在羅斯福總統政府時代成立的。我們知道這個政府是在維辛斯基向羅王提出限於二小時半內答覆的哀的美敦書之後而產生。自從那時候起，我們的新聞記者不准入境，我國官方代表所受的待遇以及其他行動，已經證實我們對該政府的性質所存懷疑，是有根據的。」

我說，「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該國成立一個既對蘇聯友好又能代表一切民主份子的政府。」我指出在雅爾達會議以後對波蘭問題所發生的種種誤會，終於獲得消釋，我建議我們應該設法對羅馬尼亞政府的組成成份獲致協議，猶如對波蘭問題一樣。

莫洛托夫拒絕接受以波蘭作為先例。他說在羅馬尼亞，這種辦法將引起內戰。他堅持一點，就是祇有在選舉舉行之後，方始可以考慮政府的改組。

我指出那時候的政府將不是臨時政府而是民選政府了。假如我們先來建立一個臨時代表政府，那麼由這樣一個政府舉辦的選舉，其結果可為我國人民所接受。

莫洛托夫發問說，「在英美政府中是否各黨均有代表參加的？」

我回答說，「不，但是關係羅馬尼亞，我們是在講臨時政府而不是講民選政府。由於葛羅柴政府成立的經過情形以及其後該政府所採取的種種行動，假如讓這個政府來舉辦選舉，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是可疑的。」

莫洛托夫於是就攻擊希臘，並且還詢問我們對一國和另一國的態度，為何迥然不同。

我告訴他說，「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在希臘新聞記者准許入境，可以自由行動，並且可以報

告所見所聞，不受檢查。因此美國人民明瞭希臘的情形，而且感覺到當地的情形並不和你描摹的相同。此在羅馬尼亞，新聞記者並未獲得此類便利，而葛羅柴政府的種種行動，使我們相信這個政府是不能代表人民的。」

莫洛托夫說，「顯然的，在希臘新聞記者是快樂的但是人民並不快樂，而在羅馬尼亞，人民是快樂的但新聞記者並不快樂。蘇聯政府對於人民的感覺更爲重視。」

雖然我們的代表相信羅馬尼亞的人民絕大多數是反對葛羅柴政權的，但是我決定不再和他爭辯，而情願努力去找尋消弭異見的辦法。可是他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以爲我們拒絕承認葛羅柴的用意，無非希望一個對蘇仇視的政府成立起來。我在屢次聲明此說不確而一切獲致諒解的努力均告失敗後，最後還是放棄討論，回返寓所。

這個星期日的晚上，美國代表團人員的情緒極爲沉悶。我們就這一次晤談以及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討論了很久。蘇聯似乎有控制歐洲的決心。我們找不到解決各項問題的任何辦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尋求解決之道。

次日的發展未能給予我們任何鼓勵。我們建議各和約中應嚴格規定軍隊數額，並主張設置監督委員會，藉以保證此種限制的嚴格執行。當時正在考慮對羅和約，莫洛托夫立即宣布反對我們的建議。

我說，「全世界都厭倦戰爭。在每一個國家中，兵士都想回家去。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外長會

議能够有所行動，以謀樹立持久和平。這些國家都很貧苦，希望我們能够替她們解除軍備的負擔，這將是我們對這些國家最大的恩惠。我們已經經由聯合國提供保證，決心防止對任何國家的侵略，那麼爲什麼這些國家還需要大量的軍隊呢？」

但是我們未獲任何進展，因此進而討論條約的其他各款，同樣未獲任何結果。

我對於史達林，莫洛托夫和其他人士屢作蘇聯尋求安全的聲明，印象頗深。自從雅達會議時史達林指出波蘭如何在廿五年之內兩次被用作侵略俄國的走廊以來，這種恐懼一直對蘇聯的政策發生深刻的影響。此點可以在莫洛托夫要求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維持完全順服蘇聯的政府一點見之。所以我想假如我們在這方面提供一種保證，或許阻撓會議進展的障礙可以消除。至少，我們可以消除關於這方面的爭論。所以在次日早晨，我再約蘇聯外長作一次私人的談話。

我重新提起我在雅爾達和史達林所作的談話，並且說我對於他所說波蘭在廿五年之內兩次被用作侵略蘇聯的走廊以及他對德國軍事力量恢復的恐懼，印象深刻。我繼續說，「猶如你所知道的，美國在歷史上向來是不大願意參加政治條約的，但是我想問你蘇聯政府對於四強簽訂解除德國軍備廿五年條約是否認爲可取。假如蘇聯政府以爲好的，我準備向總統提出，並且和總統會同提交國會。細則我們以後可以草擬，但是我們希望知道你的意見，就是這樣一個條約對於消除德國侵略再起的恐懼心理，能否真正有所貢獻。最後我說，「假如你以爲好的，我們可再向英法兩

國提出。」

他說他不能提供蘇聯政府的確切意見，但是他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極有趣的見解」。他將向莫斯科提出報告，數日之後我們可以再行討論。其後他回轉到羅馬尼亞問題上去，並且告訴我說除非我們撤回我們的照會，他將不得不提出答覆，因為實際上這是針對蘇聯的一種挑戰。

我告訴他說他有發表聲明的每一種權利，但是他可以相信我是會答覆他的。

次日，共舉行會議兩次，情形都很緊張，因為莫洛托夫和我私下的爭論，終於加以公開化了。

莫洛托夫說，「在羅馬尼亞，有着獲得絕大多數民衆支持的政府，沒有人能否認這一點，我要問：美國政府反對這個政府的理由，是不是爲了它對蘇聯友好的原故？」

他說，我們認爲羅馬尼亞政府是不民主的這種想法，「與事實不符」，並且說：「羅馬尼亞政府爲羅馬尼亞人民所喜歡，但不爲了美國政府所喜歡。那麼應該怎樣辦呢？我們是不是應該爲了美國政府不喜歡而加以推翻，而再來成立一個對蘇聯不友好的政府？假如要這樣做法，蘇聯代表團是不能協助美國代表團的。」

我向莫洛托夫指出，在雅爾達會議中，各國政府首長會同意成立臨時政府，後者應該有各黨各派參與其間，並設法早日舉行選舉。我指出我國在承認波蘭，芬蘭和匈牙利方面所採取的步驟，並且說明這些行動切實證明「莫洛托夫關於美國政府動機的種種聲明，是既不公正又不確實

的」。

上面的一段辯論，可以代表那天早晨整個辯論的情形。那天下午貝文宣佈支持美國的立場。莫洛托夫當然起來加以責難，但是我發覺再討論下去適足以增加惡感，所以不願再就羅馬尼亞問題有所聲明。莫洛托夫於是在結束討論的時候，指責外長會議中其他各國正就羅國問題向他「發動攻勢」。

翌日，九月廿二日這一天，倫敦會議遭遇致命的打擊。

適在上午十時之前，莫洛托夫的秘書來說蘇聯代表團不能出席預定於十一時舉行的會議，但問我不能在十一時半和莫洛托夫會晤。我準時前往，發覺他希望討論日本問題。他說明他所接到的莫斯科訓令，無疑是在莫斯科收到他有關我所建議的不侵略條約的報告之前發出的。他的政府已經通知他說，現在應該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起侵略的條約的時候了，鑒於目前在日本執行投降條件的情形，此點尤屬需要。他力促成立一個管制日本委員會。

這一次並不是莫洛托夫第一次提出管制日本問題，也不是最後一次。我想這不過是他反攻行動中的一個成份，但是我們遭遇了一個相當窘的處境。

英國先前也建議要成立一個管制日本委員會。澳洲對於決定佔領日本的政策也迫切要求更大的權利。日本問題並不在倫敦會議的議程上。我先要獲悉佔領軍的見解，所以不準備加以討論。我說參加波茨坦會議各國政府首長訓令我們集中全力草擬歐洲五國和約。我保證莫洛托夫一俟我

返國之前，將立即提出日本問題，並和他交換意見。

當我們正在談話之際，貝文走進來了。顯然莫洛托夫是叫他中午來的，他來得太早了一些。莫洛托夫說明他要繼續和我談話，貝文就暫時退出。當他中午再參加我們談話的時候，莫洛托夫立刻說他希望提出改組外長會議的建議，理由是外長會議的工作正爲了開會以來辦法上的錯誤而遲延，因爲這種辦法是違背柏林會議的決議的。他說這種錯誤是在九月十一日開會的那天造成的，因爲當時決定法國和中國可以參與對芬，對羅，對保和對匈和約的討論。他認爲法國和中國應該完全退出，唯有在討論在停戰協定上她們曾經簽字的國家的和約時，始能參加，因爲柏林宣言是這樣規定的。這樣，中國就不能參與討論一切的歐洲和約，法國也祇能參與對德和對義和約的討論，其他就不得參加了。

貝文和我都說根據我們的意見，柏林會議的決議顯然規定，法國和中國對於任何建議不能投票，但是當然可以參加討論，現在要她們退出，乃是一種不必要的侮辱。我在向總統請示之後，就草擬一個電報，建議由總統發給史達林，其中說明莫洛托夫的立場將在全世界造成一種惡劣的印象。

當日下午開會，莫洛托夫提出他的建議，這當然使其他各會員國非常震驚。我們極誠懇地勸告莫洛托夫，請他改變初衷，結果完全無效。史達林的答覆證實莫洛托夫的立場，就是反對法國和中國參加。會議已進入僵局。

我們已經到了十字路口。我們發覺除非我們對蘇聯的要求讓步，就無法獲致協議了。我們決定不再退讓，但是我們不願意爭取和平的第一次嘗試結果完全失敗。

民衆切望和平。國內的人民對於蘇聯的野心並沒有清楚的概念。第一屆外長會議勢將完全失敗，我知道人家將以失敗的責任歸咎於我。

莫洛托夫說我對蘇聯不友好，他說自從羅斯福總統死後我們的政策已經改變。在我講，我認爲再對蘇聯護步，將造成協約國以及我們所持原則的失敗，祇有拒絕對蘇聯低頭才能建立將來健全的關係。當戰爭剛結束的時候，蘇聯獲得我國大多數人民的讚美和好感。蘇聯領袖知道我國人民對於和平的強烈願望，他們以爲我們不敢使會議失敗的。我們在倫敦所採取的立場使他們不得不重作估計，這使他們明瞭不能強迫我們接受他們的立場。

在會議結束之前，我們設法擬就一個議定書，列舉業已獲致協議的各項問題，但是莫洛托夫拒絕簽署法國和中國曾經參加討論而得到的任何決議。在有關議定書的若干次激烈辯論中，有一次貝文提到莫洛托夫推翻他先前自己的行動時，曾經說「這是我所聽到的最接近希特勒理論的東西」了。

這句話的影響彷彿像電一樣。莫洛托夫從座位上站起來，開始憤然地向門那邊走去。他走近門時脚步慢了一點下來，因此給予英國人叫他回來的機會，並且撤銷了這句話——他是回來的。

其後再舉行過五次會議，都沒有進展。事實上，好幾天來我們早已瞭解要獲致協議是不可能

的了。但是王世杰力促我們繼續再努力一些時候。會議的最後一天是王世杰當主席。我們大家都感覺到蘇聯方面正在企圖使會議停止。這種企圖的唯一可以想像的理由乃是因爲下一天是預定我担任主席的日子，莫洛托夫似乎希望在美國人担任主席的一天使會議破裂。在一個休息的時間中，我把這意見告訴王世杰。他就說既然會議是由於他的要求而延長的，那麼他也願意負責來主持會議破裂的一幕。

會議毫無結果地延長到深晚，最後王世杰拿起主席用的小槌，並且宣佈說：「我正巧是把會議延長到今天的這個人。現在既然沒有人要求再開會，我就宣佈會議至此休會。我誠懇地希望有關各國政府將設法在今後再召開一次外長會議。」

這是王世杰的勇敢行動。這是最能代表中國外交家的政治家風度的。中國的困難一定不能歸咎於中國國外代表的作爲。根據我的經驗，在國際會議中沒有一國的代表比中國的代表更出色。會議破裂之後，我遄返美國，深知我必將遭遇到批評。大眾的失望情緒是很容易體會到的。我一回國之後，立即向人民廣播了一篇報告，儘可能說明會議的全貌，而不願刺激民眾，使他們發生幻滅的感覺，因爲這將使我們將來的對蘇關係發生不良的影響。民眾方面的反響頗堪告慰。我從此決定假如我們要在國際事務方面採取堅定的立場而能獲得大眾的支持，今後民眾應該得到更多的消息。

同時我決定要把僵局打開；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因懈怠而加以丟棄。

困難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爲了我們未能同意承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所以我就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確定我們對於這幾國內情形的見解並不是根據錯誤或偏倚的消息的，所以就設法選派著名自由份子路易斯維爾城「柯里安日報」編輯埃斯里奇去訪問巴爾幹各國。我關照國務院官員不要給他我國在上述兩國的代表所發來的消息，因爲我希望他用坦白的頭腦去進行調查。

同時我們設法使蘇聯相信凡是力求符合雅爾達協定精神的國家，我們決不吝嗇給予外交上的承認。所以在十月廿日，我們和其他三國會同承認奧地利臨時政府。在十一月二日，我們承認了匈牙利臨時政府。

根據波茨坦協定，我們開始發動討論蒙德婁條約的修正，十一月七日，我們向該約各簽字國發出了一個有關管理韃靼尼爾海峽的建議，其中我們說明我們願意參加互相保證自由通過海峽，但反對由黑海各國單獨加以解決。

此外，我接受了紐約「先鋒論壇報」的邀請，於十月卅一日發表演說，演詞的大部份是向克里姆林宮講的。我力言我們承認蘇聯應有友好的鄰國的重要性。我說明「美國將永不參加這些國家中具有仇視蘇聯陰謀的任何團體」，但是我繼續說：「善鄰政策和婚姻制度不同，這不是有我就沒有你的事情。最好的鄰國決不否認它的鄰國和別人做朋友的權利。」

演說中力言聯合國在促進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並且說，「在一個劃分成勢力範圍和特權的世界中，就不能有維護和平所必要的合作。」我在結束演說時希望克里姆林方面考慮一點，就是：

「我們必須有一個世界，不然就沒有世界」。

同時我叫哈里曼大使要求和史達林會晤，當時史氏正在克里米亞度假。我要他直接向史達林提出一個有關召開和會的修正建議，說明應該邀請的各國，並且說明應該用相互合作的態度來討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局勢。

結果是一種啓示。當大使開始提出我們關於歐洲問題的見解時，史達林突然要求聽取我們關於管制日本的見解。哈里曼感覺驚奇，猶如他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準備一樣，而我所感覺的驚奇甚至更大些。

當莫洛托夫在倫敦提出日本問題的時候，我們以為這祇不過是他的神經戰中的一部份。是時哈里曼也在倫敦，他和我一致認為巴爾幹問題最關緊要。現在我們突然發覺我們錯誤了。原來倫敦會議的破裂是由於蘇聯認為我們在對日管制問題上沒有充份徵詢他們的意見。蘇聯駐日軍事代表特萊夫揚柯將軍當時已返歸莫斯科，這點也可以證明蘇聯態度的一斑。

在接獲哈里曼大使的驚人報告不久之後，艾德禮首相和金氏首相到華盛頓來和總統商討管制原子能的程序。這次會議中所獲得的協議，在國際關係上已經極複雜的問題中，又注入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幾天之後，適逢感謝節，我獨自坐在辦公室中，利用假日來靜靜思考若干問題。突然間我想起在雅爾達曾經同意三國外長每三個月應該會晤一次。三國外長會議可能使製造和平的機構再度

發動。我想這是值得嘗試的。所以在次日早晨我就打一個電報給莫洛托夫，說明在雅爾達會議時曾經同意三國外長應該經常會晤，並且指出他們在舊金山，波茨坦和倫敦已經非正式地會晤過，但還沒有在莫斯科會晤過。所以我建議在蘇京舉行會議。我確信蘇聯政府一定高興發出邀請，並且相信假如我們在莫斯科會晤，使我有和史達林直接談話的機會，我們可能把和約的障礙消除。

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建議召開會議是違背外交上的慣例的。許多外交家和評論家都提醒我這一點，並且說在未決定應該討論什麼問題之前，這種會議是不應該召開的。但是鑒於已往的經過情形，我知道要靠通信或經由大使來獲致協議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和平太重要了，使我們不能不願意再作一次嘗試。此外，第一屆聯合國全體大會即將於一月間揭幕，這是我們親自去促請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參加我們所擬就的管制原子能計劃的唯一機會了。

所以我就不顧外交家和評論家的勸告，決定到莫斯科去。

第六章 莫斯科會議打開了一個僵局

飛往莫斯科的途中很緊張。沒有蘇聯的領航員，我們是不能飛過蘇聯的上空的，十二月十四日，在柏林一個蓋滿厚雪的機場上，他們和我們會齊了。柏林和莫斯科之間還沒有可用的機場，飛機就帶足了一旦發生事情可以折回原地的汽油。大約距離莫斯科還有六十英里的時候，領航員告訴鮑倫，我們迷失了航路。他們正在想法辨明讓積雪深掩的村舍，在任何情形之下，這是艱難費事的，在這冰天雪地的時候，簡直就不可能。飛機飛得好低，我擔心着我們要撞上那迎面而來的小山了。

「這一帶沒有山，」鮑倫告訴我。

「我願意接受你的保證，」我說，「只要你能告訴我這一帶是甚麼地方。」

領航員和駕駛員要求准許另外再作十分鐘的低飛盤旋，駕駛員說汽油除了足夠盤旋外，飛回柏林也仍然綽有餘裕。我答應了，並且說，拿破崙和希特勒想到莫斯科來，都失敗了，我，自然不會反對立即撤退的。

當十分鐘快要過去的時候，領航員發現了一座熟悉的建築物。他們知道了方位，幾分鐘內就

飛回了通向莫斯科的航路。我們雖然沒有降落在預定的機場上，我却覺得從沒有一個機場比它可愛。

蘇聯的接待，並不弱於氣候的挑戰。外交部官員預料我們可能降落在另外一個機場，早就分別準備好了歡迎人員。莫洛托夫雖然並不在場，我們照樣受到了合式的接待。

汽車開往美國大使住宅的史巴索宮的時候，風雪妨害了我對這座城市作更多的巡禮。很失望，因為我像到了許多難得遊歷的地方一樣，急於想認識莫斯科呢。我安慰着自己，以後還可以看到。像平常一樣，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懷疑如果別人化費了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時間的一小部分，是不是也只看到這個城市的這麼一點點，除了我們工作和晚上睡幾點鐘覺的史巴索宮；會議地點的斯普利多諾夫卡宮；和我們會見史達林的克里姆林宮之外，唯一我所見過的地方，只有蘇聯政府招待外交使節的大歌劇院。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五時，會議開始。莫洛托夫在我的提議之下，担任主席。由於了解史達林委員長對於遠東情勢的關切，我提議在議程上包含下面幾個議案：在華盛頓設立遠東委員會和在東京設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建立朝鮮統一政府，作為朝鮮成立獨立政府的初步；檢討美國對華政策，並包括華北日軍解除武裝及遣歸問題在內。同時，我們同意非正式的討論蘇軍佔領東北；印度和希臘英軍的撤退；蘇軍撤出伊朗等等問題。議程上原有的議題，依據我原先的提議，有：設立聯合國原子能管理委員會；再度召開外長會議並恢復外長代表的工作；情形許可時，承

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現政府。在莫洛托夫的要求下，議程上的第一項，原子能問題，改爲最後一項。這不啻告訴我，他把這個問題看得並不重要。

我們對於歐洲和平會議程序的提案是根據我們上次在倫敦會議的主張。在那裏，我們曾經贊成蘇聯所主張的和約草案由外長會議草擬，但堅持草案必須送經和會討論，唯一的改變，是在最後一段，它規定了和會討論和約草案並提出建議之後，最後的決定必須歸屬簽訂停戰協定的各個簽字國家。換句話說，英、蘇、美、法四國決定對義大利和約；英、蘇、美三國決定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三國的和約；英、蘇兩國決定對芬蘭和約。

這最後一段的修改，是按照史達林在休假期間接見哈里曼大使所提出的建議，我們莫可奈何地接受了它，因爲我們知道，這是唯一使蘇聯同意召開和會的辦法。

莫洛托夫當天提出一個對案，依然沒有改變蘇聯代表在倫敦會議的主張，規定在和會之中，每一種和約，只能由與某一國實際作戰過的國家討論。實際上，這就是說，需要一種不相關聯的和會處理每一種和約。根據莫洛托夫的定義，在決定對保對匈和約上，甚至在和約的討論上，只能有五國參加，就是三強，南斯拉夫和希臘決定對保和約。捷克取代希臘的位置可以參加對匈和約。對羅和約的決定只能限於三強。對芬和約則限於英蘇兩國。對義和約最多，一共有十二個國家，包括三強，法國、希臘、加拿大、南斯拉夫、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巴西和阿比西尼亞。

很明顯的，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就提議我們先談議程上的第二個議題。一直等到第二天，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哈里曼和我舉行私人談話的時候，我才坦白地表示我對蘇聯的提案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們的提案，根本是依照史達林向哈里曼所表示的意見擬定的。莫洛托夫答辯說他的提案絕對符合史達林的意旨。於是，哈里曼就把那次談話大略地敘述一番，指出史達林第一天的談話，與蘇聯現在的提案相同。但是，第二天，史達林同意了祇能有一個和會，凡是在參與和會的名單之內的國家，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但規定外長會議的各國保有「決定最後的和約條文」的權利。

莫洛托夫願意同意美國在對芬和約中有發言權，但沒有更大的進展。

當我們十二月十八日開會的時候，我立即根據我們的提案的條款，提出了有資格被邀請參加和會的名單，這名單包括「所有曾經用實際軍事力量對歐洲軸心國家積極作戰的聯合國會員國」，一共是二十一個國家。

「這次大戰是一個戰爭，」我鄭重地說，「在危難時期中，盟國的每一個伙伴都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中國在阻止日本，使美國有大量的援助運到歐洲的工作上，有着偉大的貢獻。挪威船隻的運輸軍需，幫助了盟國空軍的進擊。這些國家都應該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這對於三強毫無損害，而只有使全世界都對三強的公正更有信心。」

貝文支持我的意見，並且舉例說，像挪威這樣的國家，在大戰中犧牲了他的三分之一的海

員，如果被排斥在和會之外，是不公平的。很久的商談還是談不出結果來。於是我們決定減少出席人數，再舉行非正式的會議。莫洛托夫指着我的名單說，印度必須除外，「它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沒有自己的外交部」，如果印度允許參加，波羅的海蘇聯的共和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也必須被邀請。貝文自然是不贊成把印度除外的，印度曾經派遣過大量的軍隊到歐洲戰場。

那天晚上，哈里曼，鮑倫和我，到克里姆林宮與史達林作了第一次會談，我希望當着莫洛托夫，把我的意見告訴史達林，好使莫洛托夫難以閃避。我希望與有權力決定的人見面。

克里姆林宮是有名的神祕的地方，像一個欣賞神祕故事的讀者，我注視着我第一次進入它的內部，在到達史達林的辦公室以前，我們被引導穿過三個接連的房間，每間都有幾扇相同的門。我正在忖度着史達林是何等安全地被保衛着。忽然我想到任何一個到過白宮的外國人，也會有同樣的印象的。當一個人去會見杜魯門總統的時候，必須先走過很長一段走廊，再被照料進入西蒙所管理的接待室，然後，還須經過總統祕書康萊利的辦公室，最後才到達總統的橢圓形的辦公室，最主要的顯著區別，是克里姆林宮每一個人都是穿着制服而已。

史太林的歡迎頌詞是公事式的，但是誠懇的。奉上總統的信件之後，我向他保證我們相信美蘇之間沒有甚麼我們不能解決的爭端。

「我們唯一的願望，」我說，「就是和平相處，增進美國人民的安樂，並且幫助我們海外的

友邦重建因戰爭受到的損害。」

史達林回答說，他同樣的具有這個願望。我們同意由於兩國傳統與習慣的不同，彼此對於一個問題有不同的解釋，實在是可以諒解的事情。他申述他相信我們在化除彼此的歧見上，已經有了很好的成功。

我就簡略地把我與莫洛托夫討論邀請國家名單的事情告訴他，發現他已經有了一張名單在面前，我指出如果印度與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允許參加和會，「那就是說英國將有五個自治領，蘇聯將有五個共和國參加和會。」

「我很難把這種決定向美國人民解釋，」我說，「我只好在名單上再加上五個國家了，包括我的故鄉南加羅林州在內！」

莫洛托夫插進來說，即使印度除外，英國還是有四個自治領出席和會。

「蘇聯和美國都有足够的力量單身參加，我相信莫洛托夫先生在和會上一定能適當地保護蘇聯三個共和國的權益，」我回答說，「我們在和約方面已經作了重大的讓步，我們要求這個和會名單被通過，一點也不過分。」

史達林說，他看我們並沒讓步，因為名單與哈里曼十月間給他看的相同。我解釋說，對於和約起草及最後通過所作的讓步，比名單的事情大多了。他主張與某一敵國作戰而簽字於停戰協定的各國，才可簽字於和平條約之上。例如：比利時與荷蘭，就沒有對羅馬尼亞和義大利作戰。於

是他又再提及波羅的海國家對於戰爭的貢獻。他說，他相信我們不久會承認這些國家的，但是，他了解如果英蘇都有六票而美國有一票的時候，對於美國，是過意不去的，這種情形，必須解決。一個辦法就是也給美國六票。他追述雅爾達會議時他曾經與羅斯福總統商定，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可以多得兩票，假如我們願意的話。

我窺測他那晚不會改變莫洛托夫的決定，但是以後他是可能的，我就請他對這個問題再作考慮，並且希望我們能夠得到一個解決，他贊成了。

第二天下午，莫洛托夫離開會議桌一會兒，當他回來時，他說史達林委員長剛才打電話告訴我，已經決定接受我們的名單。

會議很快的通過了「和平會議至遲應於五月一日在巴黎召開」，但是這是費了很久的爭論才決定的。所爭論的是：那幾國應在和約完成後簽字？中國和法國是否應該參與這一項決定或者僅僅通知他們？最後，我們商妥了「既通知而且邀請出席」的決議。

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們接到了中國的友善的答覆，法國却無回信，我很盼望，作爲一個聖誕節的禮物，要讓全世界知道和平會議就要舉行了。我打長途電話給皮杜爾也沒有接通，我知道了他正忙着與他漂亮的妻子結婚。最後，我建議我們先行宣佈我們的協議，並且聲明法國和中國都會被邀出席。我建議過巴黎爲和會地點，但是我們沒有提到這一點，因爲還在等待着法國的答覆。

於是，一九四五年聖誕節的清晨，全世界的人知道了，經過五個月的協商，最後已經得到召開和會「重建人類和平」的協議。

這種決定不算是理想的，但是它使小國有了列席和會的機會。同時，大國也並不受我們本身也參加的和會的建議案的限制，靠了全體表決制，能够拒絕接受爲和會建議案所專斷地排斥的最後條約。經驗證實過和平會議的價值，歷史也告訴過我們，實際上和會裏三分之二以上所表決通過的建議案，總是加入在條約之內的。

這個問題解決後，我們又再討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問題。會議的第三天，我會經訪晤莫洛托夫，並且送給他一份馬可·伊斯利治的報告（譯者按：伊氏是美國國務院派往保羅兩國的代表），敘述羅、保兩國情勢的報告。我告訴他，我們本來打算把它公開印行的，現在只想把它拿來討論，希望伊斯利治的發現，能够供給一個理解的基礎。

莫洛托夫看也不看這個報告，就反對它，說伊斯利治自然知道我是反對承認這些政府的，因此必定影響了他的判斷。

我把這份報告前言中記述我對伊斯利治的提示指給他看，很清楚的，伊斯利治完全是一個自由的觀察者。我告訴他，在經過獨立的，毫無偏見的觀察之後，伊斯利治發現不但這些政府沒有遵守雅爾達協定，而且都是爲一黨所把持操縱，並且被暴力挾制而不能代表大部分愛好民主的人民。我請他特別注意，在羅馬尼亞，伊斯利治發現親法西斯的人物，甚至親納粹的鐵衛團的人

物，現在都又掌握了政權。

莫洛托夫指出一點事實，保加利亞是經過了選舉的。我要求他注意伊斯利治評述這些選舉完全毫無意義，事實上，伊斯利治在一個月以前，就指出了它的結果會如何。在羅馬尼亞，伊斯利治僅僅只能證實我們所知道的兩件事情，維辛斯基的活動和葛羅柴政府就職後的高壓政策。

我要求他對於伊斯利治的建議給予特別的考慮，伊斯利治建議美蘇兩國締結一個類似在東歐的敵國所訂的協定。

讓莫洛托夫對伊斯利治的報告作了兩天的考慮之後，我送給這位外交部長一件公文，建議對這些國家分別採取行動。公文上提議，由於情勢有異而必須改變，三強應該聯合建議改組各該國政府，以容納所有的有領導地位的民主份子。莫洛托夫堅決地反對這個建議，他認為保加利亞經過了蘇聯承認的自由與無限制的選舉之後，已經無須再有改變；在選舉之後的任何干涉，他認為一定要引起保國人民最大的反對。他駁斥批評反對黨無法存在的反對理由，對於羅馬尼亞，他認為羅王不會求三強協助建立政府的，除非是受了英美代表的唆使。我告訴他，不是這樣的。但是，他不願相信我。他拒絕了伊斯利治的報告，說這僅僅是重覆述我的見解而已，不去旅行考察也可以寫得出來。

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再去直接會見史達林了。當晚我就去見他。約好下午十點鐘見面，這正是我平常上牀睡覺的時間，但是這正是史達林開始辦公的時間。

我們首先討論一切外國軍隊撤出伊朗的問題。後來我就表示我希望討論巴爾幹問題，「因為我和莫洛托夫對這個問題鬧得很僵」。

史達林笑了，說這是料想不到的新聞。

我肯定地說：「解決這個問題和進行和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我們就可以對他們作經濟上的幫助。」於是我很快地把情勢敘述了一番，最後我說，如果我們不能成立協定，我就要被迫刊印伊斯利洽的報告了。

史達林回答說，如果我覺得必須刊印伊斯利洽的報告，他也將求愛倫堡（蘇聯官方記者），也是一個公正而到過這國家的人，發表他的報導。

這將很不幸的了，我告訴他，當這兩個報告會分散而不會溝通我們兩國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我表示我相信靠他的幫助和諒解，我們可以找到對蘇聯表示友好的民主黨派的領袖。

「只要雙方願意解決問題，辦法是可以找到的。」他說。於是他提出美國報紙控訴紅軍施用壓力加於保加利亞選舉的事情。他說這是不真實的。並且指出匈牙利，雖然蘇軍也在場，選舉的結果却並不是共產黨獲勝。這種批評，他強調地說，是侮辱了蘇聯，蘇聯僅只希望他的鄰國不是敵對而已。他說他要我記住：在大戰期間，匈牙利的軍隊曾經攻到頓河，羅馬尼亞的軍隊也曾經到達伏爾加河。

因為保加利亞已經經過選舉，現在已不可能要它改組，但是，最後他同意了勸告他們。

讓現在沒有參加政府的兩個重要黨派的兩位真正代表人物加入政府。他鄭重地說，不能強迫，只能勸告。他同意我建議的勸告應由蘇聯担任。我說明白了我們將保留權利決定正式承認的條件是否已經建立？對於羅馬尼亞，他承認變動大致將沒有大困難。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同意由英、美駐蘇大使會同維辛斯基組織委員會，到羅國京城與羅政府商討增加他黨人物，並且保證重建和享有人民的自由。史達林要我把他接受這個原先我在倫敦會議時所提出的建議的消息轉告貝文。我答應轉告英國外長，同時開玩笑地說，這好像我們已經成了一個對付英國的集團，因為我還沒有把我向莫洛托夫建議在莫斯科開會的事情告訴貝文，雖然我就要告訴的。

史達林也開玩笑似地說，這很明顯地不過是遮掩一下我們的集團的真相罷了。

第二天，我把史達林同意的建議提到會議上，但是，我們即刻就與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對於勸告羅國的措詞，作了一整天的辯論，當史達林請我們聖誕節晚宴的時候，辯論還在進行。晚宴的時候，我坐在史達林的右邊，貝文坐在他的左邊。我說我們的報紙曾經傳說他病了，現在我很歡欣地發現他很健康。他說他最近的假期是他好多年以來的第一次，經過這次大戰的磨折，已經不像早先那樣的健壯。在假期中，他曾經處理許多重要事情。但是他也得到了休息而且比前幾年更加健康。他說，他決定每年休假一次。

我熱誠地向他舉杯致賀，祝福他今後年年有假期和身體健康。

那晚我和史達林的談話，像前兩次一樣，是在坦白而熱誠的氣氛中舉行。在許多問題中，我

所特別着重的是伊朗問題。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告訴我們對於伊朗問題關切，是因為一九四三年在德黑蘭，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和他曾經簽定保證，在那個保證裏，三強領袖承認「伊朗對抵抗共同的敵人所作的貢獻，特別是在保衛從海外通往蘇聯的交通」。此項保證允許「戰事終了以後，伊朗發生的任何經濟問題，都將得到我們的全盤考慮」，而且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一致努力。並且明白地宣告「一致支持伊朗政府保持伊朗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願望」。

莫斯科會議以前的伊朗情勢，顯示這種保證已經達到將被破壞的險境。伊朗政府抗議：當他們派遣一千五百個士兵，到亞塞爾拜然省去鎮壓被外國勢力所煽動的叛亂時，這支伊朗政府軍隊被蘇聯紅軍阻止在途中而且強迫它退却。伊朗政府因此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完全撤退。我們立即下令留駐伊朗的美軍撤退，同時還分別致函蘇聯和英國，催促他們也採取同樣的行動。

伊朗的抗議還是在等候着答覆，我告訴史達林，除非我們實踐了德黑蘭宣言，伊朗政府就要在即將於倫敦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中提出譴責。作為宣言簽字國之一的美國，有義務支持伊朗列席的權利，我們覺得我們很難解釋，三萬蘇聯軍隊怎麼會受到一千五百個伊朗士兵的威脅。

史達林就把他認為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切要事實大略地敘述一番。蘇聯南部的巴庫油田與伊朗的邊界接近，因此這就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爲了防止伊朗可能向蘇聯作戰，爲了沒法信任伊朗政府，這些地方就處在嚴密的防衛之中。破壞者還可能潛入巴庫油田縱火，他繼續說。因爲條

約上規定，直到三月十五日以前，蘇聯有權在伊朗駐兵，所以並不準備在這時期以前撤兵。到了那個期限，還必須要審度情勢，看看是否可以撤兵？這種決定主要的將以伊朗政府的行動爲定。他指出一九二一年的條約上，伊朗曾經給予蘇聯駐兵伊朗北部的權利，假如可能有外來的危害的話。

我告訴他，由於讀到德黑蘭宣言，由於讀到美軍駐伊朗總司令康羅利說伊朗政府在運輸供應品到蘇聯的工作上與美蘇兩國合作得到很好的報告，我非常驚異的知道他認爲伊朗政府是敵對的。他雖然有權利在三月以前駐軍伊朗，我指出他實在不必如此。美國，時常認定三月二日，而不認爲史達林所說的三月十五日是最後的一天。

史達林告訴我，蘇聯對於伊朗，沒有領土的或者其他的企圖。只要巴庫油田得到安全，就很快撤兵。

我愈對於史達林繼續駐兵的理由想得更多，愈覺得我對於蘇聯的立場的信心更少，他的說法是荒唐的，三萬訓練優良，裝備齊全的軍隊，阻止了一千五百訓練很差裝備不全的伊朗士兵，在公路上整隊向亞塞爾拜然省前進，爲的是避免發生騷擾？他所敘述的「恐懼破壞者會從弱小的伊朗潛入蘇聯，縱火破壞巴庫油田」，也同樣的只不過是他在伊朗駐兵的不充分的理由而已。但是，他答應撤兵的問題將在撤兵日期討論，表示他認爲我們對於注意實踐德黑蘭宣言是正常的。因此，我就決定再作努力，使他了解我們對於實踐這種義務的意見。

伊朗問題是我第二次與他見面時首先提題的事情。我告訴他，我極端恐怕着這一個問題將在聯合國第一次會議中討論。我說，大國遵守他對小國所作的保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伊朗在倫敦會議中提出這個問題，那會很不幸的。我提醒他，因為我們了解這種情勢，並且由於我們的神聖的保證，我們將被迫支持伊朗的立場。美國將非常遺憾地在第一次聯合國大會中與蘇聯對立。因此，我希望我們能夠商妥，預先阻止這種可能。

我們討論貝文所提出組織三強委員會前往伊朗尋求一種完整的解決方案的建議。他對貝文的建議不發一言。於是我再表示我希望我們在伊朗的行動，不要造成我們的不一致。對於這點，史達林說：「我們不會做出使你們難堪的事情」。

聖誕節那天，會議重新再辯論巴爾幹和伊朗問題。最後，我們對於羅馬尼亞問題取得真正的協議，但在保加利亞問題上完全是一個僵局。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主張規定內閣只能讓忠於現政府的人參加，貝文與我指出這種措詞，除了有利於那些已經宣誓忠於我們正在設法擴大的政府的份子以外，將要排除一切民主份子，而實際上，將使我們的協議毫無內容。貝文指出，他與邱吉爾作了三十年的政治鬥爭，如果在這種規定之下，他今天決不能進入英國政府。

十二月廿五日的下午，我與莫洛托夫有一次私人談話，在其他事情之中，他說他想英國對於伊朗問題的提議，大致是可以接受的。他詢問我的意見，我說我將接受這種建議，特別為的是想設法避免使伊朗把這問題提出於聯合國大會。在當晚的會議上，莫洛托夫提出對貝文建議的幾項

修正，貝文除了把撤兵日期留待討論以外，都接受了。他說撤兵日期在條約上已經訂定，現在的修正是不必要的。

從我們的私人談話看來，我想莫洛托夫最後會接受貝文的條文的。但是，十二月廿六日下午，當我們開會的時候，很明顯的，蘇聯最高當局已經決定改變了他們的態度。莫洛托夫宣佈布朗問題不在議程之內而且「不能考慮」。貝文抱怨他自己實際上已經接受了蘇聯提出的每一條修正案。他說他知道，在他與史達林談話之後，蘇聯會同意他的建議的。

「很清楚這種意見已經改變了，」莫洛托夫回答。「沒有任何的決定，這個問題不在議程之內，所以也無須乎在公報中提及。」

「我第二步怎麼辦呢？」貝文問。

「你當然知道囉！」莫洛托夫回答。

貝文激動地說，他想知道這種情勢，同時覺得非常遺憾。

對於保加利亞和伊朗問題的熱烈的辯論，妨害了我們對其他問題再作協議，因此，我建議我們到倫敦再談這些留待解決的問題。代表團人員隨即準備三國外長簽字的公報原稿，清晨兩點半鐘的時候，原稿完成。在一個正式的會議中，用兩種文字寫成的原稿，等待着簽字。那就是說我們每個人一共要簽九份。貝文第一個簽字了以後就輪到我，簽完了，我站起來向靠近我坐位的一位英國代表團人員告別。

忽然，莫洛托夫要他的一位助手讓我回到會議桌上。他說他的人员「誤會了」，把蘇聯關於保加利亞的提議寫在俄文原稿裏了。他問我們：這個是否不能接受？我們立刻說那不能接受。他又提議我們可以併用我的建議的前半部分和他的草案的後半部分，我說我們做事不能只做「半截」，他既然只做了一半，最好就接受美國的建議罷！靠着這個噱頭，他答應了。

貝文談諧地要他再看看，是不是可以從口袋裏再找出一個誤會，使我們對於伊朗問題，也得一個圓滿的解決。莫洛托夫也幽默地說，他很抱歉再也找不到。於是公報原稿經過修正後就簽了字。

那時已經是十二月廿七日上午三點半鐘。我疲倦得要死，我們都是這樣。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他們比我們好些，因為他們習慣於中午開始工作直至半夜已過才止。

我們的飛機決定七點半鐘起飛，我整理好行李，小睡了一會兒。向美國新聞記者和廣播記者談了話，準時趕到機場，這時候似乎還很早，但是，莫洛托夫辛維斯和基已經到達機場向我們送行了。

三夜以後，坐在華盛頓廣播電台播音機前，向美國人民報告的我，比起十五個星期以前從倫敦回來以後，坐在同一播音機前的我，是快活得多了。召開和會的提案，在倫敦會議沒有接受，現在已經在莫斯科會議中接受了，參加國家也按照着美國所提出的名單。經過了十個月設法促使蘇聯遵守雅爾達會議對於巴爾幹的協定的經驗，我們完全地了解着協議與實踐的區別。但是，哈

里曼、鮑倫和其他幾位處理這些問題的人，感覺到我們已經在比較雅爾達更加特殊的協定上有了進步。

對日政策的問題，曾經在倫敦會議時成爲蘇聯頑強反對的重要項目，現在已經全盤通過杜魯門總統和我在啓程前所擬定的計劃。我們得到了關於美軍留駐中國的協議，同時還鼓勵了史達林重申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配合着馬歇爾將軍這時候正在着手幫助建立統一和民主的中國，這似乎是一項重要的收穫。

原子能的問題，我預料要遭遇困難的，蘇聯已經同意，實質上未經修改，支持英國和加拿大業已贊成的設立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決定。

唯一在會議上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是派遣一個委員會解決我們共同的伊朗問題的建議，所以我很驚奇和失望的發現我們的一部分報紙批評我們的協定是「綏靖政策」，有些批評我認爲是私人的。有些則是因爲人民很明顯的被引入了不正確的想法——大部分是由於蘇聯檢查從莫斯科發出的和會消息。但是，大部的批評，是從人民的欠缺理智的反蘇觀點，他們總認爲任何與蘇聯關於任何問題的協定都是「綏靖政策」。

具有在波茨坦，倫敦和莫斯科會議的經驗的人，無不會懷疑前途仍然有着不少的難受和嘗試的日子。但是由於莫斯科會議的結果，我們在一九四六年的新年，却面對着更大的希望。也許其他的國家也是這樣，我希望如此。

第七章 再至倫敦，重遊巴黎

我自莫斯科回國五天後，又飛至倫敦，參加聯合國第一次大會，主要任務是要使聯大通過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議案。在離華盛頓之前，曾宣稱大會通過此議案後，我立即返美。但至倫敦後，情形並不如此簡單，在莫斯科所討論的一些問題，又追蹤而至。哈里曼大使來報告，關於羅馬尼亞政府改組事，維辛斯基、寇爾和他本人在羅京舉行的會議，毫無進展。保加利亞政府擴大事，亦無頭緒，而伊朗問題更趨尖銳化。

伊朗代表來問我，他是否可以將蘇聯軍隊繼續駐在伊朗及干涉伊朗內政的事提交安理會檢討。他說貝文對此事未發表意見，因此，希望我提出意見，我說我亦無意見可以貢獻，因為安理會剛成立不久，無前例可援，目前似只應以最緊急問題交該會檢討。不過我告訴他，我願意對此事的事實，加以考慮，將意見於翌日告訴他。但他沒有等待我的答覆，即將問題提出，此舉引起蘇聯代表的猜疑，以為是貝文的主意，慫恿伊朗代表這樣做的。從伊朗代表所告訴我的話看來，蘇聯代表的猜疑是錯誤的，蘇聯代表既生懷疑之心，於兩天後即提出反對英軍駐希臘的問題，烏克蘭代表亦提出反對英軍駐印度尼西亞的問題，於是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辯。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外次在距大會會址不遠的蘭克斯特大廈內集議起草和約，就在這樣的氣氛中進行着。

大會於一月廿四日一致通過原子能議案，我於是束裝返國，揆諸當時的情形，外次會議必會遭遇九月外長會議所遭遇的同樣阻礙。該會於是接受我們的建議，起草義大利和約，因為義大利不但在波茨協約內名列第一，也是因為法國對其他和約的參加權問題尚未解決的緣故。

三月已屆，但外次會議對於賠償，殖民地及義南疆界這三個主要問題，仍是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關於義南疆界問題，該會決議組織一個專家調查委員會，於劃定疆界時應注意兩點，（甲）義南兩國人民留在外人管制下的數目應儘量減少，（乙）應對當地的地理及經濟因素予以考慮。我們的外次鄧恩，即委派馬斯萊代表我國參加該委會。於三月九日抵特里斯特。

外次會議於是討論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巴爾幹三國和約草案，法外次很機智地未參加，蘇聯所提出的草案很簡短，實際是略將停戰條約加以引伸而已。但對於英、美所提供的補充條款曾獲有進展。

我們在莫斯科時，曾同意「在草約完成之後」及「在五月一日之前」應舉行和平會議。時間一天天過去，而外次議決的只有數條，我們如果不願食言，自應採取非常行動，於是我向安理會其他會員建議，應召集會議，以促進外次會議的工作，並建議在巴黎開會。我們曾同意巴黎將作為召開會的地址，而我亦懇切希望安理會亦能在該處開會。我認為法國共黨既在巴黎非常活

躍，莫洛托夫或不致像以前那樣固執反對法國參加一切和約的檢討會議。我們訂於四月廿日開會。

第一次集會，皮杜爾建議四強代表均應參加五國和約的檢討。莫洛托夫雖然數月來極力反對此點，但此次很快地即同意了。不過亦表示這是他讓步的限度。

第一個引起爭辯的即是議事程序表。皮杜爾亟欲討論對德問題，而我提出一個德國裁軍廿五年的草案，並建議組織特別外次會議，從事起草對奧和約。莫洛托夫表示願意討論德國問題，但認為我們所提出的和約建議並不充足，並完全拒絕將奧國問題排在議事程序表內。我瞭解如欲會議獲致進展，我和莫洛托夫必須會晤一次。於是我邀請他，維辛斯基及繆譯白夫洛夫，柯亨，波倫一同餐敘。

我們的聚餐是私人間事，但莫洛托夫和史達林那種時刻不離的護衛仍未稍弛。聚餐那天下午，蘇聯安全官員先至孟淵飯店美國代表辦事處視察聚餐地點。我的秘書孔納爾小姐欣然領着他們參觀我太太和我所居的房間。他們並不加以批評，於是我們以為他們對於一切安排表示完全滿意。

晚上貴賓們來了，那位和莫洛托夫形影不離的安全武官也一同來了。大廳的每一端我們都派了一名美國憲兵看守，但莫洛托夫的衛官仍守在大廳內，他可以看到這五間房的每一個出進的門，連我的辦事室也在內。

我太太和孔納爾小姐離房到樓下餐廳進餐。那位衛官對於自房間出來的人顯然不予以注意，因為當她回來時我太太擬進臥室，衛官却舉手搖頭。他的動作以任何言語演譯出來，自然是表示她不能進去。我太太即用美國話告訴他這是她的房間，剛離此下樓去的。但這位先生態度堅決，她不能進去。她們終於撤退至辦事室，計劃如何克服臥室的事，於是求援於陸軍，請留守大廳內的一位憲兵馳援。憲兵亦不懂俄語，但他一身戎服却使蘇聯衛官置信她們是可靠的人。無疑他接到的命令是不准人進入屋內。幸得憲兵之助，美俄關係的另一危機因而免避了。

莫洛托夫也許不知道這種護衛的方法。這些安全官員或由一個與我們的特務相似的組織管轄。我想莫洛托夫有時亦與我同感，希望能逃避這種時刻不離的看守。

我在倫敦時，英國警察當局特派一位幹員保護我，他從不准許我一人走出旅館。在巴黎時，是一位能說英語的便衣警哈佛納爾担任此職務，有一次我會逃過他的看守，那是在和會最令人喪氣的一次集會之後。我太太也抑鬱不安，邀我出去散步。我不但喪氣，也厭憎老是被人看守着。我不顧太太的反對，兩人自旅店的側門溜了出去。我以為逃過了安全官員的看守，精神爲之一振。我們走了半小時的路，我無意間掉頭回顧，赫然看到哈佛納爾跟在後面。後來知道他是得着旅店一位職員的報告，才跟了過來。在「法律」和我太太反對之下，我只得承認我是錯了，以後不再違犯。

我時常覺得當安全官員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危險性更大。每天我們乘車去開會，車前有兩部

機器腳踏車引路，他們口里吹着嘯笛，以每小時五十哩的速度在巴黎街道上疾馳着，很引起行人的反感。我會請他們將車開得慢一點，但他們不顧，仍瘋狂似地穿過紅燈。我們只得跟着疾馳，雖然速度表每跳動一次，我們的神經亦增加緊張一次。

我的話離題太遠了，再回到聚餐的事。我們尚未走進餐廳時，莫洛托夫即開始對伊朗問題美國所採取的態度，痛加批評。他說我們的行動不友誼，他的政府成爲「反蘇運動中」的受害者，伊朗事件及安理會被利用爲進攻的藉口。我即提出在莫斯科我和他及史達林元帥關於伊朗局勢所作的談話，其用意即在阻止伊朗問題被提交聯合國討論。當時我明白說明，如果一旦提交安理會討論，我們即不得不反對蘇聯政府。柯亨和我曾將安理會實際情形詳細爲之解釋，並促其注意，如果蘇聯軍隊在和約日期之後仍駐在伊朗，此事即不能私下了結。

此次聚餐開始即缺乏和諧，無怪乎以後談到和約及德奧問題時，意見始終未接近。翌晨我和范登堡及康納利檢討局勢，我們咸認爲：這些問題在安理會中早日獲致解決的希望很少。

可是安理會關於義海軍的限制數額，剩餘軍艦的處置，法義邊界三處的修改，組織委員會檢討法國對鄧達布利格區第四次修正等案，很快地獲致同意。於是我們討論殖民地問題，莫洛托夫提出新建議，即二強托管的里波里泰尼亞，由俄義共同負責行政事宜。英國極力反對此議，貝文提出反建議，應立即予利比亞以獨立，法俄均反對此議，最後莫洛托夫宣稱：他可接受法國所提的義大利托管制度的建議，我們仍堅持集體托管制度的主張，不過後來我們說：如果其他國家同

意，並應允十年內予殖民地以獨立，那末我們即可接受法國的建議，法方不同意此點，而英國又不贊成法國的建議，我於是宣稱我們堅持集體托管制度的計劃。

關於割讓多得喀尼斯予希臘的討論，因為莫洛托夫堅持主張此問題應俟殖民地問題解決後再討論，故仍懸而未決。

義南劃界問題的討論，花費時間最多，亦最感棘手。四人委會曾留駐維尼斯求利亞四星期，各別提出建議，蘇聯建議接近南斯拉夫的要求，而英法美所建議的界綫在北部相同，南部則互異。法建議的界綫介乎美蘇建議之間，對於某些地理及經濟因素未加考慮，但對兩國少數民族有適當處置。當時所有的人口統計表極不可靠，但據我們的估計，法建議的界綫使留在南境的義民只有十三萬名。留在義境的南民計十一萬五千名。只有蘇聯一國建議，義應割讓特里斯特，該地人口百分之八十是義大利籍。

五月三日，南首相及義首相分別提出意見，大致與吾人在倫敦時所聽到的相同。翌日外長開會討論，疆局亦未打破。莫洛托夫極力支持南國的要求，謂義大利擬利用特里斯特將為軍事根據地，作為伸展勢力侵入鄰邦的跳板，並謂：吾人不可分割特里斯特以懲罰吾人的盟國南斯拉夫，因為該地居民雖多義人，但實如首之與身，不可分離。我即指出將卅萬人口及數千方哩土地讓與南國，決非懲罰的行動，我再讓步，謂為折衷計；可以接受法國建議，如此阿爾沙煤礦區亦劃入南境內。我並建議在該爭執地區內舉行普選，這些建議均未為莫洛托夫所接受，而貝文，皮杜爾

和我亦不願再讓步，於是只好考慮其他和約。

爲作最後努力計，莫洛托夫邀請柯亨，波倫和我至蘇聯大使館餐敘，他說如果我們同意將維尼斯求利亞全區，包括特里斯特在內，讓給南國，他對於殖民地及賠償問題可以改變態度，但他表示他對於後一問題的讓步，將會影響希臘及南國的要求。他坦白宣稱，蘇聯不能放棄一億元的要求，因數目已十分寬容。我們表示無力接受此議，於是他和維辛斯基即發動一連串宣傳，詆毀美國採用「帝國主義擴張」的政策，指出美軍駐在冰島及中國爲例，並謂我們擬在土，埃，伊朗等國設立根據地。我本想以同樣方式答覆他，但隨即改變主意，只指出駐在冰島的人數只有七百廿個空軍地面工作人員，何能指爲是對蘇聯的「帝國主義」威脅，而關於中國局勢，我說明我們曾在莫斯科詳細討論，並聯合發表宣言。至於中東，我們沒有設立任何據點的計劃及慾望。

餐後的討論中，我對他說：「我們的基本政策，是將德日以外的國家內的駐軍早日撤退，因此我們曾建議迅速與奧國簽訂和約，以便我軍可以撤退。但蘇聯政府駐軍既多，反對此議。世上無人可以懼怕美國或她的企圖，而我抱歉地指出，蘇聯或不能作到此步」。

莫洛托夫爲支持他的英美帝國主義的說法起見，回溯到一九一九年及美軍於革命後出征西伯利亞的事。翌晨他與貝文亦有相同的談話，聲稱貝文曾說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雖已死去，但廿世紀的帝國主義現正活躍不已，並以英軍駐在希，埃，伊拉克，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各處的據點爲

證。貝文雖極力否認此說，莫洛托夫以後在安理會及聯合國大會中仍作同樣的宣傳。

因爲此種論調之故，我們開始檢討其他和約。以後美國關於多瑙河自由航行及經濟機會均等的建議，莫洛托夫認爲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展及資本家統治，亦不足爲怪。

我和莫洛托夫餐叙的情形告知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他們亦如我一樣，感覺悲觀。在此情形下，爭執問題很少解決的希望。因此五月八日，我建議召集久懸亞和會，作爲第一次的勝利慶祝節，並以六月十五日爲慶祝日，以便外次有充分時間，準備已通過的草約報告及對未解決的各條款提出四國代表的意見。

貝文和皮爾均同意我的建議，但莫洛托夫謂依照莫斯科協定，和會應於一切「基本問題」完全獲得一致解決後才能召集。其實，這是給與蘇聯代表一遇到任何爲「基本」問題不能同意時，即可運用否決權的機會。不過，我的建議顯然發生作用，因爲翌日外次的報告於一夜之間通過了十九個條款，以後的一星期，我們繼續努力於和會的召開事宜，但莫洛托夫在和會席上及非正式會議與私人談話中，始終態度堅決不移。他顯然是要延遲撤退他的佔領軍隊。

爲要獲致進展起見，我們建議委派特別副代表，起草對德的和約，但此議亦被拒絕。該星期中唯一的收獲是對華停戰條約的修正，即取消盟國委員會及大半軍事的管制。

五月十六日，我們勉強同意暫時休會，定六月十五日在巴黎再度會談。

我既未能把和會的日期決定在六月十五日，於是又試行提出七月一日和七月十五日，作爲和

會召開的會期，但也未獲成功，我在無線電廣播中說：「像我們在戰爭中採取攻勢一般，我們在和平方面，也應該採取攻勢」。我並且說：世界上沒有任何鐵幕是人類情緒所不能攻破的。

莫洛托夫對此的反應是迅速而猛烈，他說：「貝爾納斯所說的和平攻勢，事實上是一種不願慮到和平的反蘇攻勢」。

可是，當外長代表在休會期內恢復討論時，蘇聯代表終於同意確確實實談判五項和約中的經濟部份。結果，當我們回到巴黎的時候，已加多了許多項業已同意的條款。

六月十四日，我們啓程赴巴黎，這是一年中，我第十一次橫渡大西洋，美國代表團這次決意要儘全力使和會的請柬發出。在會議開始的時候，照例略有小衝突，美國代表團散發對奧和約草案一份，請求置于議程之內，莫洛托夫先生不願意討論我們的草約，但是接受了皮杜爾先生的建議。按皮杜爾主張把「審查對奧問題」一節，包括在議程之內。以後莫洛托夫先生又提出審查「義大利政局」一項反要求。在此後十一天內，進展是非常的遲緩。可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僵局突然有了打開的徵象。我們對於若干經濟條款的同意，使我用出幽默和有希望的語氣說：「我們應該有一個美滿的下午，解決多得喀尼斯問題吧！」莫洛托夫先生的答復，很使我驚奇。他說：「蘇聯代表對於這一建議，並不反對」。

貝文聽了還不甚相信，他問道：

「莫洛托夫先生真的說他同意讓希臘收回這些島嶼嗎？」

蘇聯代表立即證實他確已同意，並且查詢下一問題是什麼。

莫洛托夫很鎮靜的說：「讓我們成立其他的協議」！我建議討論殖民地問題。他說：此項問題可以根據美國建議，予以解決，那就是延遲一年再行決定，假使到了一年，還未獲得協議，就聲請聯合國作一次決定。經過外長代表起草之後，終于獲得通過。

但是，賠償與特港這兩問題，都懸而未決。六月十八日，美國重新建議蘇聯可以從四方面獲得一萬萬美元的賠償。這四種來原是：（一）不能立即變為民用的戰時工業設備。（二）義大利在巴爾幹的資產。（三）義大利商船。（四）由英美獲得的其他戰利品。

莫洛托夫辯說：戰利品不能被問作賠償的來源，嚴格地說，他是對的。戰利品屬於獲得它的政府。莫洛托夫又說：對於義大利軍船隻，蘇聯應得到一部份，因為在波茨坦會議中，美英曾同意讓蘇聯獲得德海軍船隻的一部份，而這些船隻是奪來的戰利品。我們告訴莫洛托夫先生說：這些船隻，既是戰利品，蘇聯名份上就不應取得它們。德軍艦的讓給蘇聯，可以說是一種禮贈，我們並沒有允許永遠把我們的戰利品繼續不斷的給蘇聯，作為贈品，因為他們也沒有把戰利品分給我們。

至于其他三種來源的償賠，他表示接受，但指出我們的估計是過高。據他的估計，這三種賠償，共僅三千萬美元；其餘的須取自現行生產品。我們保留這一問題的繼續討論，建議視察各商船，並研究估計其他賠償品的方法。

三天後，皮杜爾提出出特港問題，他建議在該市暫時建立國際政權，其他三外長對此，均未置可否。當晚，莫洛托夫偕同維辛斯基等來訪我們。莫洛托夫主張把特港移交給南斯拉夫，我們答稱決不能同意特港歸南國管理，同時並請雙方都考慮皮杜爾的建議。

翌日，我建議和會在七月十五日召開並發出請柬。同時利用休息時期，解決其餘的問題。至于十五日未能解決的各項，我們將向集會的十七國提供報告。

雖然莫洛托夫依然堅持這種建議尚未成熟，但是貝文和皮杜爾也參加進來，一致敦促立即發出請柬。我們最後決定在廿四日星期一開始檢討有所和約的進展情形，並在下一個星期五重新考慮美國主張召開和會的要求。

星期一早晨，莫洛托夫要求我在那天下午再在我房間內和他會晤一次，繼續商討特里斯特問題。會晤時，他建議特里斯特和它的鄰近地區應該宣布為自治區，主權屬於南斯拉夫，而由一國際規章加以管制，後者可由四強起草。我們指出這和皮杜爾的意思頗不相同，因為他是主張由聯合國管理並由聯合國任命一行政長官的，但是我們答應考慮。次日下午，我們去答訪他。

我說：「我們已經分析過你的建議，並且覺得這將造成一種不可設想的局勢，因為一旦主權屬於南斯拉夫且由一南斯拉夫人担任行政長官之後，四強代表就不能有所作為，而和聯合國也將毫無關係了。美國不能贊同特里斯特區主權屬於南斯拉夫。我承認蘇聯不能贊成這地區的主權屬於義大利，所以我們願意考慮其他建議，以謀獲一出路——這就是說或者根據皮杜爾的建議由聯

合國家管理，或者讓這個問題留待和會決定。我贊成後者，因為這樣，責任就可以由廿一國來負擔了。」

莫洛托夫於是就問假如特里斯特問題獲得解決，賠償問題能否以「積極的態度」加以處理。我說我以為這將造成極大的困難。

我繼續說：「美國不願協助他國使其實施賠償，但是假如蘇聯能夠供給義大利若干種原料，由義大利製造蘇聯所需要的貨物作為賠償，這一計劃倒有同意的可能的。」

他於是問，假如協議獲致之後，美國是否將簽署所有和約，包括對保加利亞的和約在內。我告訴他說我認為在這方面不見得有什麼困難，等到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可以加以討論。我於是問他能不能勸誘保加利亞政府實行莫斯科決議。他所能提供的唯一答覆就是他的政府已經嘗試過，但是保加利亞的反對黨已經拒絕，所以失敗的責任應由它們負擔。我們在這樣探測了一番彼此的立場之後，就分別了。

次日下午，皮杜爾建議舉行一次參加人員應加限制的夜會，在這次集會上，每一外長祇能有兩個顧問隨從。

和以前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一樣，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和我一起去。莫洛托夫起先重新提出他在我們私人談話中所提出的建議，繼而更進一步提到法國的建議。這次他不再建議一個南斯拉夫行政長官，而建議二個行政長官，一個是義大利的，一個是南斯拉夫的，會同管理行政。

這個辦法當然引不起興奮的情緒，最後貝文說會議的程序似乎不能決定任何事情。莫洛托夫牽強地回答說，對於產生這種結果，英國人不應該低估他自己的作爲啊。

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討論之後，竟能於次日就多得喀尼斯問題和義大利殖民地問題獲致協議，不能不說出我們意料之外。但是就在這方面獲得了協議，還是有許多事情要做的，而進展的情形依然非常緩慢和困難。爲了使工作推進起見，我要求將召開和會的建議列入下一次會議的議程中。莫洛托夫表示拒絕，但是我聲明至少我將提出這個問題加以討論。次日，除了蘇聯代表之外，每一個人都同意和會應於七月二十日召開。莫洛托夫堅持這個建議必須延遲幾天再作決定，以便先行討論皮杜爾就特里斯特問題提出的建議。

特里斯特問題於是進入一嚴重階段。我們不喜歡自由領土的見解，但是這既然是解決難題的唯一辦法，我們就決定設立這個政權，以求有發揮作用的機會。莫洛托夫首先建議一個領土的綱要，但是這是不可能實行的：這個建議主張將船塢和港口切斷，它把市區和水源割開，而把電力變壓機置於南斯拉夫範圍之內。他要求四國監督不贊成聯合國監督。我們拒絕讓步，力主監督的責任應歸安理會，不應該歸利害衝突的四國委員會。

七月三日，我們重提和會問題。這一次，莫洛托夫說他不能有所同意，除非先將賠償問題解決，但是他最後被迫建議九月一日爲可能召開和會的日期。其他三國外長拒絕這樣拖延，但是在原則上他已經有所確定。我們在八時半結束會議，心裏覺得七月四日將爲且有決定性的一天。

次日，我們在下午五時開會。一俟各代表提出慣常的報告之後，皮杜爾就建議會議休會半小時，以便四外長在他的辦公室中就召開和會日期問題作一次私人的討論。在他的辦公室中，他說明他所以提出這個建議，目的乃在希望將和會與賠償問題同時加以解決。

我立即說明我們已經屢次表示願意重行檢討賠償問題，但是必先就和會日期問題作一決定。他說美國不願意使召開和會問題協議的獲致，應該受其他問題的約束。莫洛托夫否認他有這種意思。皮杜爾於是重作覓取妥協的努力，此在莫洛托夫，則亦同意在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在那時候，我就插言說，在和會日期決定之前，我們不能討論賠償問題。貝文的說話更尖銳，他說他不能在議會中說和會的召開是用一億美元向蘇聯買來的。

莫洛托夫在考慮之後，就有所決定。他說他並無購買任何東西的意思，他僅要求蘇聯的合法要求能夠得到考慮。所以他就同意在外長會議中先討論和會日期問題，然後再討論賠償問題，希望兩個問題能够在同一天獲得解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回到會議室，而在五分鐘之內即協議在七月廿九日召開和會，並訓令各代表草擬請柬。

美國代表團於是就提出了一個賠償建議，繼即發生六小時的冗長辯論。七月五日上午一時，我們終於勉強同意蘇聯應獲賠償一億美元，這個數目，可從義國和平經濟中不需要的工業設備，義國在巴爾幹各國的財產以及由蘇聯供給原料義國生產貨物的差額中提取。莫洛托夫願意讓其他賠償要求在和會中再行討論。

我們預料請柬可於次日發出，但是我們顯然錯估了莫洛托夫頑強的手段。他拒絕請柬用外長會議的名義發出，因為這樣將使中國成爲邀請國之一。更重要的，他堅持我們必先就和會的程序規則，獲致協議。繼之就發生四天激烈的辯論。莫洛托夫所提的建議將使和會簡直不能有一點作爲，祇能批准四外長的工作而已。我告訴他說美國不能同意將規則使獨立國家的一個會議接受，並且堅持和會應有決定其自己的程序的權利。

根據皮杜爾的建議，我們最後再開了一次私人會議。蘇聯代表接受了一個建議，就是和請柬一同發出的程序規則草案，應該僅僅作爲外長會議的「建議」看待。在這些規則之中，包括一點，就是修正應由三分之二的多數提出。莫洛托夫堅決要求逐點討論草案，但是我表示拒絕，聲明美國不能受這種規則的約束。最後終於獲得了協議，和會的請柬最後在次日即七月九日發出。

第八章 巴黎和會與它的紐約結局

我們準備參加和會，相信我們美國所要說的話能够代表國內各個政黨，也能代表大部份美國人民。這種精神，從美國人民響應華盛頓郵報提議熱烈歡送代表團的情形反映出來。在我們啓程的那天，廣大的羣衆站滿了到「國家機場」的路上，擠滿了機場，來歡送我們。這一種人民渴望和平的動人的表現，在我們十一個星期的會議期中，真是極大的鼓勵的泉源。使得爲召集會議及謀取和平而費去的十二個月的工作以及六千里路的旅程更爲值得。

法國政府與人民都盡他們的力量，安排着一個適宜的求取和平的場所。法國人做主人是卓越的，但即使他們最好的努力，也無法消散自從外長會議結束以來的不和諧的感覺。

社交活動多得使人體力難於忍受，所以除了政府首長及外交部長以外，我不得不拒絕一切邀請；然而我必須承認，在這種和平會議的集會中，社交生活也有其價值，祇要人們如朋友般相會而繼續不斷地討論他們的問題，問題就有解決的機會。這種想法，甚至最高法院也認爲如此，每一個法官在走進會議室後，都與在場的其他各位法官握手，不論前一天法官之間的爭辯是如何熱烈，如果他們用握手及談話來開始這一天，他們或者可能調和他們不同的意見。在我與各國的代

表商討時，我沒有忘記這從法庭上學來的課程，這在和會的緊張的日子中尤其有價值。

我們參加和會的觀點與蘇聯政府完全不同，這一件事實從開始就造成衝突。我們相信討論應該完滿而自由，即所有出力贏得這一次戰爭的國家，都應該有為和平而提出建議與修正的最大權利，他們的提案當受重視。我們相信一種永久的和平必須是人民的和平。

然而，蘇聯的態度，似乎這和會應該簡單而迅速地確認外長會議中的協議，而建立和平，主要的（如果不是絕對的），僅是強國間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信念，我在開幕詞中宣佈美國將支持外長會議中的協議，但是，如我在外長會議中已說過的，我對於每一種提案，不管外長會議所交下的如何，均將另付表決；如果和會中提出任何問題未經外長會議同意，祇要有三分之二多數的通過。我將盡力使外長會議採用這種提議，不管美國自己在和會中是否贊成。莫洛托夫對此立即就指責我們的立場（也就是英國採取的立場），破壞了外長會議中所決定的關於和會程序規則的協議。第一次我不管他的指責，但是當他以顯然反對的目的再提出時，我就宣讀外長會議記錄中六種不同的文件，其中我保留美國贊成任何修改程序的權利，我說我所以常常「保留」，僅僅是因為我知道莫洛托夫的鬼計，「從這記錄來看，」我聲明說：「祇有莫洛托夫會說我已同意贊成這擬定的程序規則。」

我指出，當他演說美國與英國贊成修改表決程序的規則乃是「善變」時，他自己演詞的結尾已經修改了這規則的同一部份了。

「因此，祇有莫洛托夫會得這樣做。」我又說。

程序問題的論爭。冗長又尖銳，差不多有三星期，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用一切精悉議院法則者的本領來限制小國與中等國家的參加。這是與那些國家的利益與希望相反的。此外，蘇聯代表如此難堪地用手段詰問與他們意見不同者的動機，以及信口開河地指責我們組織集團。因此，使有些原先以爲西方國家外長對蘇聯不懷好意的代表團，觀念大爲改變。從那時候起，這些代表對蘇聯就極爲非議，一般都投票反對他們。蘇聯代表團又宣稱和約重提到外長會議時，他們對於任何過半數通過的條文，因無前例可援，都將置之不顧，但事實上，蘇聯的提議在表決時大多數總被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所反對。

莫洛托夫以爲我們與英國組織了一個集團反對他們，事實上，則我之參加會議，從來想都沒有想到這一種力量。後來，在和會中，他甚至指責我們教唆小國來提出修正。其中有許多修改的提案，贊成我們原先對和約的建議，但當時在外長會議中，因爲蘇聯的否決權而放棄。莫洛托夫緊緊控制他的贊成者的投票及行動，他認爲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如比利時、荷蘭、南非洲、奧地利、紐西蘭，有他們自己的主張，而我們也不願影響他們的觀點，這對於莫洛托夫是無法瞭解的。所以，他指責我們組織「集團」，目的在破壞外長會議的工作。

最後我被迫問他：「什麼時候發生這集團之說的？那些一票一票跟着蘇聯投票的有什麼權利稱我們不是常常同意蘇聯的國家爲集團？當紐西蘭建議所有提案以過半數表決，結果以十一比九

票不能通過時，沒有一個人抗議說這提案是被蘇聯集團所擴斥的；但是，當蘇聯的關於表決程序的提案經十五比六的絕大多數不通過時，就被指為這是有英美集團而失敗的。這真是多麼放肆而惡毒的話！」

在程序之爭將結束時，我打電報給參議員康納利及范登堡，催促他們來參加代表團。我需要他們來為美國辯護，抵抗那些被蘇聯及其附庸國所發動的對我們的攻訐。如過去一樣，他們立即答應我的請求，他們做了最有效的工作。

康納利在會中擔任處理義大利和約政治部份的美國代表，由副國務卿鄧恩 (James C. Dunn) 與一位出眾的外交官里勃 (Sara Reber) 協助，范登堡代表我們負責所有和約的經濟問題，以現為副國務卿的桑伯 (Willard Thorp) 為助。其餘美國代表的任務如下：駐倫頓大使哈里曼參加羅馬尼亞和約委員會，駐巴黎大使卡弗萊 (Caffery) 參加保加利亞和約委員會，駐莫斯科大使史密斯 (Smith) 參加匈牙利和約委員會，理查·康乃萊，鮑爾麥，柏雷斯 (Richard Connell, Baier, Pryce) 參加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亦討論海軍問題。

每晨九時，他們幾位和我及各位國務院專家相聚，每一個委員會的代表都做一報告，以使代表團每一份子知道各個委員會的討論情形。並且，如需要的話，可以使代表團全體對某一爭辯的題目，下一決定。這是一個和諧而工作順利的團體，沒有一個國務卿曾經受到更尊重而有能力的支持。

在初期會議中，新民主義意大利的首相加斯貝里（Gasperi）出席，提出義大利的問題。他與他的代表團仍被視作敵國的代表，除了皮杜爾之外，沒有一個代表團歡迎他。皮杜爾當時是主席，他循禮介紹了加斯貝里，這位義大利首相很老練而莊嚴勇敢地將他的問題提了出來。在他離開演說壇走過會堂的中間走廊，回到指定給他的最後一排坐位時，經過許多認識他的人面前，全場悄然無聲，沒有一個人對他說話，這使我感到真是不必要的殘酷。我像別人一樣，曾在倫敦見過他，所以當他走近美國代表團時，我就站起來和他握手，隨後又送一封信給他，請他在那天下午到我房間裏來，我要鼓勵這一位曾在墨索里尼手中受苦現在又在聯合國手中受苦的人物。

在離華盛頓赴巴黎之前，我曾被授權在對義大利新政府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上幫助他們。我們在法國裝備我們軍隊的費用都付款，但在義大利購得的供應，預算委員會却反對付款。理由因為義大利是敵國！由於這委員會的主張，付款就被財政部擱置。我與肯能（Cannon）和坦勃（Taber）兩位代表提及此事，前者是委員會的主席，後者是高級共和黨員，這兩位先生是常常受任意揮霍的官員所攻訐的。以我多年的經驗，我曉得他們祇是想保護納稅人的金錢而已，而且我常見他們對於值得付款的事情甚表同情。當我告訴他們，那些軍隊的供應是義大利站在聯合國這邊作戰以後才供給的，他們立即表示願意撤回反對。

我知道加斯貝里首相在和會中受到屈辱，就乘那天下午告訴他美國政府願意付款的決定。但我警告他，我們的決定將等義大利和約完成以後才能宣布，否則，向義大利要求賠償的國家或者

會增加他們的要求。

有時候，我們以為和會永遠不會結束了，每一項題目稍有爭論時，蘇聯就提出它的意見，然後幾個附庸國發表贊成的演說，每次演說都要譯成三種語言，所以進展很困難。一直等到其他國家的代表，並無任何正式集會或諒解，僅是由於一般的要求，開始抑制發表演說，主張以投票代替時，工作才能開展。

雖然如此，我認為蘇聯代表團及其附庸國的態度尚非完全令人沮喪。在我看來，莫洛托夫與維辛斯基在小組委員會前及在大會中，對於提案的討論既如此熱心，則將來當不致於對和會中通過的提案拒絕考慮。

在辯論過程中，極少指控不是對美英而發生的。我們被控與「法西斯蒂」勾結，以「國外投資及卡特爾制度」奴役義大利，用資本征服弱小國家，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可惡而可笑的罪惡。

我們力求盡可能避免捲入這種性質的論辯，但是有時候我們必須答復。其中之一是在戰敗國家提出對和約草案意見之後莫洛托夫發表的演說。這是一篇放肆的演詞，他支持戰敗國對我們的同盟希臘的攻擊。而且，不友好地將義大利與蘇聯統治下的巴爾幹政府比較。他也直接攻擊美國與英國的和平政策。

我答復說：「在這相關的世界中，如果忽視這種對美國的一再的侮蔑與誣捏，和平不能再繼續了。我堅決反對蘇聯政府給予和會這種印象，即是別的戰敗國較之義大利來得民主，僅因為他

們的觀點與蘇聯的相符。美國相信一個國家有其主權，我們反對使小國成爲大國的附庸。」

我提出莫洛托夫所指若干強國已在戰時發財自肥，問他是否指會爲戰爭耗費四千億元。並且會給予蘇聯一百十億元租借物資的美國而言？我指出我們不要領土與賠償，與蘇聯的在和約草案中分配到大量土地和幾萬萬元剛巧相反。

「美國亦必須否認蘇聯代表團所稱：美國所提出的根據平等原則的經濟條款，是爲了美國自私的利益，而想催毀戰敗國家！」

有一次維辛斯基一遍又一遍地指責美國「伸手」企圖統治世界，我注意到在他的演說結束之時，坐在我們代表團前兩排的捷克代表團熱烈地拍手。我剛巧聽到捷克向我們借到一筆五千萬元的貸款購買剩餘物資，這筆貸款之借與，乃因捷克政府爲復興工作而需要財政援助。我查問後，獲悉捷克政府已經將這「緊急」貸款中的一千萬元，以百分之六的利息，加百分之七的管理費，訂約轉借給羅馬尼亞。這樣，捷克人賺到一筆大賺頭，因爲他們問我們借的錢，祇要付百分之二·三七五的利息。

我立即打電報給國務院，停止再將借款撥付。幾天以後，那位非常能幹而動人的捷克外長馬沙克（Masaryk）就走來看我了。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代表克里門鐵斯（Clementis），他是捷克政府中的共產黨代表。馬沙克問我，什麼事情在破壞美捷兩國間的友誼？我告訴他：我們間的友誼不需要破壞，但是一個國家的官員聽到別人指斥美國「伸手」統治世界而喝采，對於這個國

家一切救濟措施與貸款都要終止。我確實告訴他，我們希望與捷克友好，但我們不願意再「伸手」來冒犯他們，尤其在看到捷克報紙反對我們的激烈言論以後。我也告訴他捷克與羅馬尼亞的交易如何使我吃驚。並說，我們借款給捷克是相信他們需要貸款，如果羅馬尼亞需要我們援助，他們可以直接請求，捷克不該作爲我們的「佃商」。

馬沙克告訴我——我相信他是誠實的——關於與羅馬尼亞交易一事，他完全不知，他對此事很爲抱歉。他說，他要去查究真相。克里門鐵斯則知曉這件事，但他解釋說交易尙未完成。我告訴他說，交易所以沒有完成，是因爲我發覺而把它阻止了。

此後，我又得到情報，於捷克政府稍爲有利。原來我國財政部有代表訪問捷克，一位捷克官員來見他，那位官員向他請教關於羅馬尼亞交易之事，我們的代表回答說他對此事無權決定，但這提議可以送給美國政府加以考慮。捷克官員後來就引用他的話作爲羅馬尼亞訂約的憑藉，推說他們以爲如果我們反對他們轉借給羅馬尼亞，就不會預付貸款了。

同時期內，我們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也發生危機。南斯拉夫是一個約有紐約與本雪凡尼亞州那樣大小的國家，有一千六百萬人民，曾參加俄國革命戰爭，而是一個澈底的共產黨領袖狄托元帥在那裏取得了控制。一年以前，南斯拉夫軍隊想以武力佔據夔利亞（Gallia）的時候，我們與他已有困難。後來南斯拉夫軍隊雖然撤退到毛根線（Moran Line），但沿線仍有間續的小衝突。另一種摩擦是關於空中飛行，我們的陸軍空運隊在羅馬與維也納之間飛行，經過北義大利的

烏庭 (Udine) 至奧地利的克萊根福 (Klagenfurt)。這兩地之間直線航程祇六十五公里，但因南斯拉夫的西北角突出在兩地之間，而南斯拉夫抗議我們的飛機不能飛過他們的領土，因此我們無法在兩地間作直線飛行。因為地形如鋸齒，而且有許多航行上的障礙，所以命令常常難於遵守。駕駛員要駛經一個山高九千呎的峽口，四週的山峯高至一萬八千呎，氣候惡劣時極易失事，平時亦有碰撞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一個友好的國家會提出抗議，但南斯拉夫却指我們侵犯他們的邊界一七六次。我們的陸軍否認此種指責。

八月九日，一架軍用運輸機載有七位美國人，一位土耳其人，一位瑞士人，因迷路而盤旋於南斯拉夫領土上空，被兩架南斯拉夫戰鬥機所襲擊，被迫降落於一麥田之中。土耳其軍官受了傷，其餘八人立刻被拘禁於布爾格萊特 (南國京城) 的旅舍中。八月十九日，另一架赴羅馬途中

的運輸機，在飛過克萊根福時還拍電到烏庭，但從此就失去聯絡。其後，克萊根福有報告說，它被南斯拉夫戰鬥機所擊毀，五位美國人的屍體在五天以後才找到。

國務院向南斯拉夫查問此事，狄托元帥發表一挑戰性的演說，指責我們派遣「整隊」的軍用機飛過南斯拉夫！我就去請和會中南斯拉夫代表團長亦即南斯拉夫副首相卡台傑 (Karčić) 來，告訴他我所接到的消息，要求他解釋。他說，除了獲悉我們的飛機常常不遵守通知而幾次飛過他的國土以外，其他一無所知。

我告訴他：「南斯拉夫口口聲聲說是友好的政府，而且你們的飛機可以在任何時間飛過我們

的領土；如果你們的一架飛機飛過加拿大失事，而剛巧飛進美國降落，即使你們並不與我們友好，美國的官員仍將覺得這是他們的責任，來盡一切力量，以求南斯拉夫駕駛員與旅客的安全與舒適。任何官員假使不這樣做，就要受到我們政府的懲戒。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反用美國軍用機來射擊南斯拉夫飛機，殺害其駕駛員與乘客，這種罪行，美國政府決不會做，所以美國人民決不會寬恕南斯拉夫。」

我要求他與他的政府通消息以求解釋，同時我也與代理國務卿艾契遜通消息，艾契遜派了一位官員來從外交途徑交涉，但接到的答復非常不滿意，我就發出指示，警告南斯拉夫，除非我們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得到滿意答復，否則我們將籲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採取適當行動。

美國下哀的美敦書的消息傳到各國代表團時，會場空氣甚為緊張。我注意到莫洛托夫團體中的一位代表離開他的代表團，走到南斯拉夫桌邊，與卡台傑耳語，然後莫洛托夫與卡台傑兩人先後從不同的門口走出會議室。我們的一位代表看到他們在休息室裏密切談話，大部份都是莫洛托夫講，卡台傑聽。這或者不是有關我們哀的美敦的談話，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獲得了滿意的答復。

當時，和會的疲勞工作繼續下去，大會常延長到清晨，在大多數關於經濟條款的爭辯時，我是主席。五種和約的經濟條款幾乎完全相同，當義大利和約的經濟部份點票決表後，我希望其他和約的同一部份不需要再來表決，但蘇聯代表團的想法却不同。

雖然，事實上，每一敵國的和約小組委員會是由所有曾與該國作戰的國家所組成，而且在各委員會中，凡遇重要事件都付表決；但大多數在大會中起了爭辯，再付表決。結果雖然極少變化，但莫洛托夫永不放棄嘗試。即使一種小組委員會的決議已在大會中得到三分之二大多數的通過，他仍要求點驗不贊成的少數票數。結果，在五種和約中，每一決議都要兩次點票。莫洛托夫與他的附庸的這種策略，適足以造成他所指摘我們的所謂「西方集團」，如果想產生一個集團，那他的作爲遠較我們有效了。

許多次深夜，我從會場回到旅舍，既沮喪又疲乏。幾星期前，我離華盛頓時，一位記者問我重赴和會有什麼感想？我會答復他，用古代黑人精神的話來說，我是「站在祈禱者的立場」。有一夜，當和平的希望真正黯淡時，我的太太遞給我一包從華盛頓寄來的信件，大多數來信是那些聽到或讀過我在機場談話的人寫給我的，他們告訴我，他們爲和會的成功及我的努力而祝禱，他們並不是寫信的老手，他們都是些好百姓，渴望和平而相信祈禱的效驗，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來信給了我多少安慰！

到和會將結束時，莫洛托夫匆匆返莫斯科，我想他是去和他的同僚商量，我很高興他這樣做。在會議中，他與維辛斯基對美國的態度是如此不友好，使我覺得他這次去莫斯科商量後，任何轉變都會是向好的方面轉變，這實在不可能更壞了。

當和約審議完成，南斯拉夫代表在最後一次會議中並未出席。代表團的主席送了一封信給大

會主席，說是因爲關於特里斯特的提案未能滿意，所以南斯拉夫不願出席，並且不願在和約上簽字。由於他們不斷威脅，除非大會同意他們對於特里斯特的主張，否則不在和約上簽字。我們代表團就建議，並經過大會過半數通過：任何國家拒絕簽字者不得享受和約產生的利益。後來，在紐約的外長會議中，我堅持此建議，莫洛托夫終於同意，我就相信南斯拉夫不會拒絕簽字了。

大會開始時，除了在外長會議中已經同意的項目以外，尚有二十六條未經同意的項目要討論，而總計起來，約有三百條修正案需要討論，但是大會的真正中心問題在於特里斯特，賠償總數，以及多瑙河管理等三項問題。

外長會議對於特里斯特應該怎樣治理，未獲協議，所以指定一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如所預料，委員會擬具了四種不同的建議交給大會，我們在準備我們的草案時，想到前國際聯盟與但澤自由市的不愉快經驗，因爲自少數有組織的納粹份子控制了但澤的立法權以後，國際聯盟所指派的最高主席就無力保護該城的完整。所以我們決定應該予特里亞斯特的總督以大權。但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反常的現象，即是西方民主國家主張由安全理事會任命一位幾乎有獨裁權力的總督，而東方獨裁國家反而主張以普選立法來治理。雖然如此，我們決定盡力保護這一區域免得受人蠶食，免得特里斯特送給南斯拉夫，猶如但澤被送入德國掌握。

蘇聯對這問題的草案，則除給予總督有名無實的地位之外，並將特里斯特附於南斯拉夫，主張特里斯特的鐵道共營，雙方境內並有自由殖民與僱用之權利。最後，大會以十五比六票通過法

國的折衷方案，該方案與英美方案較為接近。

賠償問題的爭論也同樣困難，但大會最後以一九四五年與蘇聯停戰條約中規定的三億元通過芬蘭和約，羅馬尼亞和約，匈牙利和約。我們雖然請大會認識匈牙利境內一般的經濟混亂情形，主張減少賠償三分之一，但未成功。保加利亞對希臘與南斯拉夫的賠償則決定為一億二千五百萬元，雖然此數目曾被斯拉夫集團目為太高而反對。

最大的賠償之爭，當然在於義大利，各小國提出的要求總數達數十億元，因為我們在外長會議中同意以一億元賠償蘇聯，我們當然不能完全拒絕小國的要求。但是我們要想使他們明瞭，如果真正照我們的希望，我們美國也會提出二百億元的要求。英國的要求較小，是一百十億元，但也並無必得的意思。最後，大會決定對蘇聯、南斯拉夫、希臘各賠償一億元，愛沙尼亞二千五百萬元，阿爾巴尼亞的要求則被拒絕。我們祇有設法在和約的其他部份，如聯合國財產賠償，在聯合國中的資產及佔領費用等條款中，減輕義大利的負擔。

當我們與英國提出保證巴爾幹半島國家內的經濟機會均等，及開放多瑙河的提案時，大受攻擊。蘇聯代表團公開說他們相信我們的目的是向蘇聯的控制東歐挑戰。吾們的論據，則說明我們要求：雅爾達會議所協議的原則，應該在條約中實現。但我們被指責為計劃用資本主義「奴役」巴爾幹人民。在大多數爭辯之中，我們由范登堡與桑伯及林斯德三人能幹地辯駁，他們力求在條約中規定每一戰敗國必須對任何聯合國，基於互惠基礎，在貿易上無歧視，在經營商業上與國人

同等待遇。同時，我們還要求關於經濟機會均等，與在十八個月內訂立民航協定的平等權利。

范登堡領頭，爲多瑙河的自由貿易及自由航行而爭，他與貝文指出：從一八五六年起，多瑙河就由國際管理。但莫洛托夫指那時的協定是「帝國主義條約」，認爲多瑙河的權利僅與沿河國家相關。九月三十日，范登堡發表一篇流利的演說，主張採取英美的聯合決議，確定自由貿易與自由航行的原則。在和約生效後六個月內，再召集會議，由四大強國與沿河國家參加，商訂多瑙河的一切新的國際交通計劃。這一決議，略經修改後，爲大會所接納，訂明於和約的最後草案內。

這些是大會中最主要的三項爭執。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困難問題，例如：自第一次大戰以來，一直有糾紛的領土與少數民族問題，其中包括匈牙利割給羅馬尼亞的外錫凡尼亞（Transylvania），羅馬尼亞割給蘇聯的波柯維納（Bukovina），以及蘇聯從芬蘭得到的泊珊摩（Petsamo）與包克拉（Porckara）的海軍基地。此外更有各種要求，例如希臘要求南阿爾巴尼亞的北愛畢勒斯（Epirus），蘇聯支持保加利亞向希臘索取西雪蘭斯（Thrace）的省份。

在這些要求與反要求之中，義大利與奧地利在大會中表現了一次政治家風度，成立一種光明的協定，保證義大利所屬南泰羅爾（Tiroi）地方德語民族的基本人權。我們企圖以這種雙方合理訂約的例子去解決其他問題，如捷克希望將它馬格耶（Magyar）的少數民族交回匈牙利，但未能成功。

總之，和會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五十三種條款，以過半數通過四十一種條款交給外長會議。十月十五日，和會結束後，很明顯的，外長會議將有更多星期的疲勞工作才能完成和約。

雖然和會並未達到所有我們的希望，我們覺得幾個月的工作消磨得很有意義。我們認為智慧並非四大強國所獨有，所以澈底堅持小國對和約亦可有重要貢獻。他們提案的價值，可由後來和約所包括的條款數目來證明。

外長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在紐約重開，這一次對於程序並無爭執，立刻就開始討論和會通過的義大利和約。至於別的方面，則很少不同。事實上，如果會場不在華爾道夫旅館，我或者以為我已回到一年的倫敦去了。

以前我從未想到協訂和約尚有許多機械工作。五星期的紐約會議中，八十五萬五千頁的文件，需要複寫。會議的時間及會議中每一種動作，每一種協議，都要用各種文字向各個代表團一遍一遍的校正。

整理文件的工作，實際上在代表們回去以後尚繼續了兩月。語文專家必須校閱三種文字的和約藍本，另外一本譯成各該戰敗國的文字。所以，五個戰敗國家的和約，每一份都要用四種文字。此外，近乎十四萬三千幅地圖，必須繪製插入和約之中。這樣，全部工作須完成二十種不同藍本，總共有四萬四千冊，皆由國務院國際會議部主任凱區納（Kelchner）主持辦理。

這些都是紐約外長會議中新發生的情形，但坐在會議桌上的仍是從前的莫洛托夫先生與維辛斯基先生，他們完全不顧巴黎和會中通過的條款，仍像過去三月來一般的喋喋爭論。南斯拉夫代表又來提出治理特里斯特的問題，他們所說的話，與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間在倫敦以及在巴黎所一再發表的主張實質上完全相同。

我承認這真是使人頭痛，當我以國務卿的身份負責商談時，坐在我旁邊的參議員范登堡與康納利，一定更感頭痛。每次我發表演說，必須由鮑倫（Bolton）譯成俄文，由另一位譯員譯成法文。即使是最好的演詞，在譯成三種語言時，也不會令人感到興趣了。常常在翻譯的時間內，我們的代表們會遞給「字條」，建議如何應付一個新的提案，或者如何答覆一種爭執。但有時除了等候譯畢以外，別無他事可做，代表們就會塗畫漫畫。他們都有藝術天才，我想如果給藝術家看見了，會稱他們是屬於「未來派」的。彭柯亨（Ferdinand Coghlan）畫的是會議桌上的人物，有幾個他畫得真像。

紐約會議中討論了不少和會通過的條文，均無結果，後來，靠了貝文的讓步，才得到一次協議，那是關於賠償物資提早償付的問題。在巴黎和會中，英國代表團曾極力反對，但終經大會以十四對七票通過。當我們此次討論到這問題時，貝文說：「這條款既已在和會中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我現在取消反對。」

「那末，我們不可不認為這一條業經大家同意了呢？」在會議中，代表皮杜爾的法國代表摩

維勒 (Murville) 就問。

貝文答道：「我應當聲明，在巴黎時，我是堅決反對這一條的，但雖然如此，我現在不想阻撓。我承認這將予義大利很大的困難，但我還是取消反對。」

「主席！」我插口說，「我想可以提請注意，這還是第一件經採納的巴黎和會所通過的條文。」

貝文又說：「英國倒底仍能領導。」

至此，莫洛托夫第一次發言，他以一種幽默的姿態，轉向貝文說：「我們希望她（譯者按：指英國）將來更能成功。」

我們繼續討論所有和會中通過的條款。蘇聯代表團對於每一項目均拒絕以貝文爲例，承認巴黎和會中通過的大多數意見。

雖然如此，我們私人間的關係却大有改善。莫洛托夫自抵美國以來，就避免在會議中攻擊美國，在巴黎和會中，他與我從未像現在那樣在進餐時作私人談話。在紐約交情既改善，我們重新又有愉快的社交往返。會議第四星期中，莫洛托夫到華爾道夫旅舍我的寓所來見我，並問我如何可以使討論有更好的進展。

「我必須很坦白的告訴你，」我回答他說，「你既然對於巴黎和會中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的條文都加以拒絕，看來協議是毫無希望的了。一年多以前自倫敦開始，我即盡我所有的力量，以求獲致和約的協議。所以，現在我斷定和約不可能協訂，實在是極不願意這樣說的。既然如此，我

們也不必像巴黎和會時那樣爲 執而互相攻擊了。」

莫洛托夫甚爲吃驚，他沒有準備到爲和約而工作數月 歇的美國代表團，竟會說出這一番話來。他回答說，他並不如此悲觀，他以爲我們能够獲得協議。

「幾月以來，我都不想悲觀，」我告訴他，「但最後我已明白我們對於和約的期望不相同。如果我們並無共同目標，那末再爭執就毫無目的了。我極望我們不應該以這種方式來宣佈不能取得協議而使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吃驚。但時間是一個偉大的醫生，或者在一年之後，別人能够找到合作的可能。」

雖然莫洛托夫不願相信我談話的嚴重性，我在談話結束之時，強調由於不可能協訂和約，美國將放棄的表示。

我與莫洛托夫會見後的第二天，南斯拉夫代表，亦即當時南斯拉夫駐美大使薛密克 (Simic) 來我處求見。

他開談即提出修正南斯拉夫與特里斯特自由區間的邊界。他說：南斯拉夫願以減少義大利對南國的賠償來交換。很顯然，這僅是莫洛托夫設法來刺探我的立場。假如我表示願意與薛密克訂約，無異即告訴莫 托夫我昨天對他所說準備結束商談的話並非真意。

「大使先生，我們討論你的建議實在毫無用處。」我告訴他，「我們已經得到結論：在目前狀況之下，不可能訂立有益於和平的條約。我已經告訴莫洛托夫說，我認爲我們應該結束我們的

工作，而避免像過去許多次討論時的互相攻訐。所以，即使討論你的建議亦屬無用。」

薛密克表示，幾個月來的工作，一旦拋棄，真是最大的遺憾。我同意他的惋惜，但說，我看來沒有轉寰了。談話中，他幾次企圖再提這問題，但每次我僅說我們已耗盡我們的力量，是否能有更餘地，要看莫洛托夫對和約的要求如何。

我告訴他，如果宣佈我們不獲協議，義大利政府將感到滿意，而對南斯拉夫則並無妨礙。

次日，莫洛托夫與我談話時，問我是否堅持前次私人談話時所表示的意見？我告訴他，我仍堅持。他又說我太悲觀了。

「假如你真的這樣看法，」我答道，「我很願意你說出些你的樂觀希望的根據來。」

莫洛托夫表示他準備同意若干和會所通過的條款。我就告訴他如果他採取這種態度，我或者也會改變我的意見。

下一次集會時，莫洛托夫果然宣佈他同意若干和會通過的條款，對另外幾條則提出修正，他已瞭解我對他所說的意義，知道不能再使我們讓步了。

莫洛托夫既然決定同意。他就做得很爽快。他對幾種條文提出的修正，僅僅是字面的而非實質的變更。我們對於這種保持面子的做法，很願意合作。幾天以來，所有爭執的問題都得到協議了。在會議開始時，莫洛托夫實際上反對所有巴黎和會通過的條款，但最後結果，和會中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五十三條中有四十七條，和會中以半數通過的四十一條中有廿四條都採納於和約

中，莫洛托夫態度的率爾轉變，由此可見。

這些協議獲致之時，正值聯合國大會開會，限制軍備問題熱烈爭論，希臘伊朗問題亦在不斷磨擦之中，所以特別值得重視。

外長會議結束後五天，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國大會亦告結束，我們可以回到華盛頓去了。相信我們至少已在和平的長途上走過一個里程碑了。

簽訂的和約，如我在巴黎和會結束時所說，尙非「盡如我意」，但相信已是我們在長期討論後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了。在和約未簽訂以前，停戰條件繼續有效，五個戰敗國家都不能得到安定，國家生命的任何方面都受到妨礙。對於未來，尤其經濟發展方面，更無從計劃。

和約之簽訂，使聯合國軍隊可以從義大利、保加利亞和芬蘭撤退，可以使羅馬尼亞、匈牙利的駐兵減少。特里斯特問題的解決方法可望避免將來嚴重的衝突，義大利已被解除武裝不可能再侵犯該地，南斯拉夫雖然是軍國主義，但想來亦不致侵犯安全理事會的威權。義大利的賠款雖較我們所主張的爲高，但至少我們已設法在付款方法上減輕其負擔了。

最重要的，或者在於和約使這些戰敗國可以加入聯合國，參加各種共享利益與共負責任的國際組織，如國際銀行，貨幣基金，糧食農業組織及國際貿易組織等。這樣，這些國家就可能與其他聯合國會員合作，來穩定和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以及與世界其他各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等關係。